

原来日本是怎么回事○ 相对于中国几千年来朝代更替的历史，日本历史亦有其诸多特色，这个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休戚相关的国家，如何从废墟中崛起，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不可不知的日本史

张霞◎著

了解他国的历史，有助于身处伟大国家的我们明了该如何奋进，如何行事。

不可不知的日本史

张霞◎著

学苑出版社

学苑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前言](#)

[第一章 被中国刺激出来的国家](#)

[第一节 大东亚的第一次震惊：隋朝的统一](#)

[第二节 嫁入深宫的苏我氏女子们显赫的苏我氏](#)

[第三节 向“隋朝中心观”宣战](#)

[第四节 “海龟”们的黄金时代](#)

[第五节 一场看起来很“二”的战争：白村江海战](#)

[第六节 皇室悲剧之开始：赐姓藤原氏](#)

[第二章 奢华时代的终结者——平清盛](#)

[第一节 藤原氏阴影之下皇室的努力](#)

[第二节 院政制度下的武家集团](#)

[第三节 后白河天皇：武士力量的使用者](#)

[第四节 源赖朝创立幕府：武士集团的又一次升华](#)

[第三章 元朝入侵日本：武士集团的第一次考验](#)

[第一节 北条氏打造的“结实幕府”](#)

[第二节 强大而凶悍的邻居](#)

[第三节 三万元军：武士集团的第一次大考验](#)

[第四节 战争打赢了也是白打](#)

[第四章 1600年：一个基督徒贵妇的遭遇](#)

[第一节 大美女细川玉子的一生](#)

[第二节 耶稣会与基督教在日本的最初成功](#)

[第三节 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

[第四节 日本与欧洲第一次失之交臂](#)

[第五章 明治维新：走向近现代的世界](#)

[第一节 不速之客：美国准将佩里和他的外交使团](#)

[第二节 没落的武士和脆弱的幕府](#)

[第三节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第四节 不允许带刀的武士和穿西服的天皇](#)

[第六章 “成为餐桌客人”：现代日本的出现](#)

[第一节 1890年，日本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

[第二节 军队改革：当兵有鞋子穿](#)

[第三节 甲午战争胜利：加入帝国主义阵营](#)

[第四节 第一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

[第五节 近现代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日本历史年表](#)

原来日本是怎么回事。相对于中国几千年朝代更替的历史，日本历史亦有其诸多特色。
这个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休戚相关的国家，如何从废墟中崛起，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不可不知的日本史

张霞◎著

了解他国的历史，有助于身处伟大国家的我们明了该如何奋进，如何行事。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前言

19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日本，是个普通的亚洲国家。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日本在内部的不断变化以及来自中国的影响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也有着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努力结果：创造了本民族灿烂的文化，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此时的日本，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它有一个强大而耀眼的邻国：中国。中国盖住了日本几乎所有的光芒。换句话说，因为地理位置和国力的问题，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只能从更加软弱的朝鲜半岛那里找到一点平衡感。

情势在明治维新之后发生了变化，日本由此从一个被邻国不断影响的国家，变成了亚洲唯一能与西方列强比肩的国家；从一个不起眼的亚洲国家，变为一颗璀璨的亚洲明星；从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变为一个在20世纪横行于亚洲的国家。

这种变化是令人欷歔的，又是极为刺激的，同时也不是令人意外的。

日本是一个善于不断低头向强国学习的国家，在平安时代，它几乎复制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唐朝，文化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日本也是一个团结的国家，每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个人总是选择忠于国家的某个目标，在镰仓幕府时代，它击退了强悍的元军军队；日本也是一个倔强和顽强的国家，其倔强和坚持，表现为武士道精神，也表现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改革家身上。同时，这种执著，尤其是对领土和国家

安全的执著，导致其最终陷入战争的泥潭，并将周边国家拖入无尽的悲剧之中。

日本也是一个善于调整发展方向的国家，一旦它从歧途转入正轨，它带给世界的仍是震撼。这个几乎被战争毁灭的国家，在经历了短短的几十年之后，又一步跃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今的日本，是全球最富裕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在世界前列。

日本的历史是值得深思的。

本书试图从日本国际地位的演变去梳理日本国家发展的内在脉络，包含了日本国家的形成、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在重大国际事件中日本的表现。本书也着重描写了日本如何在19世纪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迈向现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的过程。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理论水平有待提高，若书中观点与史实有谬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被中国刺激出来的国家

第一节 大东亚的第一次震惊：隋朝的统一

按照进化论的原理，日本这个国家的由来，无非就是某地的猿人进化成了人，这些

人组成了一个部落，当部落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构成了最初的国家。这个国家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世界大氛围的影响下，经历各种风波以及蜕变变成现代的国家。

不过在一个国家逐渐成长的过程中，邻居是很重要的，比如因为我们原来挨着的是前苏联，我们就会受前苏联的影响。所以，在日本成长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日本最早的那些原始人类都是从中国或者朝鲜过去的；而在有些野史和八卦中，日本天皇都是秦始皇时期东渡求仙的那个徐福的后代。不过这个对本书来讲并不是很重要，人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些人构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组建了什么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最终得到了怎样的认同或者获得了怎样的地位。

相对于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日本的国家历史就显得有些短了。即使有文字记载也难以还原一个国家历史，更何况日本文字出现得较晚。简单来说，与日本民族的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大概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出现了很多零散的小国家。中国《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到公元57年，日本和汉朝的关系在正史的记载中又进了一步，根据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的一些记载，公元57年，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光武帝赐“汉倭奴国王”蛇钮金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彼时的汉朝，是一个政治以及文化非常强大的国家，因此，这枚金印在日本似乎也就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几乎成了国宝级的珍贵物件。战争的时候，人们怕它流失，就将其埋入地下。直到江户时代，这枚金印偶然被一个农民发现，甚至有人愿意出百两黄金购买。

当然，汉倭奴国王可能是日本当时的数十个小国中的一个，三国的时候，日本的又一个国家邪马台国进入了中国的文献。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王，是个女人。所以，日本国家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和中国不一样，起码在男女平等这一项上，人家走在了咱前边。

邪马台国被公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起源，虽然知道这个国家有一个女王，但是至今，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在日本哪个地方存在过。前文说了，日本古代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字，这个国家从来不曾出现在日本古代的文献中，只是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有这么一回事情。当然，彼时的邪马台国，也是日本数个小国中的一个，因为和中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密切，因此，中国对其的记述也就相对比较多。

在《三国志·魏书》中的《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有一段对邪马台国的详细描述：

“南至邪马台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顺便还记述了一下这个国家为什么出现了一位女王，大意是，这个国家原本的国王也是男的，但是呢，在一次比较严重的内乱中，不知道何种原因，只好立了一个名叫“卑弥呼”的女子为王。这名女子类似巫女，精通鬼神之道，同时也是一位比较优秀的“剩女”，年纪很大了也没有结婚。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统治的区域比较广阔，控制着周边很多小国，所以官制相对还是比较齐全和发达的，王宫修建得也相对豪华，由卫兵严格把守。这位女王相当注重国际关系的发展，多次派出使者到汉朝和魏晋交流，最后一次派人到中国，大概是在晋武帝的时候。

包括邪马台国在内的小国，但凡和中国存在外交关系的，中国都尽可能地表示了自

己的友好。在《乌丸鲜卑东夷传》中，有如下记载：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绶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绹粟罽十张、蓍绛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本着来的都是客的原则，或者是被朝拜的心情，中国在接见外国使者这件事情上，是相当自得其乐的。这种自得其乐一直延续到清朝乾隆时期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的时候，并终于变成了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过频繁与中国和朝鲜半岛往来的日本诸小国，却因此获得了自己需要的各种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原材料（比如铜和铁），最重要的，还有政权的合法性——没有什么比被一个大国承认更能树立自己的政权形象了。不过遗憾的是，这位女王和她的国家，并没有成为日本的正统，从接下来脱颖而出的大和国开始，日本正式开始了其民族的荣辱交替，这一切都是围绕天皇世系展开的。

日本这个民族，被称为大和民族，因此，一切有关“大和”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和国，是日本的古代分国之一，属京畿区域，为五畿之一，又称和州。大和国的领域相当于现在的奈良县。3世纪兴起，4世纪强大，先后征服九州和本州的大

部分地方，5世纪曾统一日本。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家族，那就是日本的皇室谱系，这个家族被视为左右日本历史和国家形态的重要力量。

天皇在日本无疑是神一样的存在。根据日本史学界的公开材料，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他一直被日本神道教传说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人是神的后裔，这种说法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听起来都很荒谬。不过，作为统治阶层，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家族，这样的神话是很有效用的。一个政权之所以能存在，是需要认同，特别是普通民众的认同的，要得到这些认同，与起源性质的神话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方式。光武帝曾经和一条蛇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李唐王朝，尽管是混血的少数民族，也要把自己和中国道教的始祖李耳搅和在一块儿，用来证明自己的神圣，以获得民众的认同。

天皇谱系将自己家族推演到天照大神也是这个道理。

天照大神在日本是个传说，它是太阳神的化身，也是造物主。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称其为“天照大神”，《古事记》称其为天照大御神、天照皇大神、日神，是日本神话中高天原的统治者与太阳神。它被奉为今日日本天皇的始祖，也是神道教的最高神祇。

根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天照大神是从日本神话中开天辟地之祖伊奘诺尊或称为伊邪那岐的眼中诞生的：伊奘诺尊思念难产而死的妹妹兼爱妻伊奘冉尊或称为伊邪那美，于是亲自到黄泉国去找她。但非常戏剧性的是，此时的伊邪那美，身体已经腐烂了一半多，非常丑陋。虽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这腐烂不堪的身体一下子把伊邪那岐吓得慌不择路地逃跑了。伊邪那美看到情人如此，非常愤怒，派人追击。但狡猾的哥哥都用各种计策甩开了。最后，伊邪那岐不得不用大石

头堵住了阴阳两界的出入口，这才避免了悲剧的进一步发生。当然，他这时候也非常累了，于是停在日向国的橘小户阿波岐原休息。看到满身脏兮兮的泥土，伊邪那岐想脱下衣服去洗个澡，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脱衣服和洗澡的时候，有二十多位日本的神祇分别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诞生了。最后洗脸时，左眼生出掌管太阳的天照大神。因为眼睛一直是与光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天照大神生于一个很体面的部位，地位也非常高。



祭祀天照大神（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据说天照大神的诞生，给日本人带来了五谷、六畜和蚕桑，日本人才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至于大和家族和天照大神扯上关系，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历史就是这么神奇，估计天照大神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不再是神而是成为人。这一切的发生，是在大和家族于诸多政权纷争中脱颖而出的、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古坟时代”，即公元3世纪到6世纪后期。

这期间日本有不少陵墓。华丽的陵墓，一方面类似于中国的祖先崇拜、祭祀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资本在有关建筑方面上的显现。这些坟墓往往离住所很远，越往后修得越豪华越大，其中除了放置棺木的位置，还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随葬品。在这些随葬品中，出现了从朝鲜半岛运来的战马。在公元5世纪之前，这些坟墓还算比较谦虚地待在边远的地区或某座山上；5世纪之后，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坟墓开始毫不客气地占据了良田——想象一下日本的耕地状况，就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浪费的行为了。

但是，在富有的家族看来，这些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在邪马台王国之后，控制畿内地区的是一个叫大和的王国。这个时期，日本与中国、朝鲜的贸易越来越密切。谁能控制这个渠道，谁就获得了权力的来源，因为财富和权力似乎是天生联系在一起的。耕地技术和新型的铁制工具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朝鲜传来，日本的农民们开始修筑沟渠、提高田地的灌溉能力，从而增加了耕地的使用面积。畿内地区的大阪湾，是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的港口，在某个时期这里的仓库群异常辉煌。所以权力的指向也是中心位于畿内的大和国，因为最早的古坟就是出现在这里。以后逐渐增加的古坟，基本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构成了一种层级的效忠关系：“地方领袖的等级关系正在不断发展，同时他们必须效忠于一批现在被称为‘大和王国’的统治者。”

在大和最强大的时候，有一位天皇即日本第十六代天皇仁德天皇，他的坟墓被日本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甚至大于胡夫金字塔和秦始皇陵。坐落于大阪府堺市大仙町的仁德天皇陵占地面积47万平方米，全长486米，后圆部直径约249米、高约35米，前方部宽约305米、高约33米，周围有三道壕沟保护。曾有土木专家推算过，大坟所用的总土方约1 405 866立方米。这些土方如以一人之力，从平均200米外的地点搬运而来，当共需1 406 000工次，以千人之力搬运而来，当共需4年。这座宏伟的陵墓也说明了大和国在日本诸国中的重要地位。

彼时的大和国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征服欲，不断骚扰和折腾的对象就是朝鲜半岛的国家。在4世纪中叶以及4世纪末期，朝鲜半岛的百济想利用日本的势力对付当时的新罗和高句丽，结果引狼入室——大和派兵直接占领了百济的国土，百济被迫成为日本的朝贡国。随后，大和国又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新罗和高句丽。但高句丽这个国家显然也不是好对付的，第一次打败了日本的属国百济，随后又把大和的军队逼走，并在5年之后又一次打败了大和国。之后，两个地区终于消停了一阵子。

大和国此时在日本的地位已经非常牢固了，并且像很多国家一样，出现了很多富有的、政治势力强大的家族，我们后文说到的苏我氏就是其中的一个。体现政权的合法性最好的还是有神相助，于是在日本最古老的书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出现了这样的记载：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并且这一天，还被后世定为日本的“建国纪念日”。不过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公元592年登基的推古女皇以上的33代天皇，几乎都是虚构的。这场虚构，却将天皇家完成了从神到人的转换。不管日本的政治在日后由谁来掌权，天皇是否有实权，天皇作为国家象征的意义从未减弱过。一直持续到近代，天皇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仍然具有无上的地位。当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这个民族对一些事情的执著。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公元6世纪，日本一如既往地处在在中国的影响下。6世纪中叶，佛教经中国传到朝鲜再由朝鲜传入日本。公元552年，百济的圣明王向日本天皇进献了一些佛像、经论、幡盖等佛教物品，还写了一封非常真挚的信件劝说天皇弘扬佛法，这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日本的开始。当然，任何新鲜的事物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在人们看来都是怪异的：当时的日本人不知佛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尤其还是个外来的神仙，所以礼佛的人非常少。百济进献的佛像，还引发了一场朝廷贵族的大讨论。不过佛教还是在众多挫折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到佛教传播近40年的时候，日

本开始了一个比较辉煌的时代——“飞鸟时代”。彼时圣德太子摄政，下诏传播佛教，贵族大臣竞造佛奈良，从此佛教广传于日本。由于圣德太子的弘扬，佛教在日本很快得到流传。据推古三十二年统计，时有寺46所，僧816人，尼569人。此外，佛教还影响了日本的文化、音乐、艺术以及建筑等各个方面。

不过相对佛教，另一件事对日本影响更为重大——隋朝统一。在经历了汉魏南北朝一系列分崩离析的折腾之后，公元589年，48岁的隋文帝杨坚派遣大军挥戈南下，毫不留情地把苟延残喘的陈朝给灭了，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同一年琉球群岛也宣布服从隋朝的统治。西北的突厥可汗，看见势头如此，也表示愿意永世归顺，即使是给隋朝当牛做马也不在乎。可以说，是杨坚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

光武力统一还是不行的，杨坚还颇费心思在国家的建设上，使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主要的表现就是：社会安定，人口迅速增长，农民积极开荒拓展耕地面积，隋朝的国库也很快充盈起来。当然，软环境也是一年比一年好。隋文帝杨坚还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概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在城市建设上，杨坚也不甘落后，自打即位后就开始大兴土木，营造了不少豪华宫殿，下令修建首都大兴城（即后来唐长安城原形），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构思，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他的继位者隋炀帝还举国家之力修建了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这样，隋朝不仅国际地位大大上升，本国的物流以及经济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一个强大的邻居的影响下，日本的国家形态一步一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表现在日本的政治斗争上，一方面，大和国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像隋朝一样，非常

耀眼地屹立于东方，或者很简单的目的——能够得到隋朝的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因为隋朝和其强大的后继者唐朝的缘故，日本很不幸地被拖入了几场战争，包括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几场战争，以及直接与唐朝军队的对峙，这些战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天皇政权的不稳固，以及天皇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左右朝堂的一直是地方的实力派。这种情况在武士阶层兴起之后，越发变本加厉。天皇更多的时间是躲在幕后被人崇拜着利用。

第二节 嫁入深宫的苏我氏女子们显赫的苏我氏

尽管大和家族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但日本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家族能够左右局势，另一个在日本从古坟时代到飞鸟时代代代都出大臣的有力氏族就是苏我氏。苏我氏家族的几位重要人物苏我稻目、苏我马子、苏我入鹿等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控制了日本的政局和天皇的废立。可以说，在人们崇敬天皇的时候，天皇只有在很少的时段里能真的掌握政权，真正的实权还是在地方实力派的手里。比起中国的皇帝来，天皇很难与“专制”这种词扯上关系。

有比较详细记载的苏我氏的重头人物，要从活跃在6世纪中期日本政治舞台上的苏我稻目开始。

苏我氏作为一个家族兴起的历史，在日本的史书上没有特别清楚的记载。提起苏我氏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雄霸一方的豪族了，主要活动的地方是今天的大阪、奈良一带。不过在彼时的日本，掌握先进技术的家族基本上是和贸易以及移民有关系的，所以苏我氏也很可能是一个移民家族或者由移民混血的家族，这也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叫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佛教传入日本的时候，苏我氏也是一个强烈的支持者。

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宗教向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佛教是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它的传入和当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当时的百济为了对抗高句丽，和中国南朝友好，同时又和日本结盟。佛教自384年就由东晋的僧侣传播到百济，又转而传入日本。《扶桑略记》（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私人编撰的史书）中关于司马达从大陆带来佛像的记事，是文献上最早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记录。日本继体天皇十六年（梁武帝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来到日本，在大和国高市郡板田原建立草席，置佛像进行礼拜。

渐渐地，佛教由个人行为或者民间行为向官方行为转变。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条记载，这一年百济的圣明王派人到日本，奉献金铜像一尊、幡盖及经论若干，并上表赞扬佛的功德——这一情节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对日本究竟要不要信奉佛教，钦明天皇难以决定，于是召集群臣开了一个讨论会。苏我稻目是个坚定的支持者，但是物部尾舆、中臣镰子却极力反对。天皇也不好确定这个新来的事物有什么用处，于是就在物部氏和中臣氏的建议下，把佛像赐给苏我氏，让他自己抱回家去礼拜。这个故事多少有些戏剧性，却是佛教传入日本的正式记录。自从日本信仰佛教以后，先进的中国文化以佛教为媒介，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促使日本产生了辉煌的飞鸟文化。而在是否尊崇佛教这件事情上，大和氏虽然表面上是采取中立的态度，实际上还是比较偏向苏我氏的。

在公元6世纪中叶宣化、钦明天皇在位的时候，苏我稻目被任命为大臣。苏我稻目无疑是个非常尽职的大臣，他为国库的充盈殚精竭虑，增加了不少粮米仓库。在礼佛方面，他也是一朵奇葩，甚至虔诚到将私人宅邸改造成寺院。理所当然的，苏我家族因为权势过重出现了政敌。苏我稻目掌握大权期间，因一直与当时同掌朝政的物

部氏争夺权力而敌对。而佛教进入日本的时候，就像进入中国一样，有支持者也就有反对者。552年10月发生的尊佛排佛事件，正式将苏我、物部两族敌对情绪推向高潮。

日本在大化改新以前，是以血缘氏族制度为其社会基础，政治和经济都是围绕氏族展开，因此日本人的固有信仰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氏族神。佛教对固有的民族生活来说显得非常异端，一时之间难以被传统接受。由于日本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逐渐走向解体，统一国家已经建立，但强大的家族仍然能够左右日本的时局。以物部氏、中臣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拥护传统神道，反对佛教，以苏我氏为代表的激进派则极力支持佛教。大和氏表面中立，实际上倒向苏我氏，因为关于佛教，大和氏也有自己的考量。说白了，这还是个国际关系的问题。大和政权为了在国外取得中国的支持而与高句丽抗争，在国内安定社会和发展生产，同时因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激烈倾轧的阀族斗争平息，所以主张信佛。此外，还可以用佛教和友邦搞好关系。

但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苏我稻目高高兴兴地把佛祖金铜像供奉在自己小垦国田家中，又非常慷慨地把自己飞鸟向原的私宅改为佛寺，率领苏我氏一大家子每天读读佛经、烧烧香。但光凭自己的家族是不够的，于是苏我稻目又积极筹划，弄了些钱四处修建寺院。慢慢地，佛教也逐渐成了点气候。但上天显然是对苏我氏不太好，过了没有多久，日本突然瘟疫横行，死了不少人，一股全国性的恐慌情绪形成。这下子，物部氏一看机会来了，在天皇面前奏了一本。大概就是说，苏我氏放着好好的本国神不去敬奉，反而对外来的神这么好，一定是得罪了本土的神仙，才降下如此灾祸。天皇这回没有什么话反驳了，物部氏趁机以天皇的命令开始大肆毁佛，将不少佛像扔到河中，甚至还放火烧掉了一些寺庙。苏我稻目很是心痛，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着实郁闷了一阵子。这下子，两家的梁子算是结大发了。

但苏我稻目对佛的崇敬之心并没有减弱一分。555年2月，百济圣明王在战乱中不幸被新罗的乱兵给杀掉了，他儿子惠王子哭哭啼啼地来到日本，希望日本能够协助他报这个杀父之仇。这位圣明王，就是前番送佛像给天皇的那位，也就是间接送佛像给苏我稻目的那位。本来，圣明王在位的时候，跟新罗的关系挺好的，但是553年，新罗却翻脸不认人，出兵攻占百济的东北地区，并在那里设了个新的州。从此百济与新罗的关系开始恶化。圣明王那是咽不下这口气啊，一怒之下于次年亲自征讨新罗，在狗川（今忠清北道沃川郡）中了新罗兵的埋伏，被乱兵杀死。

日本当然不可能去趟这个浑水，一来费银子，二来也没有什么理由出兵。于是这回轮到苏我稻目向惠王子宣扬佛教的理论了。苏我稻目不咸不淡地向惠王子阐述了圣明王被害之根源，还讲了一些保国长治久安的大道理。他告诫惠王子，应该多建佛寺，勤于祈祷，为国家祈福。只要心诚了，佛祖没有不答应的事情，那国家的繁荣富强自然指日可待。就这么着，把来人打发走了。

不久，苏我稻目被朝廷外派做官去了，连着好几次，正好实现了他各地建屯仓的愿望。555年，他在吉备五郡设白猪屯仓，556年秋7月在备前儿岛郡、冬10月在倭国高市郡等处，也分别设立了屯仓。苏我稻目年纪也一年一年地大了，570年春3月1日，苏我稻目去世。苏我家族的掌权者正式变成了苏我马子。

苏我马子，是苏我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正是这个人开了日本豪族与天皇联姻的先河。苏我马子，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人才。《日本书纪》第22卷上说他文武兼备，“有智有勇，处事果断，敬奉佛教”。苏我马子的家在飞鸟川边，院子里面有一片小湖，湖中筑了小岛。为此，人家叫他岛大臣。与相对兢兢业业的父亲不同，苏我马子确实是非常擅长谋略的。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婚姻关系来加强自己家族的地位。苏我氏的女子们在他的安排下，嫁入了皇宫。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婚姻与宗教一样，都是非常政治性的东西。以婚姻来调和矛盾、加强政治合作，似乎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汉朝和亲匈奴，唐朝和亲吐蕃，清代皇室和蒙古的联姻基本都是这个道理。擅长谋略的苏我马子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手法，实际上这种做法在苏我稻目的时候就开始了：苏我稻目成功地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钦明天皇，不过她们都没有成为皇后。苏我马子掌握大权的时候，就更加积极地将苏我家的女子们送到皇室中去，目标是皇后的位子。

公元571年，在苏我稻目去世后不久，钦明天皇也病逝了，由其次子敏达太子继位。敏达天皇即位后，继续任命物部守屋为大连，并任命苏我马子为大臣。从职位上看，大连是大臣中的最高职位。因为这个敏达天皇也对佛教不大感冒，所以，物部氏的职位要稍稍高于苏我氏一些。不过恰好这时敏达天皇的皇后广姬病逝了，于是苏我马子就积极地给天皇介绍对象，把自己姐姐的女儿炊屋姬介绍给天皇做皇后。其实天皇也挺可怜的，一般大臣开了口，也就要照顾一下大臣的面子。而且这个炊屋姬也是比较有来头的，她的母亲坚盐媛是敏达天皇的父亲钦明天皇的妃子——总之，日本皇室的血统是相当混乱的，不过这些八卦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这么一来，苏我氏的地位一下就高起来了，一方面本身具有实力，另一方面，又成了皇后的娘家，这地位就愈发稳固了，可以和物部氏一较高低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炊屋姬才貌双全，最后居然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天皇——推古天皇。

到了582年，苏我马子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尊崇佛教的行动。他首先将两尊来自百济的佛像安顿在自己家中，自己也出家了，还招了三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子削发为尼，称“三尼”，即善信尼、禅藏尼与惠善尼。苏我马子礼佛的决心可见一斑了。可惜悲剧是会重演的，在苏我马子全心向佛的第二年，京城又发生了瘟疫，这下物部氏又抓住了把柄，奏请敏达天皇灭佛。敏达天皇本身不大喜欢佛教，于是默许了。物

部家的大连守屋亲赴寺院放火焚烧了佛像佛殿，连三尼也一同遭受责罚。苏我马子简直是痛不欲生，一下子生了场大病。不过苏我马子是谁，怎么会这么容易放弃。于是他不顾自己重病的身體，上奏请求以佛力治愈。天皇也不是非常苛刻的人，就表示你一个人信就行了，别再折腾别人也信，同时把那三个尼姑也还给他了。苏我马子马上又重建了寺院，迎佛供奉。

敏达天皇也是个短命的天皇，到了584年秋天，就驾鹤西去了。他自己没有子嗣，于是他的四弟弟也就是炊屋姬同父同母的兄长继承皇位，是为用明天皇。这个用明天皇也以苏我马子为大臣、物部守屋为大连，职位依旧。苏我马子虽然控制了天皇的后宫，却难以控制天皇本人，用明天皇也是偏向物部家族的。用明天皇的寿命也很短，即位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这下子苏我马子决定来个大手笔了。当时的皇子叫做穴穗部皇子，有物部氏作为后盾，而苏我马子则坚持让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继位做女皇。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穴穗部皇子给咔嚓掉了，还派兵把物部氏的大本营给包围了。物部氏也决心和苏我氏一拼到底，奈何实力稍弱，这一打起来，财力也靠不住了，田庄都被没收，一下子就一蹶不振了。苏我氏的政敌，就这么被消灭了。

肃清政敌之后的587年8月，苏我马子立泊濑部皇子为天皇，称崇峻天皇。崇峻天皇很不甘心做苏我氏的傀儡，想着除去这个心腹大患。但天皇显然比不上苏我氏的那股凶狠劲，还没有找到机会呢，就先被苏我氏给刺杀了。苏我马子终于心愿得偿，立了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为女皇。一方面，炊屋姬是钦明天皇的皇女，另一方面又是苏我马子的外甥女，苏我氏的巅峰时刻来临了。592年12月，炊屋姬正式登基，即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女天皇推古天皇。次年，女皇立用明天皇次子圣德太子为皇太子，总摄朝政。

这下，再也没有人反对苏我氏礼佛了。佛教等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可以正大光明

地传播起来了。

第三节 向“隋朝中心观”宣战

且不去管苏我氏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势力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日本确实是在这个时代开始自信起来了。即使这个家族在日后的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苏我氏仍然与之后更为强大的飞鸟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

前面已经讲到，苏我氏家族本身可能是一个移民家族，其祖先是朝鲜人或者是中国人也未可知。于是，在苏我氏的辉煌时期，苏我氏继续保护朝鲜的移民，保护了朝鲜的移民就等于是对各种手工业者和工匠进行了保护。而这些人，不管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上那一批最能创造价值的人。有了这些人，一个社会才有技术的进步和商品的流通。

在苏我氏掌权的时候，相对统一的国家和政策的保护，让先进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大和国流淌的血液一天比一天新鲜。在古坟时代的墓葬中，曾经出土了各种铁制农具，说明在公元6世纪，铁制农具已经非常流行了。在使用先进的技术方面，作为一个小国的日本，并没有落后多少。

随着铁制工具的改良和普及，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开垦，并且有很好的水利灌溉措施，各地都纷纷筑堤、修池。日本传统的农作物是水稻，由于工具的进步，即使那些不能浇水的土地也一一被利用起来。旱地耕作技术在6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传播到关东地区。如果这个时候，在秋收之季，来一次穿越之旅，你也许会发现类似宫崎骏电影中的场景：蔚蓝的天空之下，田地被水流和道路有序地切割，木屋隐藏的绿树中，勤劳的日本农民素衣戴着斗笠，在田间耕作。收获的季节，会看见金黄的大麦、小麦，大豆、小豆，各种瓜果以及桑麻。

同时，在日本的市场上，各种商品也是前所未有的丰富：5世纪后流入日本的大陆移民，带去了先进的冶炼、制陶、纺织、金工技术，为日本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个时候的市场上，能买到各种铁器的成品和半成品，各种形状的铁板、斧头、锄头；用弥生时代的技术、在800摄氏度高温下制成的赤褐色陶器以及采用大陆的烧窑技术生产的灰色硬质陶器；各种装水或者粮米的器物，摆件。西至北九州，东至石川、势冈各县，到处都能看到这些东西。

各种麻丝和蚕丝的布料也能在市场上买到，这个时候的布料比之以前，织工已经更加细腻了，穿在身上不是那么毛糙了。

贵重金属制品为了迎合贵族们的爱好，也越来越精巧。金工方面的镀金、贴金、镶嵌、雕金等技术相当发达。精制的金工艺品有金铜制的冠，金和银制的耳坠子，铜或金铜制的手镯以及各种马具。反正这个时期的黄金，基本是用来装饰贵族生活的，普通百姓用不上，也不用考虑通货膨胀保值啥的。总而言之，这个时代日本的生活，虽然比不得当时的中国，但已经足够方便了。就算穿越过去，也不用害怕。

不过，你可能会不太习惯这时候日本的制度。毕竟，在皇族至高无上、贵族拥有绝对权威的社会，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压力还是满大的。

就像宠物有主人一样，在4世纪以后，日本实行的是部民制。如果你是中国或者朝鲜的移民，或者是战俘、被灭了的小国的平民、犯了罪的刑徒，那么对不起，你要去做天皇的私有民或者贵族的私有民了。这些部民都有自己的工种以及独特的名称，前面要冠以主人的名字、职业、地域等。比如说，所谓的田部民就是替皇室进行农业生产的私有民，顶头上司就是皇室主管土地和粮仓的部门。这些部门要替皇室开垦和耕种土地，说白了就是给天皇白干活的，和奴隶差不多。这些人虽然也有家室，但是毫无自由可言，皇室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得去哪里。不过他们活动的范

围大都在畿内地区。

还有一部分人，运气相对要好一些，他们属于传统的农民公社，属于田部，每年只要纳税就可以了。这些部民当中甚至要包括一些大小贵族。只要缴纳钱粮就会有一定的自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除了给皇室种地，部民们还得抽出一定的人力给皇室打打零工，干点其他体力活。总之，皇室就是靠这些部民养着的。

除了皇室，贵族也有自己的私有民，这些人和皇室的部民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贵族服务而已。比起身份更加低贱的奴婢，部民还要好一些。部民只需要遵从皇室和贵族的命令就可以了，有一定的自由，也不能被买卖。奴婢的生命权全部掌握在主人手中，被打被骂被随意杀害是常有的事情。

到大和国的时候，部民制已经不是那么受欢迎了，渐渐建立起来的是氏姓制。氏是由有力族长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一般以居住地或者职业作为家族的名号，后来就发展成为姓氏了。当然，这些姓氏都得得到天皇的认可才行。

一般能成为一个氏的首领的，都是比较有权威的人物，对内主持氏神的祭祀，裁决氏内的争论，对外代表本氏同他氏和朝廷交涉。幸运的话，氏的首领还可以到朝廷里任职。一个氏族的成员也是自由民，这个氏族有势力的话，还可以拥有奴婢。一旦被天皇赐姓，氏族就等于是受封的贵族了。天皇一般都是根据血统和职务来赐姓。

在这个氏族的基础上，整个政治体制的架构也变得清晰。天皇之下，是最有权势的大臣，称大连、大臣，辅佐天皇处理朝政。参与国政的有伴造、国造、县主。伴造

是世袭朝廷的某种职务，管理品部、子代、名代等部民的中小贵族，多姓首、造、连。国造是一国之长官，由朝廷派遣或任命臣服于大和朝廷的地方贵族，一般姓臣、君、公、连、直等。他们负责向朝廷缴纳贡品，提供劳力，从一族中选送给天皇做杂事的男女仆人。县主是国下面的行政单位县之首长，姓之长等。国造、县主也属于中小氏姓贵族。

到苏我氏全盛时期，日本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已经很完备了，并且有效地运作着。可以这么说，日本此时的政治之所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正是皇室与苏我氏不断斗争的结果。朝廷的权力和威信一方面促进了苏我氏的强大以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给日本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契机。

当然，这个制度并不是完美的，与以后以及现代的制度相比，它显得粗糙、暴力以及脆弱。真正系统的官僚体制到7世纪初才差不多像模像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苏我氏在促进官僚体制完备方面，有着比较大的贡献。

一个国家要自豪起来的话，文化是很重要的东西。文化这东西，本身是没谱的，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一个国家的独特的构建方式，都能成为文化。生活在一种文化范围内的人，都有一种奇妙的认同感：我们是一样的。对待陌生人的时候，更有一种类似炫耀的自豪感。

在彼时的中国面前，毫无疑问，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是自卑的：中国地大物博，有广阔的疆域、丰富的物产、华丽的建筑、完整的政治体系，最重要的是，有从汉代以来被独尊的儒家文化。它们的这种自卑感一直延续到今天。

转而再回来说日本，日本的古代是没有文字的。长久以来这个民族的知识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一代一代口头传下去的。不过，真是幸好有中国。早在1世纪的时候，

北九州一带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有所来往，中国的汉字就传到了日本，可能有一小部分日本人，稍微懂了点文字。到邪马台王国的时候，也就是说二百多年过去，日本已经有了懂汉字和会书写的人了。不过，这个数量估计是非常可怜的。到3世纪的时候，日本和新罗打仗，日本的神功皇后在新罗获得了一批书籍，既然能想到带回书籍，那一定是有会看书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是百济的王仁。显然，在学习儒学这方面，朝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

在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句丽三国鼎立的时代，儒学就已经开始在朝鲜半岛安营扎寨了。大概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朝鲜就有了“五经”（《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在高句丽，学习“五经”似乎是件很时髦的事情，不但“五经”受宠，顺便连中国的历史也被学习起来了，这里边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到了4世纪的时候，大概在372年，高句丽甚至彻底模仿汉朝，设立了“太学”，将儒学作为正式的课程，传授给贵族的子弟们。而百济，也比高句丽晚不了多少，设置了一个“博士”的职位，给那些精通儒家经典的人——来自中国的文化就这样在朝鲜半岛扎根了。

不止如此，因为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在朝鲜半岛还掀起了一股留学风。6世纪的时候，百济特地派了两拨使臣到中国的南朝，用礼物去交换一些儒家的典籍，邀请一些经学博士到百济去讲学，顺带还捎上一些工匠什么的。这样，在儒学的影响下，百济的社会秩序也渐渐文明起来，人们更加注重礼法，男女的衣服都有了很大的区别，朝廷也有了比较严肃的祭祀礼仪。和以前的原始部落比起来，那是大大的不同了。

百济的变化，很自然地就影响到了它的邻居日本。

在日本的一部典籍《古事记》中，记载了这么一条：应神天皇给百济国下了一道命

令，说如果他们国家有很贤能的人的话，那么，送几个到日本来。于是百济就照做了，不但送来了贤人，还送来了不少《论语》和《千字文》。这位所谓的贤人，就是把儒学传到日本的王仁。

话说王仁到达日本之后，就成了日本皇太子的老师。这位皇太子呢，也是个聪明的娃，学啥会啥，儒学从此在日本也就慢慢流行起来了。作为学者的王仁，在日本受到了很大的尊重。百济的许多五经博士看了，嗯，觉得这个待遇非常不错，于是就纷纷东渡日本。他们不但带来了儒家的知识，还带来不少工匠——这些工匠有的精通医学，有的精通算学和历法。日本的政府很是高兴，敞开怀抱欢迎这些人，对他们纷纷给予官职，赐予姓氏。

当时的朝鲜汉籍移民的数量还是不少的，天皇一一重用这些人。这样，至少在日本的贵族和上层社会中，汉字和汉文化获得一定的传播和认同。以至于后来的“大化改新”，远远望去，都是儒家的味道。简而言之，中国文化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印到了日本的骨子里了。

这时候在天皇的诏书中，都可以看到“君以民为本”这样充满宣传性和欺骗性的字眼。在儒学的影响下，日本人还前所未有地重视起孝顺来。特别孝顺的子女，会受到朝廷的嘉奖；守节的妇女，也会受到表彰；世代孝顺的家庭，连税也不用交了。日本还因为儒学改变了不少陋习，尤其是近亲结婚——当然，皇室婚姻在其后的历史中，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日本人呢，底气就渐渐地足起来，表现在外交方面，就是在国际上力求把自己与大国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关于佛教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略微提到了一些。下面我们要说的，是

佛教对日本的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作为一个外来者，佛教能披荆斩棘、威风凛凛地成为日本三大宗教之一，现在看来，也是件神奇的事情。这其中，少不了苏我氏家族的功劳。

虽然佛教的传播在日本也有相当的腥风血雨，不过在佛教的影响下，日本社会还是有不少变化的。

佛教，在东亚和南亚，是被人喜欢的宗教，它的宗旨在于拯救受苦的人。它还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宗教体系，比如学说、艺术、医学、音乐、典礼，乃至死后的秩序。这套体系对于一个信仰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天堂和地狱的区别，所以用做善事去交换一个善果，成为人们行为的初衷。只要做了善事，例如：修桥铺路、济贫助困、不杀生、吃素，等等，在今生或者来世，都会得到一个好的回报。

在佛教最初进入日本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体系，所以遭到维护传统宗教的物部家族的强烈排斥。物部家族手段激烈，把佛像投入河中，又纵火焚烧伽蓝寺院，一时各地佛寺皆被查封，佛像被毁。苏我氏将这一仇恨记在心中，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将物部氏灭族。这种冤冤相报的精神，显然有违佛教的宗旨。

不过，在苏我氏取得胜利之后，佛教广泛而深入地进入贵族和平民的日常生活之后，对抗冲突就变得比较平和了。因为一旦所有的氏族或者政治势力，都平等地信仰佛教——佛教成了公共信仰之后，氏族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积怨，就有了共同的解决渠道，贵族、氏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缓和。从某种程度来讲，这对日本国家的发展，是件和谐得不能再和谐的事情。

因为宗教体系之于国家制度的独立性，佛教传播的空间，需要特别的装饰：雕梁画栋、园艺、佛像、各种佛教艺术品，都要费尽心思，使得其表现得富有佛教的艺术

感——这是个需要艺术或者是人才的行当，同时也是个拉动内需的行业。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座寺庙，这是由苏我氏家族主持建造的。由这座寺庙，开始了飞鸟时代的辉煌，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在推广佛教信仰的同时，日本创造了令当今艺术家所惊叹的、高水平的艺术作品。这些绚烂的文化财产，可以说是佛教对于日本文化的重要贡献。

以飞鸟寺为例，这座寺院全部是由来自百济的工匠建造而成的。它的雄伟的伽蓝寺所采取的环绕五重塔的“一塔三金堂”的模式，是承袭了以中国的三合院模式为起源的高句丽模式。本尊的释迦如来坐像（飞鸟大佛）是日本最古老的佛像，其规模是现存的法隆寺的三倍。而飞鸟文化的另一代表法隆寺，则是世界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物群。法隆寺的金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物，建筑上“云形肘托”、“云斗”等特点脉承中国北魏、北齐的建筑风格。这里珍藏的释迦三尊佛像是中国梁朝移民的后裔制造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总之，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完成自身的蜕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让日本有了灿烂的艺术、相关工艺，并由此带来了文化上的整合。这一切，增加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分量。

公元607年7月3日这一天，隋炀帝出了“会议室”，心情那是相当的不愉悦啊。

此时的隋炀帝，即位没有几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他还兴致勃勃、大张旗鼓地乘车到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一带，向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炫耀隋朝的强大。他命人在这里搞了一顶能容纳千人的帐篷。突厥的启民可汗率领自己的部下到帐中毕恭毕敬地朝拜。隋炀帝心里很是高兴，用上好的宴席款待可汗。不但如此，隋炀帝还将两千匹绫罗绸缎和不少车马，作为一个居高位者的礼物送给了启民可汗和他的部下。自然，这种举动获得了突厥部落的称颂，隋炀帝龙心大

悦，高高兴兴地回了朝。

然后在7月3日这一天，隋炀帝接见了来自倭国的使臣。

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的时候，日本国内也出现了不小的震荡。苏我氏雄起，灭了一直和他们作对的物部氏，立了崇峻天皇。崇峻天皇本来想采取点策略，拿回自己的权力，不过还是没有打败苏我氏，反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接下来，苏我氏干脆立了自己的外甥女为推古天皇，把大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593年，推古天皇立了自己的侄子为圣德太子，这娘俩儿，开始了日本的一个传奇时代。

圣德太子也是一个儒家文化控。这个人天赋异禀，生下来就能说话，等到成年的时候，简直就是圣人一个。即使十个人同时和他辩论，他也能立于不败之地。圣德太子对“五经”、老庄甚至魏晋玄学都有所涉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可见一斑。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很想了解这个位于西方的强大的邻居，从公元600年到614年这短短的15年间，日本朝廷多次派出使臣出使中国，几乎平均三年一次。

日本之所以频频派出使臣，另一个缘故就是，朝鲜半岛那些国家频频和中国眉来眼去，而彼时的倭国和新罗的关系不是那么友好，因此急需与隋朝建交来加强自己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优势地位——要是被大国平等地承认，那对于提升自己身价是最美好的事情了。另外，隋朝的统一与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繁荣，确实也让日本震撼，爱学习和探索的日本人就特想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让隋炀帝生气的事情就来了。607年，日本使臣小野妹子等人来到中国，向隋炀帝递上了国书，上面写着：听说贵国皇帝重兴佛法，所以特地派了些人来朝拜，另外还派了数十位僧人来学习佛法。国书说到这里还是比较正常的，按照中国古代外交的“朝拜”体系，或者是“中国中心观”来看，“朝拜”这个词，用得还是比

较准确的。因为这一直是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的态度：你们弱，你们小，你们没有文化，你们愚昧、落后、野蛮，朝拜我们、尊重我们是应该的不是？但是，往下一看，隋炀帝就生气了，最后的问候语居然是“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样的话。这还了得，你一个蕞尔小国，居然将你们国家君主与我们国家的皇帝放在一样的位置上，这不单单是无礼，简直就是冒犯，往更严重了说，这简直就是侮辱。下朝之后，隋炀帝十分愤怒，对主管接待“落后国家”的大臣说：倭国这等蛮夷，简直是太无礼了，以后不要再搭理他们了。

对于隋炀帝来说，为这种事情生气，也是正常的。作为泱泱大国，有史以来，敢这么说话，又实际上没有太多资本的周边“蛮夷”，恐怕只有日本了。

隋炀帝本人恃才傲物、虚荣心强，而此时的隋朝正处在周边国家极力的推崇和热捧当中，以为自己已经威震八方了。不过，隋炀帝在愤怒之下，还是保持了理智，这一方面确实显示了一个大国皇帝的大度，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小野妹子等人的机灵。大概在得知这位大国皇帝生气之后，小野妹子也知道这次是摸了老虎屁股了，于是，日本人特有的谦卑和细心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得知大国皇帝生气，可能会导致外交失败的情况下，实用主义涌上了小野妹子的心头：脸面神马的，一边待着去吧，利益才是重要的。于是，小野妹子星夜前往鸿胪寺卿的家中，就此事详尽地作了一番解释。大意是，我们国家呢，位置偏僻，文化比较荒芜，而且本来粗通文墨的人就很少，国书写成这样子，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很大意和无礼了，还请贵国皇帝担待一下。说这话的同时，还不忘说隋朝地大物博以及文化博大精深之类的话。鸿胪寺卿把这话转达给了隋炀帝。隋炀帝一听，心里立马舒服了，大袖一挥，此事了了。小野妹子一行，痛痛快快地回日本报告出使隋朝顺利去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并且还没有影响两国下一步的邦交正常化。608年，小野妹子又带了一批使臣来中国访问，隋炀帝不但客气接待，还派了一个13人

的回访使团，高高兴兴地去了日本。

虽然这次日本在外交平等上表达的意愿，有点令日本人沮丧，但这并不能阻挡日本成为一个大国的野心以及朝之努力的斗志。此时日本的女天皇和圣德太子正在酝酿并实施着一场变革，试图让日本变为一个更好、更能让人承认的国家。这就是在日本历史上很出名的“大化改新”。

第四节 “海龟” 们的黄金时代

“‘大化改新’是一场古代日本以学习和模仿古代中国隋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势力，形成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一般来说，正史都这么写，没准高中老师也这么教你。没错，若干年来，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好像世界各国的历史都可以统一划为一种理解模式——阶段论、阶级斗争什么的。不过现在看来，所有的历史或者变革，似乎都可以这么来形容：这个社会一定是不和谐了，才会发生变革。

这种说法总是没有错误的，中国各朝的变法大抵如此。圣德太子的时候，日本的社会已经相当不和谐了，这种不和谐呈现在日本的各个阶层之中。

首先，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部民们生活资源越来越匮乏，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7世纪上半叶，购买土地成为贵族眼里很好的投资方式，整个国家的资本几乎都往土地上涌。贵族们买了地，再租给佃户们耕种。《日本书纪》有这么一条记载：大概在大化元年的时候，贵族们“割国县山海林野池田以为己财，争战不已”。围绕土地的战争非常激烈，大家族之间偶尔也发生流血冲突。

贵族们将获取的土地出租给百姓，租金按年限收取，每年一收。这种状况的后果，就是穷人维持温饱就要耗费毕生的精力，而贵族们则越来越有钱。社会阶层是两头大中间小，极为不稳定。同时，处在上层的贵族们因为这种资源的争斗，造成了国家资源的不断流失：本应该交给国家的收入被层层截留，这样不但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统治集团本身的稳定性。大的家族控制了财富，下一步就是控制权力。苏我马子甚至把主意打到了天皇身上。苏我马子曾向推古天皇要求割让葛城县，推古天皇对于这样的无理要求，非常直接地拒绝了。

与此同时，处在最底层的部民，也在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争取利益。部民除了要完成种田的任务之外，还要应付征兵、皇室的建筑工程，陵墓和寺院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这就好比《火影忍者》中火之国被“晓”破坏之后，那里的人们不是在扛木头就是在砸钉子的场景。活忙，还吃不好饭，甚至吃不上饭。徭役繁重，导致田地不能被及时照顾，粮食成了一个大问题。种粮食的吃不上粮食，大饥荒理所当然地出现了。那些体质差的老弱妇孺，成为最先受害的人。

“老者啃草根而死于道垂，幼者含乳以母子共死”的惨状时有发生。日本的民众还是比较温和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喜欢使用暴力。最初，部民们结伴逃入深山，但是这样似乎也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于是，有些人就干脆被逼上“梁山”做强盗去了，直接同政府对着干。

总之一句话，大化改新之前，世道很乱，不改不行。

在中国唐代的时候，外国人能来中国留学，是件很牛气的事情。因为唐朝才是当时的超级大国：有钱、有文化、有水平。于是，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有不少人远涉重洋，来到唐朝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还参加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唐朝做官；有的，甚至直接移民了。

日本官方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是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写到这里，禁不住腹诽，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要清朝末年才出发，比日本晚了那不是一点半点啊。日本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很实在：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所以当时日本的留学生规模都相当庞大，动辄一百甚至数百人。在派留学生的同时，日本也想展示一下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准，并且期望与中国人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在出使中国的队伍中，还能见到船匠、翻译人员、医师、画师、史生、锻生、铸生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

唐朝对待这些留学生的政策还是非常优厚的，不但为其提供食宿，还提供“奖学金”。日本学者大庭修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与现在很多人通过“留洋”镀金不同，当时的日本留学生，还是非常踏实的，有的在中国一读就是十年，超过现在国际顶尖大学博士学位的获得年限了。来唐朝求学的日本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中央的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唐代典章制度。其中一个著名留学生，就是阿倍仲麻吕。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的时候，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晁衡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之职，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并有诗篇唱和。

在中国待的时间长，难免会想家，晁衡于是中途回家一趟。不知道谁传回一个消息，说他在海上遇到台风溺水而死了。李白闻讯后着实痛哭流涕了一番，还写了《哭晁卿衡》一诗。不过实际晁衡并没有死，几年之后，他又辗转返回长安，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长眠于中国。日本另一个著名的留唐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唐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在长安留学17年。由于才学出众，唐玄宗特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

没有确切的资料显示，当时这些留学生的汉语水准到底如何，不过肯定是有统一的考试的。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经费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因为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还好，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

当圣德太子因为国内日渐突出的矛盾焦头烂额时，他派出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了。

公元623年留学生惠日等上奏推古天皇，认为“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于是，朝廷决定召回继续在唐学习的留学生。这其中的几位留学生，已经在中国居住了二三十年，已经是“骨灰级”的留学生了，甚至经历了隋唐两代，成为地道的“中国通”。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自己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在部分贵族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改革的“春风”就这么吹起来了。这时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626—671）和中臣镰足（614—669）。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官的家庭，相传幼年好学，广览书传，尤其潜心于兵法兼政书《六韬》。这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中国通。

苏我氏到了这个时代，树大招风，加上自身的专制和蛮横，招致了朝野上下的很多

反对之声。虽然苏我氏家族一直权倾朝野，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过得也是相当不容易。即使是自己家族的女人做了天皇，这种状况还是如此。

这确实是个很令苏我氏家族郁闷的结果——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

一心想怎么改革一下，让日本能够摆脱现有的社会中的重重矛盾，在国际社会上出人头地。苏我马子把自己的外甥女嫁到皇室，真的就如同泼出去的水，最后都向着婆家了。其实这也是件令人很为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女子，有一个高调的娘家，都很尴尬，尤其是不甚讲理的娘家。还是在崇峻天皇的时候，苏我马子就很讨人厌了，非常的专横跋扈。有一次，有人向崇峻天皇献了一头山猪，崇峻天皇感叹说：我多希望有一天能像斩掉这头山猪一样斩了苏我马子。因为知道苏我马子对皇室不利，所以崇峻天皇在宫中搞了很多卫兵。苏我马子也很恐惧，就密谋干掉崇峻天皇。等到推古天皇即位的时候，苏我马子就更得瑟了。有一次他生病，居然有一千个男女为了他出家了。

在女天皇的宝座还没有坐热乎的时候，据说苏我马子曾经请求女皇把葛城赐给他作为领地，但是女王委婉地说：“我也是苏我氏家族的人，按理说，只要是舅舅提出来的要求，晚上提出的就不会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总不会拖到天黑，我总是放在首位。但此次，舅舅的请求太过分了。如果我答应了，就等于是把领地无缘无故地下赐。这样，我在后代君王乃至史书那里，都会被骂为愚蠢。”

这位女天皇，已经不买苏我马子的账了。为了平衡朝廷的权力，女天皇册封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为东宫，同时授予他“摄政”的头衔，期望他能和苏我氏抗衡。这位东宫，就是圣德太子。这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太子。在执政时期，他派出很多留学生去中国，学习隋唐的制度、礼仪与学问。这些“海龟”受到朝廷的重视，圣德太子多方采纳留学生的意见，决定着手进行改革。圣德太子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

位、制定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和编纂史书等。

冠位制定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第二年开始实施。冠位分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和小智。之所以制定冠位，圣德太子的初衷不外乎是想在世家大族之外，另建一套以才能、功绩为主要选拔手段的贵族体系。不过，这个冠位“员无定数”，又没有什么职权，所以它不是官职，而是授予贵族的荣爵。冠位不能世袭。因此冠位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氏姓门阀势力和选拔人才的作用，并推进了贵族的官僚化和以天皇为首的官僚体制的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苏我氏权力的泛滥。

在制定冠位的同时，圣德太子还制定了17条宪法。说是宪法，其实和法律并没有多大的关系。17条宪法更像一个思想教科书，目的是宣扬中国的儒学思想，向日本人灌输“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思想，加强皇室地位和皇权。

圣德太子还特别推崇佛教。确实，佛教提出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槃等教义，对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是非常有必要的。要底层民众断欲爱、求解脱，安分守己，脱离斗争，对统治者来讲，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圣德太子更希望通过振兴佛教，以树立一个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加强皇权。为此，圣德太子自己也投入了佛教，以自己的名义带头建立斑鸣寺（法隆寺的前身），还亲自在宫中讲解佛经。在皇室的推崇和倡导下，日本国内很快出现了弘扬佛法、竞造佛寺的局面。到推古天皇三十二年（624年），日本寺院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事僧侣职业的人也大大增加。

除以上之外，圣德太子在中日邦交方面也作出了很多努力。

圣德太子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氏姓贵族尤其是苏我氏的势力，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社会危机。而苏我氏愈加跋扈起来。苏我马子去世之后，苏我家掌权的人物是苏我虾夷，在推古天皇去世之后，苏我虾夷和他爹一样，也妄想在天皇的人选上插一手。他很想自己定嗣位，又怕不能服众。苏我氏一派极力拥戴田村皇子，而境部臣摩理势等则推荐山背大兄（圣德太子之子），并几度与苏我虾夷发生冲突。山背大兄的支持者实在是太少，苏我虾夷又寻了个机会，将几个山背大兄的支持者捉住杀掉了。最终，在清除异己之后，苏我虾夷选立了自己心目中的天皇。于是，苏我氏又一次得意起来，气焰熏天：大兴土木，征徭役、筑私宅、修陵寝，出入招摇过市，排场不亚于天皇。更甚的是，苏我虾夷私自将紫冠授予苏我入鹿，但按照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冠紫者乃一品大德，授予权在天皇。苏我氏的举动，着实激怒了皇室。公元641年，日本又换了个天皇叫皇极天皇。这回，苏我虾夷的儿子苏我入鹿也进入了权力的核心。再一次轮到天皇换班的时候，皇室的决心终于下了。

苏我入鹿比之父亲和祖父更为蛮横无谋，他的想法更是斩草除根，希望将圣德太子的支脉全部干掉。苏我入鹿袭击山背大兄王，逼迫上宫王族（圣德太子一族）自杀。极端疯狂终于遭到反击，645年，中大兄皇子等人在皇极天皇的面前杀了苏我入鹿。同时，苏我氏的同党也遭到了清洗，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苏我氏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进行一场革新的最大敌人，就这样消失了，接下来即位的是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中臣镰足为内臣，苏我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吴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留学生，尊崇汉文化。这个革新政权建立后，仿中国建年号为大化，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大化元年12月，首都由飞鸟迁至难波（今大阪市）。大化

二年（646年）元旦，发布《改新之诏》，接着陆续颁布了革新措施。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

都说“平安时代”是山寨唐朝，但真正的山寨，始于大化改新。大化改新的基本精神，就是模仿唐朝的制度乃至精神和文化。

其第一条主要内容就是：建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改新之诏》载：“罢昔在天皇等所立于代之民，处处屯仓及别臣、连、伴造、国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处处田庄。”用今天的话来说，新政府废除了皇室的屯仓、贵族的田庄以及部民，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普通百姓获得了一个“公民”的身份，当然，这种公民的权利是非常有限的。

《改新之诏》写道：“初造户籍、计账、班田收授之法。”新的班田法施行之后，大概是这样的：每个日本男性公民到了一定年纪，都会获得一块土地，女子则会获得男子的三分之二的土地，奴婢也会获得一定的土地。当然，这等于是向国家租了一块土地，要按时向国家交租。一旦土地的主人去世，那么这块地就要被收回，分配给另外的人口。除了交地租，百姓还要服一定的徭役，如果不出徭役，则要以一定的实物来替代。除了这些固定的钱物和人力，出产特产的地方每年还要进贡一定的特产。

大化改新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中央集权制。新政权建立不久，就提出了一个“天覆地载，帝道唯一”的口号，加强皇室的权威。同时，改革官制，大化五年（649年）下诏“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里长治理。这样，把原有氏姓贵族统辖的大小诸国，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些政策取自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两者在形式上虽有差异，但其性质都是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

大化改新，从理论上说，是为日本规划一个美好的蓝图。不过，这种改新的效果，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显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处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势力往往还有不同的诉求。这些诉求，基本上不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的。彼时，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直接将日本拖入了与超级大国唐朝的战争。

第五节 一场看起来很“二” 的战争：白村江海战

朝鲜半岛，在东亚，从古到今，都是个不安分的地方。

隋朝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第二年，百万隋兵先后开赴辽东战场。这场战争，一直被后世历史学家认为是隋炀帝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产物。这次以及随后的征伐朝鲜半岛的活动，耗费了隋朝全国的军力、民力和财力，隋炀帝几乎是把整个国家的命运都毫不客气地压到这场战争上去了。理所当然，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

隋朝建立，其广阔的地域对东亚的局势产生了非常震撼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周边国家力图寻求与隋朝的平等对话，比如日本的那次平等的外交术语就是其中表现之一。在对外关系上，隋朝将自己比做辉煌的汉朝。隋文帝曾大举讨伐突厥。很快，突厥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等纷纷臣服于隋。契丹部落随后也纷纷内附，周边国家均感受到隋朝的强大压力。于是，隋炀帝认为，这一套应该适合更远的地方，包括东北的朝鲜半岛以及东方的日本。

大业年间，由于隋朝使得东西突厥臣服，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而唯有高句丽，仍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时，高句丽还试图搞好和突厥的关系，阻碍其他国家臣服隋朝。被一个蕞尔小国私下里搞这种手段，隋朝最终怒了。于是，大业七年，隋炀帝下诏讨伐高句丽，想除掉这

个阻碍其主导东亚秩序的眼中钉。

大业八年，隋炀帝集合全国兵力113万大军，汇集在京城西南，然后分批浩浩荡荡奔往高句丽。可以想见其场面是多么壮观：113万大军分成左右各12军，日发一军，相去40里，经过40天全军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960里。炀帝的御营共有12卫、3台、5省、9寺，分别隶属内、外、前、后、左、右6军，依次最后出发，又连绵80里。如此浩大的声势，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若再加上200多万运送军需的民工，从这条奔向辽东的路走过，真可以想象寸草不生的样子了。

此等规模，很难想象最后的结局很灰头土脸吧？

事实就是如此。

隋炀帝此次下了决心倾巢而出，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不过隋朝原本没有那么多军队，有很大一部分是临时凑数的，谈不上有太大的功用。隋炀帝一副踏平朝鲜半岛的架势过去了，却带来超重的后勤负担。这个一百多万的大军行动迟缓、应变能力差。高句丽军队人数虽少，但相当精悍，对付这个庞大的军队，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总算不辱使命，几次将隋军打得落花流水。隋炀帝生气之余，也产生了心理阴影和诸多遗憾——这辈子，高句丽是动不了了。不但动不了高句丽，后方还起火了：农民起义，地方势力崛起加叛乱。很快，隋炀帝自己也见上帝去了。

接下来对付高句丽是唐朝的事情了。

隋炀帝没打赢高句丽，直接影响了唐朝对高句丽的政策，那就是：接着打。这要怪高句丽并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形势，坚持要与比隋朝更强大的唐朝对抗。在这一点上，显然，它的邻居新罗要灵活一些。本来，唐朝建立之初，曾与高句丽互派使者

通好。当时朝鲜半岛并存三个独立国家，北部为高句丽，南部偏东为新罗，南部偏西为百济。其中新罗一直与唐朝保持朝贡关系。这几个国家之间也是不停地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九月，新罗派遣使者到唐朝诉苦来了，说百济攻占其四十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与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于是派人出使高句丽，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这场纠纷，但高句丽人不买唐朝的账，于是唐太宗也感觉被这个小国深深侮辱了，决定发兵东征高句丽。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唐太宗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句丽。

作为高句丽的邻居日本，此时在大化改新的刺激下有点晕头转向，居然也跋山涉水，加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当中。这事，要从大化改新的影响说起了。

大化改新除了其政策比较明晰之外，其余都是比较混乱的，尤其是朝廷各种势力的斗争，以及在这种斗争过程中苏我氏的灭亡。

在大化改新实施三个月之后，一场谋反的戏码就上演了。古人大兄皇子以出家为名逃往吉野，勾结苏我入鹿的亲族和旧臣策划叛乱，因为消息泄露而被杀。公元649年，苏我马子的另一个孙子苏我日向诬告仓山田石川麿意图谋逆。仓山田石川麿这个人是大兄皇子的岳父，显然他也得不到女婿的信任，中大兄皇子非常草率地就把自己的老丈人给咔嚓了。而他的老丈人，还是围剿苏我氏家族的功臣之一。该皇子的专断，引起了皇室其他成员的严重不满，当时在位的孝德天皇也非常不满意中大兄皇子，两人吵架几乎是家常便饭了。

公元653年，中大兄皇子上书建议天皇将都城迁回飞鸟地区，天皇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大兄皇子一怒之下，竟然带了一帮大臣，自己回飞鸟去了。孝德天皇感到自己受到了严重的蔑视和不敬，郁闷加愤怒，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

不知道为什么中大兄皇子没有顺理成章地继承帝位，倒是他娘出来接了这个烂摊子。齐明天皇在飞鸟登基了——这倒是符合了中大兄皇子的愿望。孝德天皇的儿子有间皇子很不乐意啊，自己的爹死了，自己连干饭也吃不上，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女人做了天皇。于是，有间皇子就想了一个计策。公元658年，有间皇子劝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前往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想趁机在飞鸟发动叛乱，不过计谋被识破，他也被杀掉了。

这一连串的折腾，使中大兄皇子也觉得很费劲。他娘齐明天皇也是个不省心的，整天想着如何把宫殿修得更华丽一些，老百姓为此叫苦连天的。

鉴于疲惫不堪地应付国内的麻烦事，中大兄皇子想了一个馊主意：参与到朝鲜战争中去，这样，大家就不会拿国内的事情说事了。公元661年，母子二人一起到九州筑紫地区，策划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

这原本是一场日本可以避免的战争，但日本硬生生地将自己拉进去了。对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文化交流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白村江水战”，就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连贯的，隋朝对待周边国家的态度，直接延续到唐朝。

当时的朝鲜半岛，北部是高句丽，南部西为百济，东为新罗。原本高句丽的疆域最大，国力最强。高句丽国也很顽强，民风彪悍，军队精良，隋炀帝、唐太宗数次发兵前往征伐，都未能使其臣服。唐高宗继位以后，鉴于往事，采取了远交近攻政策，联合新罗，共同对高句丽施压。

626年，新罗善德女王给唐太宗写信诉苦，陈述自己的困境，希望能够得到唐朝的帮助。与此同时，百济武王也顺势向唐朝进贡，控诉高句丽欺负自己。

唐太宗不能容忍自己有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小邻居，于是答应出兵。

公元645年，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唐太宗率领6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奔向高句丽。比起隋朝那一百多万豆腐渣的军队，唐朝这6万可算是非常精悍。5月份，就把当时高句丽占领的辽东地区拿下了。面对强敌，高句丽也派出15万精锐部队全力投入战斗，不过很悲催地被唐军给打了回去，剩下的一部分还投降了。这下，高句丽举国恐慌了，把沈阳的部分地区和辽宁铁岭也给让出来了。

唐军毕竟是远途作战，行动不是那么便利。在取得一连串的战果之后，唐军也有点累了。等到攻打安市城的时候，就陷入持久战了，唐军原定的进军计划是跨过鸭绿江后直下高句丽的首都平壤。但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寒冷的气候让唐军的后勤补给很吃力，唐太宗被迫于9月18日班师还朝。

经过两年的休整，唐军再次出发了。这次，考虑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补给的困难，唐军改变了策略，不再急于求成，而是耐着性子，用较小规模的部队不断地袭扰，以消耗高句丽的国力。同时，唐太宗还命牛进达和李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唐军数次击败高句丽军，高句丽王被迫于12月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公元647年和648年，唐军三次进攻高句丽，收获颇丰。高句丽此时也不大经得起折腾了，唐太宗认为时机已到，建造船只，准备以30万大军从海路直捣高句丽的中枢。可惜的是，唐太宗的寿命也到了，远征的计划就此终止。

接下来的重任，就落到了唐高宗李治身上。唐军再次攻打朝鲜半岛的时候，连百济也成了重要目标。这时，中大兄皇子和他妈，好死不死地来凑热闹了。

中大兄皇子凑的热闹还不止朝鲜，他在日本，不停地折腾北方的少数民族虾夷族。政府于公元647年、648年，在越后分别设足栅和磐舟栅，作为镇压虾夷族的根据

地。658年，齐明天皇派阿倍比罗夫讨伐秋田、津轻地区的虾夷族；660年，再次派遣阿倍比罗夫征讨肃慎国。

660年，也是唐高宗李治打百济打得热闹的时候。

660年，唐高宗派13万水路大军东征。唐军从山东莱州出发，渡过黄海在百济登陆，并与新罗的5万军队会合，7月份顺利包围了百济的都城。面对如此强势的军队，百济丝毫没有还手之力，很快投降。这次，一共有百济的君臣92人、官兵12 000多人被俘。有600多年历史的百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接下来是百济的遗老遗少的努力了。百济的部分遗臣发扬了不怕死的精神，又聚集一批士兵，企图将唐军赶出朝鲜半岛，努力复国。同时，百济也觉得孤军奋战，取得胜利的希望渺茫，就不断地向日本求助，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期望得到日本的帮助。

齐明天皇接受了百济的请求，并且还放回了一一直在日本做人质的丰璋王子。

为了表示参与的决心，齐明天皇还写了份非常隆重的诏书，大意如下：

百济因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略到我国来求援，国家之间打仗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情；而帮助弱小呢，也是道义，这个是有先例的。百济现在处在困境无可依靠无所适从，我们即使条件再艰苦，也要帮他们一把。再说他们大老远来了，也不好意思回绝。所以，命令诸位将军，准备战争需要的各种东西，集合起来，将侵略百济的恶棍们赶出去。相关部门要协助军队，谨慎明了地做好这件事。

于是，日本这个国家就这么简单地被拖到战争中去——对抗大唐，以举国之力，不是脑子进水了就是抽风了。不仅如此，齐明天皇还亲自跑到九州去，想领兵西征。

非常不幸的是，这位博爱的天皇因为这事，旅途奔波，居然在661年7月，累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天皇为朝鲜的战事捐躯了，8月，皇太子同学又顶上来了。日本的先遣部队，华丽丽地出海了。9月，5 000日本精锐，拥着百济的丰璋王子，浩浩荡荡登陆朝鲜半岛。662年，日本又慷慨地送给百济许多军需物资：大量的弓箭、纺织品、粮食等。整个日本都沸腾起来了，全民修缮兵甲、船舶，储备军粮，随时准备渡海大战一场。

663年，日本又派出27 000精兵增援，唐军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命人带7 000水师驻扎在熊津城，进行防御。

话说百济有了日本的援军，气势大涨，确实也恢复了不少城池。可好死不死的，没有更加稳定的战果出现，百济的君臣之间先打起来了，这下子，又伤了筋骨，实力大不如前。唐军看准这个机会，主动出击。7月唐军和新罗军在熊津城会合，8月包围了百济王所暂时居住的城市周留。白村江水战的序幕就这么拉开了。8月17日，唐将刘仁轨与新罗军队一共战船170艘在白村江口列起了阵势。唐军与新罗军队和日本援军于27日不期而遇，一场激战之后，日本军队撑不下去了，想一走了之。但是在逃跑的过程中，由于太过混乱，不少士兵居然跑到大唐的军队之中，死伤、被俘者甚众，有一半战船毁于大火，百济丰璋王子仓皇逃往高句丽，百济复国也就此成为泡影。

白村江一战，东亚的政治格局为之一变。唐军和新罗军队联合起来，顺手又灭掉了高句丽，日本只好退出朝鲜半岛，守着自己的四岛度日。而新罗一统朝鲜半岛，日本在东方又多了一个分庭抗礼的敌人。

从此次失败中，日本也看到了唐朝的强大，更加谦卑而细心勤奋地学习唐文化，最

终在日本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山寨”唐朝——平安时代。

第六节 皇室悲剧之开始：赐姓藤原氏

白村江水战给日本高层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齐明天皇之子天智天皇（就是原来的中大兄皇子）自此之后就战战兢兢，睡梦中都怕唐军攻过来。671年，这位天皇在担心和恐惧中去世了。一场围绕皇位的宫斗，又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天智天皇在世的时候，觉得儿子们都没有啥大出息，所以不得不册立他的弟弟大海人为皇储，并将四个女儿嫁给他，以示拉拢（日本皇室的乱伦传统也挺让人震惊的）。到了晚年，天智天皇想法改变了，又想把皇位传给自己和宫女生的儿子大友皇子。这么一来，大海人就不乐意了，兄弟二人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这里面还有一段风流插曲，天智天皇不小心爱上了大海人的情人额田王，兄弟之间又多了一层情乱的仇恨。这个额田王，是日本7世纪左右伊贺出身的才女，美丽贤淑、多才多艺。她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女歌人，其作品在《万叶集》（日本古代诗集）里有长歌三首、短歌九首。额田王不仅是当时的一流女歌人，而且是第一位超出男女和歌差别，能够和柿本人麻吕相提并论的《万叶集》当中的代表歌人。男人倾慕这样的女子，一点都不意外。这个额田王，最初是巫女，巫女是不能嫁人的，于是，大海人和她也只能算情人关系。但天智天皇在喜欢上这个女子之后，立刻将其纳入后宫。大海人皇子不死心，在有机会见到额田王的时候，还要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这么一来，天智天皇非常愤怒，但又理亏在先，只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大海人，以示补偿。但兄弟二人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天智天皇之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二人之间有一个和稀泥的资深大臣中臣镰足。但669年，中臣镰足不幸去世，两兄弟的矛盾就表面化了。

中臣镰足死后不久，天智天皇就任命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苏我赤兄、中臣金连为左、右大臣，苏我果安等为御史大夫。这批御史大夫个个野心勃勃，以苏我赤兄为首，一心想独揽朝政。他们唆使大友皇子打击、孤立大海人皇子。不过，天智天皇在临死之前，还是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召见自己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以皇位相许。

但大海人自幼追随中大兄，深知自己的这个哥哥，自从大化改新以来，就一直排斥异己，诬陷无辜。自己如果接受这个皇位，日子一定是不好过的，因此就谢绝了哥哥的旨意，奏请皇后继位，大友皇子辅政。大海人还表示，自己要出家当和尚去了。671年10月的一天，大海人在宫中剃度后，披上天智天皇送来的袈裟，趁着月黑风高，骑着快马前往吉野山中“出家”去了。天智天皇也就相信了他这个弟弟真的就一心向佛，不过问政事了。天智天皇身边的一个谋臣知道这件事，急忙跑到天智天皇跟前说：“您可千万不要放走大海人啊，这等于是放虎归山，将来必有祸患啊。”天智天皇这才反应过来，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大海人皇子早已经是天高皇帝远了。

671年10月23日，大友皇子与苏我赤兄等“泣血誓盟”策谋篡权。他们乘天智天皇弥留之际，迫使其认定大友皇子为皇位合法继承人。不久，天智天皇逝世，大友皇子居然在五日服丧期间，迫不及待地即位，即弘文天皇。此时的大友皇子还不满24岁，他显得有些幼稚地、雄心勃勃地先发制人，以修筑皇山陵为名，召集了不少人马，准备攻向吉野。不过这个大友皇子有个皇子妃，是大海人的女儿。毕竟父女连心，她就秘密派人把大友皇子的计划报告给父亲大海人了。

大海人得此消息，正合心意，于是很高兴地调兵遣将——这样，这场战争爆发了。大海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支持者呢？他跑到吉野，也是有目的的。在白村江水战惨败之后，天智天皇在玄界滩、濑户内海沿岸修筑国防设施，同时将百济难民迁往东

国，将都城从奈良盆地的飞鸟，迁往了琵琶湖南岸的近江宫。而在大化改新的时候，因为政策的激进，给东国的豪族与普通民众都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迁都这事，更是兴师动众。这样一来，天皇的地方反对者就越来越多了。大海人皇子看中这一点，私下里联络了天皇的不少反对者。672年，大海人皇子率领部将二十余人离开吉野，前往美浓。在美浓的支持者们早已经翘首等待，东海道和东山道的诸国也纷纷前来支持，队伍迅速超过万人，并且兵分两路，进攻大和与近江。

近江朝廷的大友皇子一方，看到情况不妙，准备向东国等国派出使者，要求进行兵力动员。但是大海人皇子成功截留了使者。这么一来，大友皇子所有的支持者加起来，也只有近江附近几国的兵力。

很快两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大友皇子也很决绝，身先士卒，一开始占据了绝对优势。在赖天川桥决战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十里，列弩乱发，矢下如雨”。大海人皇子一方使出了全力，攻陷了近江朝大津宫，大友皇子与诸臣四散。最后，这位大友皇子走投无路，只好体面地自杀身亡。至此，历时两月、兵员数万的“壬申之乱”，以大海人的胜利结束。

673年2月，大海人皇子建造了飞鸟净御原宫，正式即位，是为天武天皇。近江朝廷被消灭，天武天皇再次把都城迁往飞鸟。之后，为了恢复秩序而设立新的制度，即服制改革、八色之姓、冠位制度改革等。天武天皇比起天智天皇，在中央集权方面更进了一步。（小插曲一下，天武天皇在战争胜利之后，又夺回了自己当初的爱人额田王。可惜的是，这位额田王，却从此失宠了。）

这场内乱，带给日本的是对大化改新的成果的巩固，这是通过一场权力斗争实现的日本国家改革的又一次飞跃式发展。这一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辉煌的奈良时代。天武和他的妻子持统天皇（天武天皇去世后，其皇后鸕野赞良称制，后正式即位），

加强官僚机构的权力，调查人口以便征兵和纳税，通过建立更大的地方管理机构以削弱地方的权力，命人编写完整的法典和正史，修建大型的宫殿，建立官方的宗教资助体系，试图控制宗教特别是佛教。

在天武天皇之前，确切地说是没有“日本”这个称呼的，也是没有“天皇”这个称呼的。虽然不能考证这种称呼被确定是在哪一年，但据历史学家考证，确实是天武和持统在位时候的事情。他们夫妻二人，极力将皇权神化，以加强皇权的合法性，并巩固之。“天皇”，字面的意思是“上天的统治者”，其实这个称呼也是源自中国的，含有“北极星”的意思。“日本”的字面意思是“日出之国”。在隋炀帝时代，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但到天武时期，才成为一个成熟的专有词汇。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皇室的想象。中央集权的加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它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以后的历史证明，天皇的权力就始终没有回归过。苏我氏、藤原氏、平家以及后来的各种幕府都证明，日本的皇权从来都只是一个象征，而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拥有各种势力的地方实力家族或者派系。在这些派系当中，藤原氏算是一个肇始。

藤原家族是日本历史上的显赫家族之一。这个家族从8世纪后期天皇迁都平安（即京都）以后，一直操控着日本的皇室，前后达三百余年。藤原家族的存在，几乎是否定了天智从推古女天皇以来，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所作的努力。与苏我氏家族一样，藤原家族的权力和威望不是依靠勇武善战，而是靠着无数政治谋略取得的。这也包括将自己家的女儿嫁入皇室，这种联姻在以后的诸幕府中比比皆是。利用这层姻亲的关系，藤原家的外孙往往就成为天皇。藤原家族的族长，无论在朝在野，都可以左右朝政。不仅如此，藤原家还将不少土地纳入自己名下，以逃避交税的义务，增加自己家族的财政收入，以使用此更好地控制皇室。

藤原家的辉煌，始于中臣镰足。在中大兄皇子成为天智天皇的时候，中臣镰足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中臣镰足因为成功策划了645年的政变，杀死了苏我氏的首领苏我马子，得到天皇无比的信任，因此被赐姓“藤原”。这个称号的原意是：如“紫藤般平实无华”。遗憾的是，正是这个家族主导了华丽奢靡的平安时代，也是这个家族，让“武士”这一阶层得以产生，直接导致了日本后来的命途多舛。

中臣镰足死后，藤原家的势力几经沉浮，但依然在奈良时期的政权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藤原家族发展壮大之后分为四支，其中一支在平安时期的权势达到了全盛。

藤原氏之所以东山再起，所用的手段还是与皇室联姻。从公元857年开始，把持朝政的藤原良房，在次年将自己年仅8岁的外孙扶持为天皇，并且以摄政王自居。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由皇室之外的人担任“摄政王”一职。于是这个职位基本上就由藤原家的人世袭了。在有了这种制度的保障之后，天皇的退位及即位，都要经藤原家族过一手：好多天皇不到退位的年纪就被劝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未成年的天皇，以便藤原家族行使摄政权。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这样的逊位竟达八次之多。藤原家族虽然没有推翻或取代皇室，但是已经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天皇到了法定亲政年龄，是必须结束摄政的，因此藤原良房的侄子藤原基经建立了关白制度，设置了一个“关白”的职位，用来控制成年的天皇。“摄关家”的简称就是这么来的。这点与苏我氏把持朝政的时候，有很大的区别。苏我氏并没有想到将自己的权力用某种官职来加以合法化，而藤原氏的权力，到这个时候已经制度化了一——这也是藤原家族能掌控日本政权几百年的法宝所在。

在独揽朝政的过程中，藤原家族也遇到不少“敌人”，最出名、最执著的一位就是菅原道真。菅原道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汉学家兼诗人，一度被人称为“学问之

神”。他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他生于世代学者之家，877年任贰部少辅，并为文章博士。宇多天皇、醍醐天皇都很赏识他，让他在身边掌管文书。894年，他还被任命为遣唐使，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895年，他担任中纳言，后兼任民部卿。899年任右大臣职。他还著有《类聚国史》、《菅原之草》、《新撰万叶集》等。

他一直无法忍受藤原家族的独断专行，持之以恒地与其作斗争。901年，他升任从二位，但却被藤原氏诬告企图帮助齐世亲王篡夺皇位而获罪，被贬为大宰权帅，流放至九州太宰府。宇多天皇闻讯企图阻止但未能成功。菅原道真的家族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以长子菅原高视为首的四个子女皆被处以流刑。菅原道真于903年在太宰府病逝，被葬在如今的安乐寺。

菅原道真的死给当时的朝廷留下了很多阴影：传说他的鬼魂返回京城报复他的敌人，这些怨气引发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比如洪水、干旱、大火。为了消除这些祸患，皇室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安抚的措施，最终追认其为“学问之神”、“书法之神”，并在中央和许多地方都设立神社供奉菅原道真，以纪念他的正直与勇敢。

从967年开始，藤原家族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要多得意有多得意了。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藤原道长。这个人执政的时候，藤原氏的辉煌达到了最高峰。他最为有名的事迹是一家立三后，三个女儿——藤原彰子、藤原妍子与藤原威子皆成为皇后。因为三个女儿都嫁给了天皇，而他的两位长孙，都成为天皇。藤原道长如此不可一世，其在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曾写下一首和歌“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来描述自己的心境。

由于母亲是藤原氏，或者娶了藤原家的女儿，皇室不可能对藤原家的影响力表示出不满或者反对藤原家的势力，只能听之任之。而藤原道长本人只担任过短暂的“关白”职务，其余时间都是他的儿子或者孙子来担任这个职务。他或许愿意坐在庭院

里，看着明亮的月亮，享受自己稳操一切的感觉。这些对日本来说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情——一个过于有权势的皇族，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因为天皇的权力一直都有这种那种的势力在制约，因此，它更加体现了一种至高无上、不能取代的象征意义：天皇不再去管那些繁杂、无序、琐碎的事物，他的主要的职责就是进行祭祀、宗教等一些礼仪性的活动。

因为藤原氏三百多年的坚持，日本所度过的最后一个“古代”时期，是平安、祥和的，不断学习、模仿唐朝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繁荣的时代。佛教史无前例地得到尊崇。平安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文学的全盛时期，该时期产生的文学作品被公认为是日本古典文学的精髓，而女子的创作才华更是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在藤原氏时代，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阶层——武士阶层出现了。

在武士阶层出现的过程中，庄园制度是很关键的。庄园是指政府控制之外的土地。日本大化改新之时，日本官方采用的是中国的班田制，但是以下的土地是不在政府控制之内的：属于皇族和贵族的封地，在公元743年之后开垦的土地基本都属于开垦者终身所有，授予寺庙和神社的土地。再说那部分平均分配的土地，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都演变成世袭的土地了。到8世纪后期，这种土地私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有人一度认为，来自异国唐朝的制度，其实并不适合日本的国情。当然，唐朝在此时的状况也并不会好到哪里去——这说明不管制度如何，对物质和权势的贪婪是人类的本性。

庄园的发展意味着国家资源的不断减少，可以直接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到平安后期，贵族和寺院努力寻找可以获得免税资格的办法，那些强大的寺院和贵族，其私有的土地也越来越多。随着免租权的下放，连带其他权力也逐渐从地方官员的手中过渡过来，比如地方官员不再有检查或者干涉这块土地的权力，甚至都不能进入某

些庄园。

不过地方的小地主和普通民众相当喜欢，为此他们将自己的土地纳入某一强大庄园的保护之下，就免去了交税的义务。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税赋还是比较繁重的，一般民众不得不寻求一种适当的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一层一层地转让之后，更大的家族获取的利益就更多——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藤原家族。土地最大的主人，是不耕种土地的，也不会住在乡下。因此，需要一定的专职人员去管理这些土地，相应的，一套系统的管理体系应运而生。这样一个庄园之内，可能含有以下几种人：庶民、土地所有者、居住在庄园上的强势家族成员、专职的管理者，还有中央级别的土地所有人。

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外人看来是相当难为的，不过它居然也合理地运作起来了。

庄园制度将土地集中在一起，实际上也是将这些土地上的人“私有化”了。武士作为一个阶层的重要性就是此时显现出来的。在日本引进征兵制和组织农民武装之前，大多数士兵其实都属于某些氏族的私人军队——这可以算做是武士的雏形。随着庄园化的不断发展，政府可以征召的士兵越来越少，到792年，征兵制被废除了。既然中央政府无法维持一支正常的军队，这种责任于是落到地方政府和世家大族身上。这对皇室来说，无疑是减少负担的好办法：士兵需要战马和武器，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很便宜的，庄园则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这些东西。当然，天皇和大臣也可以在自己的封地上拥有自己的武士。武士不仅可以用于战斗，在地方上还负有警察的职责。至少在那个时代，庄园拥有武士和拥有土地一样重要。从9世纪中期开始，一些地方庄园主开始建立保卫自己的武士集团，并利用其扩张势力。到10世纪，武士集团已经是可以被利用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了。

什么人召集这些武士呢？除了庄园主，就是那些名门之后。935年，桓武天皇的第五代孙子平将门，因为结婚的事情，和自己的叔叔结下了梁子。他利用武士的力量，发动了一场叛乱，杀死了自己的伯父平香国，击败了叔父平良兼，并于939年起兵对抗朝廷，势力遍及常陆、武藏、安房、相模等八国，并以下总国为根据地，自称“新皇”，以石井乡为王城，设左、右大臣及八省百官，制玉玺，震动京都朝廷。940年平将门被平香国之子平贞盛讨伐，中箭身亡，史称“平将门之乱”。而平定这场动乱，依靠的也是武士集团的力量。

能够召集武士集团的人，也必须有一定的声望。这些人一般具有皇室的血统，但不是天皇一脉，他们被赐姓、封地，并且可以在都城享有官职。他们的声望和财富，在当地对武士集团有相当大的诱惑力。当时势力最大的两个武士集团是平氏和源氏，他们都是天皇一脉的支系。

关东地区混乱的战事，也给了武士集团足够的土壤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平氏和源氏在此间的斗争格外突出。此时由于有藤原家族的辉煌，这两个武士集团尚在朝廷的掌控之中。到11世纪后期，藤原家族逐渐走向没落，平家和源家开始跃跃欲试，试图占据政权的核心地位。

终于，在1156年平安京发生的一场叛乱中，武士集团的力量首次登场，平氏在平安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也归功于后白河天皇的支持。此时的藤原家族，虽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却也很难维持平安时代最后的奢华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奢华时代的终结者——平清盛

第一节 藤原氏阴影之下皇室的努力



在平安中期，平安京是各大贵族势力竞技的场所，藤原家族依然一枝独秀。

随着庄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土地的控制权被层层截留，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府的各种权力就像一头宰好的肥猪，其身上的各个部分，逐渐被有钱的人买走了。到10世纪之后，日本政府手中可控制的土地，已经少得可怜了，能收的税也逐渐减少，皇室的神话权力还在，可非常不幸的现实是，天皇越来越穷了。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藤原家的房子非常豪华，天皇的住所跟它一比，就是乡村别墅了。

京城的管理也相当混乱，政府的命令几乎非常难以执行。虽然天皇在9世纪的时候，也拥有自己的警备队，但到平安中期时，这些警备队已难以维持，数量越来越少，别说维护京城的安全了，连天皇住所的保全都有些困难。僧人们到皇城游行示威，几乎畅通无阻。甚至，在公元1040年，有些强盗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挖了一条通往天皇住所的密道，连天皇的衣服都丢掉了。

面对这些窘迫的状况，皇室也是忍无可忍。到后三条天皇即位的时候，他决定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努力维护皇室的尊严。在他之前，也有几位天皇想改变这一状况，但几乎都失败了。因为朝廷所有重要的职位：摄政、关白、左右大臣、参议、大纳言等，基本都是藤原家的人在担任。在这种状况下，天皇想杀出一条血路，似乎是

不可能的。

但藤原家密不透风的权力网在藤原道长死后，有了一点点裂缝。藤原道长的继承者藤原赖通，比其父亲来说，个性显得稍微平和一些，这就使得他和后朱雀天皇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像以往一样，藤原赖通也想在后朱雀天皇之后，培育一个完全听自己话的天皇。但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实施力度，比他父亲就差远了。从亲戚角度讲，赖通还是天皇的舅舅，担任关白这一职务。但是，与实现了“一家三立皇后”的道长相比较，赖通能做的事情就少了。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和自己的正妻没有孩子。赖通的结发妻子是村上天皇的第七皇子具平亲王的女儿隆姬女王，这位女王容貌出众，也很有文才。二人非常相爱，关系和睦，虽无子女，但赖通并没有因此对妻子有任何其他心思。他从藤原家族中挑选了一位女子嫔子作为养女，送到宫中成为后朱雀天皇的皇后。这位嫔子，也没有成为赖通政治生涯的助手——她嫁到宫中，在生下一位公主之后，便去世了。而赖通的弟弟，也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宫中，好运气地生下了一位皇子。但在后朱雀天皇的心目中，他唯一的妻子是藤原道长的女儿嬉子。嬉子生下被立为东宫的亲仁亲王之后去世了。后朱雀天皇的另一位妻子，后三条天皇的女儿祯子内亲王也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尊仁亲王。

后朱雀天皇去世前后，围绕天皇人选，又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尊仁亲王虽然很想成为天皇，但因为和藤原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赖通当然不支持。这样，天皇的人选变成了亲仁亲王，他即位后，是为后冷泉天皇。不过，后朱雀天皇却在临终之时，将尊仁亲王确定为东宫太子——意思是，不管谁当了天皇，他的下一任都是尊仁亲王。

后冷泉天皇即位后，尊仁亲王被立为东宫。赖通和东宫的关系，一直就非常紧张。

赖通在后冷泉天皇即位后，终于将自己的独生女嫁入宫中做了皇后，但这个女儿，生育能力似乎不是很强。赖通一直期盼她能生个皇子，但始终未能如愿。赖通终于有些心灰意冷，把精力转而放到为藤原家修筑豪华别墅去了。

似乎是上天也在为难藤原家似的，后冷泉天皇在其去世之前，也没生出一男半女。他死后，尊仁亲王即位了，是为后三条天皇。

这对皇室和藤原家似乎都是一个转折——后三条天皇和藤原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了。藤原家的好日子是真的结束了。

要想把权力从藤原家夺回来，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藤原赖通将关白的职务交给自己的弟弟教通之后，他自己就回藤原家的别墅养老去了。他这一走，就像火山上那最后一层覆盖的灰土被掀开了，京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藤原家的天要变了。后三条天皇的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了一批和藤原家不睦的朝臣，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源家。

后三条天皇，为这个皇位憋屈了很久，为藤原家，也憋屈了很久。想想看，在之前的170年里，所有的天皇，都与藤原家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而后三条天皇，终于从藤原家血缘的泥坑中拔腿出来了，这是一件多么值得皇室庆幸的事情啊。后三条天皇自幼就和生母一起活在藤原氏的阴影中，成为太子后的二十多年里，也是胆战心惊地过日子。这一即位，无疑是等于：天至少是晴了，天皇不愿意再当藤原家的傀儡了。

也就是从后三条天皇开始，皇室着手进行恢复自己权力的努力。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清理庄园。

后三条天皇，开始放开手脚做一些以前的天皇不敢做的事情了。他首先改革宫廷的

礼仪制度，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减少宫廷开支，没收未经天皇颁发地契的土地。他的支持者也逐渐地聚集到他身边来。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他开始起用地位较低的中下层贵族进入权力的核心。在这些人的支持下，1069年，后三条天皇着手整顿庄园，矛头直接对准了藤原家。

前文已经提到，在庄园制度盛行的时候，整个日本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藤原家。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收到成效的话，那么将是一箭双雕的好谋略：一旦限制了藤原家，那么朝廷的收入一定会增加的。在治理庄园方面，后朱雀天皇其实也作了一点努力，他曾经迫使藤原教通答应清理庄园，不过被赖通找个借口，拖了二十多年。现在，是让藤原家实现这些承诺的时候了。

藤原家这个时候也比较悲惨，老的老小的小，嫁到皇室的女儿少，还不争气，也没有皇子生出来，确实是在耗这一两百年积累的老底了。再说清理庄园这事，也是教通先前答应老子的，如今儿子找上门来，也不能反悔不是？于是教通咬着牙、心里滴着血，万般无奈地答应了。

后三条天皇得意了，从1069年开始清理庄园了。具体措施就是，让各地的庄园主提交自己合法的证明，提交不出来的以及提交出来审查不通过的，直接没收。结果就很明显了，那些提交不出来的和审查不通过的，基本都是藤原家的。

不过后三条天皇雷声大雨点小，查是查了，命令也下了，真正到最后没收的，没几个。这也不太难理解，这时候，给藤原家族点脸色看看，比从他们口袋里掏出点钱来，要好受得多：你不是权倾一时么？你不是很牛吗？再牛你还能取代皇室吗？但是呢，在藤原家的老狐狸看来，天皇这样子，不过是“小孩子撒撒娇”罢了，真想动到藤原家的根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毕竟，还有个“关白”的制度在那里。不管你天皇是老的还是小的，都逃脱不了关白的控制。后三条天皇确实也很悲催，

因为他毕竟还有几个藤原家出来的妻室，想有点实际的动作，也怕枕边风。因此后三条天皇即位4年之后，即让位给太子贞仁亲王。

在即位4年之后，后三条天皇决定辞职了。他的辞职是有谋略的。

他无法改变摄政控制未成年天皇，也无法改变关白控制成年天皇的事实，但是他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一件，就是未来的天皇仍然可以和藤原家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三个儿子，只有东宫太子娶了藤原家的女儿。只要不让东宫太子的后代坐上天皇的位子，那么，藤原家就难以再做皇室的外戚了。

后三条天皇无比兴奋啊，于是他就更兴奋地制订计划去了：他辞职，让大儿子即位，但让二儿子做太子，二儿子即位了就让小儿子做太子，这么一来，藤原家和皇室的关系就几乎是没有了。于是1072年，他辞职了，让大儿子即位了，是为白河天皇。

他自己干什么去了呢，做太上皇去，背后指点江山了。关白和摄政可是控制不了太上皇的啊——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意呢。

这第一步算是成功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郁闷的未来：在退位之后不久，他就一病不起了，年底就去世了。他是看不到皇室的未来了，估计这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天皇。

所幸的是，子承父业这句话是对的。虽然不知道能有多大的功效，但白河天皇确实将父亲的所想制度化了，这就是院政制度。

第二节 院政制度下的武家集团

日本历史上有两个白河天皇：白河天皇与后白河天皇。这两个白河天皇，用今天的话来说，都很“二”。

在后三条天皇退位之前，他就有了这种院政制度的想法，设立官厅，任命官员，试图以院厅取代摄政、关白政治体制，实现还政于皇室的愿望。但是他的去世，让这个愿望变成了泡影。

后三条天皇的儿子白河天皇，是日本第22代天皇，在院政制度这点上，他算是实现了老爹的愿望。但在皇位这一点上，他没听老爹的话。他爹的本意是不再希望藤原家的血脉来继承天皇的位子，但白河天皇出于私心，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善仁皇太子了。善仁的母亲藤原贤子，是关白藤原师实的养女，按理说他即位了，藤原家族还是可以控制皇室的。不过白河天皇不是个好惹的茬儿——他自己还想控制呢，哪里轮得到别人。况且，白河天皇也是个卸磨杀驴、忘恩负义的主。尽管他和藤原师实相互帮助，一个坐上了天皇的位子一个得到了关白的职位，但一到涉及自己切实利益的时候，他就翻脸不认人了。藤原师实也没有祖辈那么强势，藤原家的权势是一天比一天衰落了。

白河天皇追寻着父亲的足迹，退位、剃头、出家做了和尚太上皇。又追寻父亲的足迹，琢磨起院政制度来。这里所谓的“院”，指的就是太上皇，例如，后三条太上皇就可以称为“后三条院”，白河法皇也可以称为“白河院”。太上皇可以绕过关白制度，直接掌握政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藤原氏的压迫下，天皇们的日子是多么不好过，一个一个天皇年纪轻轻的就剃掉满头的青丝，无比难看地做太上皇去了，简直是要多悲催有多悲催啊。

不过，院政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不是很体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皇室的权威。院有处理政务的权威，可以以“院”的名义发布各种命令，居然神奇地成为有实际权力的国家行政单位。

在这种对藤原氏的权力实实在在的挑战中，藤原师实无奈了。在藤原家族中，他是很倒霉的，遇到了一位不甚讲理、脾气暴躁、唯我独尊的天皇。在白河院的强大气场面前，藤原师实畏缩了。他也不大愿意反驳了，他这个外戚做得有点窝囊，尽管白河天皇还是尊重他的，却不再认为权力是在他那里了。关白的地位，等于是名存实亡了。

白河天皇任性疯狂到什么地步呢？

传说有一年，京都雨水不断，一下就好长时间，搞得白河院心情很不畅快。因为他这时候正在建一所寺庙，被这大雨阻断了好几次。暴躁的法皇一怒之下，命人装了一盆子雨水，投入大牢关起来了，美其名曰“惩罚”上天。

在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堀河天皇之后，白河院以太上皇的资格在院中听政，大臣们也就顺理成章地都按照太上皇的旨意行事。同时，这个院厅在使用人才上面也是不拘一格，不再拘泥于身份，而是起用了一批地位较低但是比较有能力的人来担任“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等院司（职员），并执行政务。在白河院之后，院政基本就成为惯例。白河上皇（1087—1128院政）、鸟羽上皇（1129—1156院政）、后白河上皇公元（1158—1192院政）共执政105年。在此期间摄政、关白继续存在，但已是有名无实。因此，这百余年间是日本历史上惯称的“院政时期”。在太上皇时髦的年代，有两个太上皇同时存在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白河太上皇这个人，精力旺盛，一直活到77岁，经历了儿子堀河天皇、孙子鸟羽天

皇、重孙（一说是他的私生子）崇德天皇三朝，始终保持院厅的“垂帘听政”，直到1129年才依依不舍地去世。他曾说：“天下有三不如意之事：贺茂川之水、双六赌局、山法师。”其中，贺茂川是日本流经京都的一条河，由于河道比较狭窄，所以一到雨季就容易泛滥。双六是白河院喜欢玩的一种赌博游戏。而那些有实力的寺庙以及寺庙控制下的庄园，历来就是很强悍的，动不动就到京都闹个事，白河院是干头疼没有办法。

白河院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气场呢？这气场可不是白来的。一个原因是通过清理庄园，天皇确实是比以前有钱了，有钱就有底气了。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更加信任武家了，在关键时刻，会打仗还是比较重要的。

为了能够与摄关家对抗，白河院起用了“北面武士”。除此之外，白河院还积极扶持能够与藤原家对抗的势力，这就是武士团，将武士作为保障院政制度的武力支柱。白河院把招拔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地方，一方面用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另一方面起到震慑的作用。这就是“北面武士”的来源。

在起用武家势力方面，他选择了平氏。当时，武家有两大集团：伊势平氏和河内源氏，这两家旗鼓相当。

在庄园改革上，最得意的可能是源家和平家了。在后三条天皇和藤原家闹得很热闹的时候，很多中小贵族看到藤原家的命运可能不好，于是就将自己的庄园要么寄放在天皇的名下，要么一半在天皇名下一半在藤原家名下。而关东地区的，干脆就寄放在源家名下了；与源家齐名的平家，也一样捞了不少好处。

单说说平家。天皇一脉，其实是有很多分支的。当然是越分越小，越分越平民，平家就是这么分出去的，分到平安时代的时候，已经是普通的小贵族了。平氏也有很

多支脉，其中以葛原平氏最为兴盛，葛元平氏也经过了几次分支，其中一支平国香的孙子为避乱迁往伊势地方，其后裔称为“伊势平氏”，这就是平清盛出生的地方。以后的平氏，被称为平家，即《平家物语》描述的一支。

源氏的崛起和平氏非常相似，但他们担任的官职都是武职。

在天皇与藤原氏的斗争中，他们在武力、名誉之外，又得到了很多土地，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为以后的斗争以及幕府时代，埋下了伏笔。这是天皇们始料不及又无法改变的悲剧。

白河院器重的是平家。因为源家这个时候，跟被冷落的辅仁亲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跟关白藤原家也关系极为深厚。

辅仁亲王是白河院的三皇弟，按照他们父亲的设想，最后继承天皇之位的，应该是辅仁亲王。这位辅仁亲王呢，又仪表堂堂，才学出众，天生就是块做天皇的料。因为他排行老三，大臣们都亲切地称之为“三宫”。白河院自己的儿子，即后来的天皇堀河，刚出生的时候就身体孱弱，咋看咋像不能长寿的，一旦他有变故，接下来即位的就是三宫了。这个三宫就成了白河院的眼中钉，只有儿子生了儿子之后，这种威胁才能解除。于是，在自己儿子才13岁的时候，白河院就给他娶了一房媳妇——这媳妇三十多岁，还是白河院的亲妹子，想亲上加亲。这种近亲结婚，可想而知啥后果了，白河院一直期盼的孙子迟迟不来，只好又给堀河天皇找了几房媳妇。第一位孙子生出来，白河院简直是痛哭流涕啊，他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源家和辅仁亲王走得近，白河院当然不会扶植源家，于是转而扶植伊势平氏。

伊势平氏是镇压“平将门”之乱的重要力量平贞盛的后代，到白河院时代，这个家族的实际掌权者叫做平正盛，其子叫做平忠盛。这位平正盛是平氏的第一代家主、

北面武士，是后来掌握日本实权的平家的基业的开创者、平清盛的祖父。

在给平氏家族寻求机会的时候，平正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圆滑。

据说，白河院有一位很疼爱的公主，二十多岁就去世了。白河院异常悲伤，为了纪念爱女，就将她生前居住的地方改成佛堂。恰好，平正盛在这个地方附近也有一块地，适逢公主去世一周年，平正盛就将这块地连同这块地的大花园一起，送给佛堂了。就因为这块地，白河院心中对平正盛的好感度一下子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

在京都的一场变乱中，白河院为了自身的安全，组织了一支亲卫队，这就是“北面武士”，平正盛正是其中的一员。对待北面武士，白河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般不牵扯其进入皇室的权力斗争，只用于镇压地方的叛乱。

白河院的孙子鸟羽天皇即位的时候，出云的源氏一支起兵谋反，白河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将领去镇压叛乱，于是平正盛华丽登场，担任大将，去出云讨伐源氏。上天也是非常眷顾平氏的，源家叛乱者源义亲，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非常残暴，平正盛还没有经过什么大的阵仗，二者实力相差甚远。可在一个多月之后，平正盛就把源义亲给灭了，带着其首级回到京城。白河院非常高兴，还没等平正盛回到京城，就迫不及待地给平家颁发荣誉了：平正盛升了官，他儿子平忠盛也得到了官职。这个升迁在当时还引起了朝廷不小的争议，但自负的白河院可没有理睬这些事情，他需要一个打压源家势力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平家。

不但不理睬众人的非议，在平正盛回京的时候，白河院居然大张旗鼓地亲自检阅平家的军队去了。这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平家的地位在白河院的心目中非常重要。源氏的地位，在这个时代是不用再提了。

很多人在当时并不看好北面武士。1129年，白河院生病去世。他的院政制度，其实

是千疮百孔的。虽然皇室的权威收回了不少，藤原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显赫的权势，但日本的社会还是一样的动荡。那些庄园从藤原氏手中回到天皇手中，不过是所有权变更了一下，该交的税那是只多不少。地方豪门因为院政的勃兴，都睁大了眼睛寻找可靠的靠山，最后却发现哪里也靠不住，因此私斗状况非常严重。

北面武士，也是人们不看好的。因为用武家与藤原家对抗，无疑给了武家一个扩大势力的机会。一旦武家掌权，也不会比藤原氏好到哪里去——这种担忧在以后变成了事实，这是白河院始料不及的事情。平正盛在平定叛乱之后，又在僧兵作乱的时候大显身手，还讨伐了九州乱党，权势一天比一天重。他的儿子平忠盛也颇得白河院的欢心。

在白河院时期，武家的功能尚在于治安以及平叛，到后白河天皇的时候，武家的力量终于参与到皇权的争夺当中来了。这为他们进一步进入权力中心，又铺了一级台阶。

第三节 后白河天皇：武士力量的使用者

后白河天皇，是日本第77代天皇，在位时间为1155年8月23日 - 1158年9月5日。在他在位的时候，武士的力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增强，最终，武家以“幕府”这种形式，左右了皇权和日本的政治。

我们很多人关于后白河天皇的印象，来自大河剧《义经》。在这部电视剧中，后白河天皇胆小、懦弱，他的头顶与眼睛一样，总是闪闪发光。他一方面不甘心将权势交给武家、平家，另一方面，想回收皇权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败在平清盛的手中。他的懦弱与相伴的软弱，是与生俱来的。

在没有继承天皇之前，他是雅仁亲王，父亲是鸟羽法皇。在近卫天皇去世之后，因为继承，皇室又发生了一场风波。日本皇室很有意思的就是，太上皇比较多。近卫天皇去世之后，还有两位太上皇健在，这就是崇德上皇与雅仁亲王的父亲鸟羽上皇。

两位太上皇各怀心思，都想肥水不流外人田。鸟羽法皇坚持自己的儿子雅仁亲王即位；崇德上皇坚持要么自己复位，要么自己的儿子重仁亲王上。其实呢，鸟羽法皇觉得自己儿子智力和性格还是有点问题的，不一定就适合做天皇，但是不争馒头争口气啊。这时候的藤原氏内部也出现了一点分歧，关白藤原忠通支持雅仁亲王，而左大臣藤原赖长则支持崇德上皇复位。

一般皇室的争斗，总夹着一段风流韵事。按照辈分来说，崇德上皇也是鸟羽天皇的儿子。不过，这个爹是白捡来的。鸟羽天皇的爷爷，就是那位白河上皇，有颇多的风流韵事。最大的绯闻，是和自己的孙子媳妇、鸟羽天皇的老婆藤原璋子的事情了。不过这事是真是假，已经很难说了。藤原璋子是当时的大纳言藤原公实的女儿，自小就进宫了。白河院很喜欢这个伶俐乖巧、聪明漂亮的小女孩，于是把她收为义女，经常把她抱在怀里，等到年长的时候，就传出绯闻了。后来藤原璋子嫁给鸟羽天皇做皇后，鸟羽也因为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有传闻甚至说，藤原璋子实际上是以嫁给鸟羽天皇的名义嫁给白河院了，当然这种传闻无法证实。

这位来自藤原家的皇后是相当多产的，她和鸟羽天皇的孩子有显仁亲王、一品宫禧子内亲王、上西门院统子内亲王、雅仁亲王、通仁亲王、君仁亲王、本仁亲王五子二女。

在显仁亲王5岁的时候，白河院迫使鸟羽天皇退位，做了太上皇。显仁亲王于是继承皇位，是为崇德天皇。但这位崇德天皇，一直被怀疑是白河院的儿子，因此，鸟羽

天皇一直不待见他。白河院去世之后，鸟羽天皇开始自己的院政时代，把失去白河院保护的崇德天皇攥在手心里了。1139年，他把自己与藤原家另一名女子得子所生的儿子体仁亲王送给崇德天皇做养子，三个月后立为太子。1141年，鸟羽天皇出家为法皇。不到半年，他就逼着崇德天皇也退位了，立3岁的体仁亲王为近卫天皇。这样，鸟羽法皇和崇德上皇之间的梁子就结下了。近卫天皇本身体弱多病，未及弱冠，就去世了。更加精彩的政治斗争就此开始了。

在与崇德上皇的斗争中，鸟羽法皇占据了上风，成功地让自己的儿子雅仁亲王即位，是为后白河天皇。鉴于自己儿子的智力和性格，鸟羽天皇也是很怀疑他的，但后白河天皇生了一个比较聪明的儿子守仁亲王，鸟羽法皇看中了这一点。这样，后白河天皇实际在鸟羽法皇心目中不过是一个跳板罢了。可惜，他选的这块跳板，等于是给平清盛选了个软柿子去捏捏。

雅仁亲王于1155年登基，是为后白河天皇。

崇德上皇实在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在次年，他和藤原赖长、源为义一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夺回天皇的位子。

后白河天皇即位，改元“保元”。鸟羽法皇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他的危机意识还是很强的，知道崇德上皇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召集了武士平清盛等人，要他们发誓拥戴后白河天皇。

1156年，平清盛36岁，他是平忠盛的长子。他的母亲是一名艺妓，原本是白河法皇的人，因为白河法皇器重平忠盛，所以将这名艺妓赐给他。平清盛出生之后，很是得到白河法皇的喜爱，甚至有人说，平清盛也是白河法皇的儿子，当然这也无从去验证了。

1129年，11岁的平清盛被授予从五位下左兵卫佐的官职。他很快在战场上崭露头角，1146年，平忠盛因为讨伐海盗有功升任刑部卿，平清盛则接任其父原有的官位从四位下中务少辅兼安艺守。平家在这次战役中掌握了濑户内海的制海权——平清盛一生对大海一往情深，可能与这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制海权，给平家带来了很多的财富。之后，平清盛与父亲一同致力于扩大在日本的势力，同时开始信奉位于宫岛的岩岛神社之神祇。1153年，平忠盛去世，平清盛正式成为京都伊势平氏一族的家主。

鸟羽法皇在准备应对可能的政变过程中，染上了疾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也不过53岁。在他生病的时候，谣言发挥了作用，传言崇德上皇要和藤原赖长等人起兵夺权。也不知是因为得知鸟羽法皇病了还是谣言的作用，崇德上皇等人果然开始行动了。崇德上皇也是有不少支持者的，尽管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站错了队。藤原赖长是个著名的学者，是关白藤原忠通的养子。1131年，赖长以从三位身份名列公卿，叙任权中纳言、权大纳言、内大臣、右近卫大将、左近卫大将、内大臣等职，可谓是平步青云。1149年任左大臣。不过他和养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矛盾，养父不知道在鸟羽法皇跟前说了些什么，鸟羽法皇就不大信任赖长了。他在父亲和鸟羽法皇这里得不到认同，转而就投奔崇德上皇去了。在本质上，他还是个文人，自幼就很喜欢读书，他还收藏了大量书籍，建有“赖长文库”，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文人好意气用事，他选择崇德上皇不过是为了憋气。这一憋气，就把自己的命给搭上了。崇德上皇的队伍中，还有些源家的人，包括老将源为义，他就是那个被平清盛的爹给灭掉的源义亲的儿子，源家人在武学方面还是很有天分的，源为义的手下还是有不少人才。

但源家另一个重要人物，镰仓幕府创始人源赖朝的爹，源为义的第八个儿子源义朝，此时却站在了后白河天皇的一边。因为他之前就得到了鸟羽法皇的赏识，也发

誓要效忠后白河天皇了。这场战争，是父子兄弟争夺皇位，同样是父子兄弟厮杀疆场，有多悲壮，也可想而知了。

很快，双方就打起来了。源义朝作为后白河天皇这一方的元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率领部下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崇德上皇的驻扎地，放了一把大火。崇德上皇的人马很快就乱了阵脚，全军溃散。藤原赖长身上中了一箭，负伤逃走。他一路辗转，逃到奈良自己的老父亲那里去。但是他爹已经不愿意意见他了，于是他只好自杀，时年37岁。

崇德上皇无奈之下，藏到一个寺庙当和尚去了。最后实在藏不住，来自首了，被后白河天皇流放到外地。此后，他过了8年穷困潦倒的凄凉生活，曾多次要求回京城居住，都没被批准。1164年，崇德上皇郁郁而终。在清除政敌之后，1158年，后白河天皇让位给守仁亲王（后来的二条天皇）开始自己的院政时代。以后的二条天皇、六条天皇、高仓天皇、安德天皇与后鸟羽天皇5代都由后白河上皇院政所操控。

这场战争，最大的获益者，就是平清盛。平清盛因保元之乱而赢得后白河天皇的绝对信赖，于是升任播磨守及大宰大貳。相对而言，同样冲锋陷阵的源义朝，就很悲催了。这场战役的对手，是他爹。兵败之后，他爹无奈之下投奔了儿子，希望能保全性命。但是源义朝却不顾骨肉亲情，他不但逼死了自己的爹，同时把源家的几名武士也一起斩首了。

他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忠诚，最后却让平清盛辉煌了。他嫉妒、不甘、愤怒，但是鉴于他的家族的轨迹，后白河天皇是不可能再信任他了。绝望之中，他准备发泄，准备以死相搏。1159年，源义朝起兵谋反。这就是为平清盛奠定执政基础的“平治之乱”。

后白河天皇在平定保元之乱后，重用了两个人，一个是藤原通宪，一个就是平清盛。其中的藤原通宪，也是藤原家族支脉的一朵奇葩。他曾经在藤原璋子那里侍奉过几年，颇得藤原璋子喜爱。他本人也努力求学，博览群书，一度被视为当世无双的鸿才。他还曾拒绝鸟羽天皇重用，然后剃度出家，法名“信西”。但他与俗务的联系仍然没有中断，也一如既往地忠于鸟羽法皇。他的妻子，是鸟羽法皇儿子雅仁亲王的乳母。因为这层关系，后白河天皇即位之后，藤原通宪开始掌握政治实权。在保元之乱中，源义朝之所以这么快取得胜利，也离不开藤原通宪的策略。

保元之乱后，藤原通宪和后白河天皇一起，继续削弱摄关家的力量，恢复皇权，重新设立记录庄园券契所，整理全国的庄园。一时之间，藤原通宪的权势炙手可热。在推进庄园改革的过程中，藤原家和平家的关系非常好——其实这也很正常，比起源家，平家算是“根正苗红”，本族当中没有叛乱者，也很会把握政治方向，总是和有潜力的天皇保持同步。藤原通宪的改革，也同样需要武士的支持，他选择了平家。几乎平家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被藤原通宪委以重任：平清盛担任播磨守，平赖盛为安艺守，平教盛为淡路守，平经盛为常陆介。这些人都有自己的领国和封地，目的就是整理庄园。同时，平家还负责管理宗教系统，包括各种神社与寺庙，充当京都的警察、维护京城的治安。为了拉拢平氏，藤原通宪还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平家的闺女。这样，两家在政治改革中能够互利互惠。

源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彼时的源家，在朝堂上属于卖力不讨好的。在保元之乱中，本来和平家一样的出力，却在封赏的时候，让平清盛抢了风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藤原通宪的意思。源义朝的父亲和亲属们之所以被处死，也是因为在藤原通宪掌权的时候，恢复了死刑。源义朝尽管处境非常尴尬，但还是在努力为源氏寻求出路，联姻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据说，源义朝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藤原通宪的儿子。藤原通宪不但不领情，还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他回复源义朝说，自己

是书香门第，不想儿子做武家的女婿。这样一来，源家和藤原通宪家的关系也紧张了。

任何时候，一支政治势力想要一枝独秀都是不可能的。就是藤原家族，几百年来也在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进行斗争，也有调和与妥协。在藤原通宪步步高升的时候，二条天皇不乐意了。二条天皇是后白河天皇，现在的后白河法皇的长子。他的养母藤原得子，是鸟羽法皇的皇后，近卫天皇的母亲，封号“美福门院”。在后白河天皇即位的过程中，美福门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女子还继承了鸟羽天皇的庄园，可以说既有权势又有钱。而且她也很喜欢这二条天皇。后白河天皇拿美福门院也丝毫没有办法，他之所以在保元之乱后不久匆匆去做太上皇，也是因为这个女子给施加的压力太过强大了。这么一来，后白河法皇又和自己的儿子过不去了。

二条天皇本人也是个怪胎。他即位之后，决心亲政，父子关系是越搞越僵。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个性，他甚至不顾后白河法皇的反对，娶了近卫天皇的寡后多子为妻室，以致出现日本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两个天皇一个皇后的怪事。二条天皇倚重的人物主要是自己的舅舅藤原经宗和自己的乳兄弟藤原惟方，又有强大的美福门院作为后台，这让后白河法皇更加头疼。后白河法皇觉得自己只有一个藤原通宪和一个平清盛，那是明显不够用了。所以，他又开始筛选自己合适的助手了。这个人选就是藤原信赖。这个藤原信赖，恰好和源义朝的关系比较好。这么一来，各方人物到齐，一场大戏即将上演。

藤原信赖据说是个帅哥。帅也有帅的好处。可能是因为人比较好看，他在1157年，那是一路飞升。当然，他一直也是后白河法皇的强力支持者，在“保元之乱”对付崇德上皇的过程中，他还是出了很多力的。藤原信赖的领地和源义朝的领地比较近，二者关系也相当不错。还有，藤原信赖就任管理院厅军马的马别当，源义朝时

任左马头，二人由于职位，更加深了关系。在当时，武力已经成为政令的保障，藤原信赖需要一个武家势力来依靠，所以他选择了源义朝。同时，藤原信赖还和摄关家联姻。信赖的实力一步一步增强，后白河法皇倒是很满意，但藤原通宪不干了。

本来，强强联手这是件好事情，可这两派实在是联不起来。藤原通宪本质上也是个文人，争强好胜，唯我独尊，不能忍受一山二虎。而他们所倚仗的平家和源家，却又彼此看着不顺眼。后白河法皇这场心思不但没起作用，反而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了。二条天皇本来看藤原通宪不顺眼，平清盛呢，有点老奸巨猾，或者是不愿意参与到这种无聊的争斗之中，他甚至还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藤原信赖的儿子了。

1159年，平清盛带着自己的儿子外出参拜。

这时候，二条天皇和后白河上皇已经互相把对方的得力助手处理掉不少了，局势非常紧张。平清盛这一走，等于是给了一条导火线。

1159年年底，藤原信赖和源义朝控制了后白河上皇，并在上皇的居所放了一把火，很快，京城就在二人的掌握之中。藤原通宪在慌乱之中逃出京城，但被源家人一路追击，最后，藤原通宪在荒野中绝望自杀了。一时之间，京城血流成河，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彻底被源义朝控制，他如愿以偿地迫使天皇对他进行封赏——封了和平清盛一样的职位。源义朝和藤原信赖估计是为眼前的胜利所迷惑，因为信赖觉得平清盛是自己的亲戚，不会站在和自己对立的位置上。但他没有想一想，这个时候，就是他的亲爹也靠不住啊。

平清盛在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居然没有太过震惊。他回到京城，首先向信赖示好，解除其防备之心，并派人偷偷去见后白河上皇。后白河上皇此时因为藤原通宪的死很不高兴，趁着局势未稳，一切都还混乱，自己找个机会逃走了。二条天皇也跑到平清盛的住所里去了。等天皇们都逃走了，源义朝才回过神来，这时候平清盛已经

聚集好人马，准备出战了。

源家和平家的人马都很强悍，僵持了很长的时间才分出胜负。源义朝当时的人马不过一千，而平清盛的全军有三千骑之多。源家的好几个将领见风使舵，转而投靠了平清盛。源义朝等人虽勇敢死战，但也无力回天，最终在三条河原被击溃，在家臣的护卫之下，仓皇逃出生战场。随后，藤原信赖被处以死刑。源义朝在逃亡的过程中，被自己的家臣所杀。源氏一族遭到平清盛的清剿，死的死，匿的匿，元气大伤。此时尚年幼的三男源赖朝，在战争中与父亲失散，后来也被平宗清捉住，然后被带到京城，最终被判流放到伊豆。

到这个时候，已经无人能阻止平清盛了。这是武士集团首次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它的后果是显著的。

这场战争，平清盛的政敌或者永久地从这个世界消失，或者暂时蛰伏。平清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誉，平氏的领地又增加了至少五国以上，平家的所有参战男丁都得到了封赏。后白河上皇非常郁闷了一段时间，他本来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引发了如此的一场混乱。他的儿子二条天皇实力不但没有什么损失，而且在战后，还迎娶了近卫天皇的皇后藤原多子。后白河上皇要卷土重来的话，只有依靠平清盛了。

京城似乎是在平清盛的控制之下了。他也有很多抱负的，他的理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很久之前，他就对海外贸易非常感兴趣，他极力推动日本和宋朝的贸易关系。他甚至在离神户不远的海边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靠海的皇城，并计划迁都。但是贵族和平民都很反感这个计划，于是他失败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也学着藤原家族那样，把自己的女儿嫁到皇室。1180年，他的外孙子也做了天皇。他还很强悍地处理了僧兵问题，袭击和焚烧了奈良的东大寺与兴福寺，这两处寺庙都是藤原家的产业。他把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身边反对藤原通宪的力量基本都清除了，天

皇的父子关系得到了改善。平氏一门，遍及京城中所有重要的职位：院厅别当、左马寮、内藏寮，平氏对朝廷的影响和渗透史无前例的深刻。同时许多武士家族在战乱中被淘汰，平家再度有了大的发展空间。京都的治安维持、地方叛乱的镇压、庄园的管理等工作都被平氏独占，他们以此掌握了各国的军权和警备权。早在1160年，平清盛这位武士门第出来的人，已经升任参议。武家出身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那个平安时代的奢华优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接下来，是武力决定一切的时代，战火将在这片岛国的土地上继续蔓延。

第四节 源赖朝创立幕府：武士集团的又一次升华

源义朝兵败被杀之后，他有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幸运地活下来了。其中著名的兄弟俩就是源赖朝和源义经。当时源赖朝仅仅13岁，而乳名牛若的源义经，彼时尚在母亲常盘夫人的怀中吃奶呢。

平清盛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未把源赖朝杀死。另一个遗憾就是，他把源义经一直养到六七岁。这其中，与两个女人有关系：一个是他的继母池禅尼，一个是源义朝的宠妾常盘夫人。

捉到源赖朝的时候，平清盛是想把他杀了的。但是平清盛的继母池禅尼看到13岁的源赖朝的时候，非常吃惊，觉得他长得很像她早夭的儿子，于是连哭带闹带绝食地请求平清盛保留源赖朝的性命。平清盛只好答应，把源赖朝流放到伊豆去了。源赖朝在伊豆一被流放就是二十几年。

在源义朝战败之后，常盘夫人带着自己的三个幼儿，风雪之中想去投靠自己的母亲，没料到自己的母亲早就被平清盛捉到了。于是，常盘夫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平清盛的府邸，为自己的母亲求情。妇幼入虎口，常盘夫人也是抱了必死的决心的。

但是呢，常盘夫人是个美女，这一点平清盛也久闻大名，于是接见了常盘夫人。果然是一见倾心，当时就想据为己有。常盘夫人请求平清盛保全自己孩子和母亲的性命，平清盛答应了。于是，大一点的兄弟俩被送到寺庙出家了，尚在襁褓之中的源义经，跟着母亲生活到4岁左右，也被送出去当和尚了。在当和尚的过程中，源义经也是很另类的，不仅没有剃度，也不念经，反而跟着人学习起兵法来。到十几岁的时候，源义经就是一个文武双全并且俊美无双的少年才俊了。他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决定辗转投奔自己的哥哥。在后来讨伐平清盛的战争中，源义经以他的聪明才智和武艺，冲锋陷阵，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引起了兄长的嫉妒。



源赖朝像（图片来自：半岛网）

源赖朝呢，在伊豆，过的日子还是挺逍遥的，起码不像弟弟那样四处飘零。更重要的是，他还找了一个很好的岳父家——北条家，娶了个文武双全的老婆——北条政子。当时的伊豆是北条家的领地，源赖朝流放至此，北条家替平清盛监管源赖朝。

北条家的女儿北条政子早就很倾慕这位少年英雄，等有机会见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就芳心暗许了。北条家很不同意这门婚事，一个好端端的贵族家的姑娘，怎么能嫁给一个流放的犯人呢？但北条姑娘相当勇敢，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居然私奔到源赖朝那里去了。如此一来，北条家也没有办法，只好承认。由此，源赖朝多了一个贤内助。这点，他比他弟弟强多了，他弟弟源义经，最后娶了个著名的艺妓做老婆。

等源赖朝被流放到二十多个年头的时候，平清盛和平家在京城，已经搞得怨声四起、树敌颇多了。

平清盛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骨子里其实没有任何改变的日本。太上皇们生活在院政的旧梦里，天皇们积极地寻求着增强自身权力的办法。对现有的制度，平清盛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力量：他陷入了一个权力的泥坑之中，无法自拔。他也落入了俗套，使用各种办法增强自己的权力，直到自己成为天皇的外祖父。这时候，他的年岁已经不小了，他的儿孙也已经很多了。有很多事情，他既控制不住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家族。

后白河法皇，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平清盛权势日盛的时候，他也没停止过折腾。1177年，后白河法皇与院政的近臣们进行了一场恢复权力的努力，还没行动呢，就被告密了。参与者不是被杀，就是被平清盛给流放了。还好，平清盛最终还是没有直接向法皇兴师问罪。

1179年，后白河法皇在平清盛的爱女平盛子去世之时，没和平清盛商议就把平盛子的庄园给收归国有了。同样的事情在平清盛的儿子平重盛去世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这一次，后白河法皇直接没收了平重盛的领地越前国。平清盛一边悲伤一边大怒，亲自率领大军到福原，把支持法皇的那一波大臣，全部给灭了。这次后白河法皇也未能幸免，平清盛直接把他给抓起来，囚禁在鸟羽殿。后白河法皇的院政时代

就这么结束了，平清盛独揽大权。

他试图控制皇室。他硬将自己的女儿建礼门院德子嫁给高仓天皇，让自己襁褓之中的外孙登基成为安德天皇，彻底控制了整个朝廷。同时，在清理庄园、扩大平家权力的同时，平家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为五六百个庄园的领主。一时之间，平家攀上繁华的顶峰：“绮罗充满，堂上如花，轩骑群集，门前若市。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应有尽有。”

随之而来的是平家行为的不端。一个人没有拥有权力的时候，永远不知道它有多诱人也不知道它有多坏。而一旦不好好使用，权力给他人带来的是灾祸，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平家不仅横征暴敛，而且对其他大小贵族也缺乏应有的尊重。1170年，摄政藤原基房外出度假归来，遇到了平清盛的孙子平资盛的车队。一般的礼节是，大小官员见到摄政的车队都要下车行礼，但平资盛显然没有将摄政放在眼中，居然没有下马。藤原基房的随从很是愤怒，将平资盛从车上拉下来，羞辱了一番（也有说当时平资盛乘坐的是女车，一介武士乘坐女车到大街上是很让人笑话的事情）。平清盛听闻此事大怒，伺机报复。随后，藤原基房前往宫中参加高仓天皇的元服礼时，平清盛命属下300名武士，袭击了基房的车队，打坏其所乘的牛车，并断其侍从发髻。这个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平重盛的父亲平清盛命令平资盛前往伊势国闭门思过，并取消了他嫡长子的地位。

平清盛做的最让贵族们怨愤的一件事，就是迁都。1180年，他挟持后白河法皇、高仓上皇及天皇迁都福原。大小贵族和一些平民百姓不得不兴师动众，一路车马相随，劳心劳力搬家到福原。迁都之后，京都衰落，瞬间变成一片荒原。平清盛此举招致了僧侣、武士、权门贵族的普遍不满，加上京城这几年来一直处在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之中，反对派们已经决心行动了。平清盛的末日即将来临。

1180年的源赖朝，已经有很多的支持者。他人在伊豆，却时刻关注着平家的动向。当年，平家所有的敌人都有抬头的迹象。

源赖政和后白河法皇的次子以仁王，首先举起了对抗平家的大旗。事发之后，平清盛反应非常迅速，他派四儿子平知盛领军征讨之，最后败逃的以仁王和源赖政两人都被诛杀。接着，帮助以仁王对抗平氏的人一一被诛杀。而他这时候之所以选择迁都，也是因为福原是平家的势力范围，他已经小心到要把所有的一切控制在自己手心才能够放心。

1180年8月，伊豆的源赖朝终于与北条家联手，举兵讨伐平清盛。平清盛派嫡子平维盛带领大军进入关东，企图一举消灭源赖朝。然而，在与源赖朝交手的富士川一役中，还未等源义经等人真正出战，驻扎在河边的平维盛，因为自视甚高，不把源家放在眼中，不去琢磨打仗，反而带了一帮歌伎夜夜笙歌。因为太过放松，大军居然被水鸟起飞的声音吓得溃散。这事一传出去，平家的老脸算是丢尽了。这事也让平清盛的反对者觉得，平家的军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平家军了，平家确实没落了。

这场源平之战，持续到1185年，源赖朝并没有一帆风顺。第一场战役，他就灰头土脸地输了。1180年阴历八月，他在石桥山与平家军队遭遇。对方有三千骑兵，而他只有三百人，实力悬殊，战争结果可想而知。在被狠狠地修理一顿之后，他领着剩下的不多人马，逃到深山中去了。还好源赖朝是个很稳重的人，善于吸取教训，他一面四处笼络贵族和武士，一面研究战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稳扎稳打，终于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平氏领地。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天才弟弟源义经。

经过这次源平之战，源义经在日本民间被称为“战神”了。1184年1月20日，源义经一路攻入京都，随后奉哥哥的命令，进驻了平氏的根据地。2月，源义经在丹波的三草山打败平资盛。接着一鼓作气，在一个早晨他只身带着七十多人，冲到平氏的老巢，平宗盛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外甥——幼小的安德天皇逃往香川。1185年，在源氏对平氏决定性的一击中，源义经领兵二百多人渡摄津的渡部津，次日到达阿波。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就去攻打平氏在香川的栖身之地。平氏措手不及，只好自己放火烧了屋子，逃往海上。3月，源赖朝和源义经发动海战，悉数歼灭平氏残余部队，8岁的安德天皇投海自尽，平宗盛父子（平清盛死后由平宗盛继承平氏事业）被活捉。这场战争，被称为“坛浦之战”，接下来的天下，是源家的了。

源义经功高震主，又得到了后白河法皇的信任，曾经被任命接受官职。但是源赖朝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弟弟，他爹源义朝生性好色，妻妾成群，有好几个私生子在外头。源义经的母亲常盘夫人出身不好，后来又嫁给了平清盛，搞得兄弟二人之间一直是有隔阂的。最后，兄弟二人反目，义经出走，在无奈中自杀。他的孩子在出生之后也被源赖朝杀掉。一代“战神”的悲剧结局，还是令人欷歔的。当然时代就是如此，历史在不断前进，总有人留，总有人去。源赖朝要应付的事情还有很多，活着的悲剧往往比死去的更为严重。

从平清盛开始，武家开始控制日本的政治；而从源赖朝开始，这种东西开始制度化了。比起自己的弟弟，源赖朝算不上是一位成功的将军。但他有更多过人之处。他为击败平氏家族所作的努力都在幕后，不像源义经那么耀眼。

他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打仗，在伊豆的时候，源赖朝就十分注意武士的力量，他搜集了一大批来自关东的武士在他旗下。当然，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威望，还是沾了老爹的光。关东是源氏的发源地，许多武士本来就是他爹的部下或者部下的儿子，

对源氏很有感情。日后他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体系，这套体系既保障了武士对幕府的忠诚，也在经济上保证了武士的切身利益。因此，跟随源赖朝的武士，既有荣誉，又有安全感。于是源赖朝手下的武士和士兵越来越多，曾经有过短短一两个月武士就从几百涨到几万的辉煌纪录。

在重视武力的同时，源赖朝从未轻视其他人才。因此，他广招贤能，不论是侍奉过朝廷的官吏，还是地方上的下级武士，只要通晓政务、忠于自己的，他都加以重用。这些人为源赖朝组织了一个强大的智囊团，其中不乏博学多才、才华出众者。这些人帮助源赖朝管理朝政，促进改革，实行新的制度。

1185年，坛浦决战之后，源赖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190年，源赖朝与后白河法皇见面，正式受封，任朝廷权大纳言（编外太政官副职）、右近卫大将军等职，随后，他假以法皇名义控制各地军政大权。1192年，后白河法皇封源赖朝为“征夷大将军”。同年，后白河法皇去世，源赖朝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

镰仓幕府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保证武士的忠诚，借以维护自己的权力的呢？这就是“御家人”制度。

所谓“幕府”，字面意思是“营幕政府”。它的运作方式其实并不难理解，藤原家族利用“摄政”和“关白”两种职位来控制天皇，而源赖朝使用的是一套机构，独立于天皇系统之外的机构来控制。前者需要以与皇室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源赖朝依靠的是武力。

源赖朝自消灭平氏后成为左右国家政局的关键人物，但是他并无意接管京都政府，而是致力于在关东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他的政权内设立了很多职位，都由自己

的亲信担任，平时管理武士，战时指挥军队。没几年的时间，这个体制就很完善了。不过，源赖朝无法也无意消除被神话的皇权的影响，幕府需要行使的大量权力，仍然来自天皇“授予”，即便这种“授予”只有象征的意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影响了日本六七百年的国内和国际关系。

御家人制，是维护幕府体系的基石。御家人，字面意思指镰仓时代“与将军直接保持主从关系的武士”。直白一些来讲，武士与将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人身关系，他们要唯主人马首是瞻，听从主人的命令。借此，武士们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和一定的经济利益。武士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是非常好的，他们以儒家的“忠”、“义”思想为理念，以土地为媒介结成了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这种关系，突破了原来小范围的血缘关系依附的局限，以一种契约关系取而代之。这种关系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文本作为参考，但却是心照不宣的。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武士一旦选择投靠自己的主人，就要无条件地听从指挥。武士们除了战时的打仗任务，平时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担任警卫，维护京都和地方的治安。

这种类似于主仆的关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在源平战争以及日后掌权的过程中，源家没收了敌人的很多土地，同时，朝廷也赐给了源赖朝很多土地，加上源家本身的，其数量已经让平清盛望尘莫及了。它包括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百多个庄园以及伊豆、相模、上总、信浓、越后、骏河、武藏、下总、丰后等九国。这些全部都是将军的辖地。源赖朝分配自己的武士们去到各国担任监管人员。幕府主要的财政来源都是这些领地。

源赖朝非常明白这些土地的重要性，与以往的朝廷相比，镰仓政权的组成者基本都是中小地主和贵族。在藤原家族和平清盛时代，他们维持自己的土地是很辛苦的事情，为了免税，不得不将其寄放在更大的贵族名下，还有随时失去的可能。他们之

所以能跟随源赖朝参加内战，为的就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能够得到保障。这一点，源赖朝做得很好。他不但保证了御家人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还赐予有的人新的土地，并通过守护地头制的建立使之获得法律根据。

同时，他收获了“御家人”的绝对忠诚。绝大多数武士感恩于将军的恩赐，会在战场上为将军拼命。一旦“御家人”玩忽职守，就有被剥夺土地的危险。所以，这种将军和武士的关系之所以能维持很长时间，是因为土地这种财富。事实证明，这种土地的分配方式还是很有效的。

日本在源赖朝的设计下，变成了一个由军事贵族统治的国家。将军以及他手下的“御家人”或者武士，不但控制了中央的权力，也控制了更为强大的地方权力。幕府有一套自己的封臣制度，并能为这种制度支付足够的“薪水”。在对待中央的皇权上，源赖朝是谨慎的，藤原家族虽然衰落，但其政治余威还在。他在这套原有的旧的体系上，完美地延伸并巩固了自己的权力。那些所谓的封地，其所有权仍然属于天皇，但土地上的相关利益，却切切实实地归到了幕府手中。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经营自己幕府的权力，源赖朝还获得了控制所有政府职位人员安排的权力。这样，他手下的武士们就光明正大地担任郡国的这些重要职位去了。而且，他可以随时创造一个职位去安排给自己的亲信。

被派往地方的武士们，有征税的权力，有治安的权力，还有司法审判的权力。同时，武士们也有维护地方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义务。

幕府和京都政权并存，确实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皇室对此的反应，依然是无可奈何。尽管源赖朝和北条氏对皇室贵族都持妥协态度，但皇室还是不甘心于部分权力的丧失而伺机反扑。1199年，源赖朝去世，在一番政治变乱后，他的妻子北条政子

开始掌握大权，成为幕府中最有话语权的人物。1221年，后鸟羽上皇试图利用僧兵和一些对幕府不满的武士，去恢复皇权。但后鸟羽上皇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他的兵加到一起，也只是一万多人。北条政子临危不惧，给武士们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一旦这次输给皇室，那么，武士们辛苦建立起来的一些自由和保障，势必会消失。于是，源氏的御家人又团结起来，兵力迅速增加到19万人，幕府军出镰仓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京都。之后，幕府们流放了三个太上皇，废了天皇，并立了后堀河天皇。对站在皇室一边的公卿、武士分别处以斩、流之刑，没收他们的领地三千多处，使有战功的御家人充任这些领地的地头。

这一战，幕府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不仅获得了很多土地，更重要的是，幕府在京城设立了一个代理机构——“六波罗”府，用“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彻底地将京都政权给监视起来了。这个职位由北条氏世袭。随后，北条氏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动，完善了幕府的体制。

至此，武士和幕府，带给日本的变化尚仅限于内部的张弛。在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日本重要的周边国家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的繁华以及五代十国的变乱之后，迎来了GDP很高但国防较差的两宋。在唐朝，日本一直向中国派遣留学生与使者，宋朝的时候，两国的贸易很发达。日本的另一个邻居朝鲜，在镰仓时代一直和日本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这一点比较难能可贵。但彼时的宋朝，正在“培育”全世界的敌人——元军。我们可能还记得，在源平合战的时候，在源家的步步紧逼下，平家人抱着自己的小天皇投海。到1279年，大宋，如此大的一个帝国，则是两位大臣抱着小皇帝，被元军逼上绝路，并在崖山上上演了山河变色的悲壮一幕。宋国就此灭亡了。

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他的足迹已经踏遍欧亚，唯独没有尝试过一次渡海作战。他向

东的足迹，被大海阻隔了，但这不妨碍他有征服日本的梦想。从1274年开始，忽必烈开始派兵进攻日本。东亚的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同时，这也是武士集团所面临的第一个外来的挑战。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元朝入侵日本：武士集团的第一次考验

第一节 北条氏打造的“结实幕府”

源赖朝建立的镰仓幕府，是个比较“结实”的幕府，是他和他的妻子共同建立的。源赖朝在世的时候，尽一切努力清理了有可能会威胁其地位的人，这些人包括他的兄弟，以及跟随他一同战斗的人。不过源氏一族，最终也没有在镰仓幕府占据第一位。1199年，源赖朝因坠马染病去世，他的妻子北条政子不得不担负起了管理幕府的职责。在北条政子用尽全力的管理下，镰仓幕府在接下来应对忽必烈的大元帝国的入侵中，成功保卫了自己的国家。

北条政子是个神奇、勇敢又有谋略而且专情的女子。

在彼时的日本，一个有地位的男子，拥有多名姬妾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过北条政子却非常反感丈夫的纳妾行为。那些被源赖朝宠爱的姬妾，遇上这么一位正室，几

乎全都倒了霉。1182年，源赖朝在嫡子源赖家出生之前，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家臣宅邸养了个小妾。北条政子知道后大怒，让自己的娘家人到这名侍妾家兴师问罪，搞得源赖朝很没面子，于是和北条家对着干起来。最后，为了平息老婆的怒气，源赖朝不得不低头认错，还把自己的那位家臣给流放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估计还有很多，源赖朝是个比较怕老婆的男人，他的一个姬妾后来生的儿子，因为惧怕北条政子，7岁就出家了，这才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一生。

尽管如此，北条政子却是个不幸的母亲。1197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大姬生病去世。1199年，丈夫源赖朝坠马染病而死。不久，她的幼女三藩又突然病故。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之下，北条政子终于受不住，落发为尼，她的长子源赖家就成为源家的首领。

源赖朝一辈子叱咤风云，对自己的兄弟心狠手辣，为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能够一直处在政治的巅峰。不过他这个儿子实在是不像他。源赖家缺乏统治御家人的能力，又胳膊肘向外拐，重用在自己的丈人家比企氏，将幕府的元老们放在一边不予理视。这么一来，姥姥家北条家就很不满了：你源家的江山，是北条家一手帮着打下来的，现在冒出一个比企氏算是什么东西啊。于是纷纷跑到北条政子跟前哭诉，北条政子这尼姑的清静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当然，她也非常生气。于是，1199年4月，源赖家连源家首领的位子还没坐热乎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妈夺去了诉讼裁判权，并确定由幕府的一干老臣，比如北条时政（北条政子的父亲）、北条义时（北条政子的兄弟）、大江广元等13人共同裁决的集体合议制度。这样，御家人的不满暂时平息了。但是地方上，反源赖家幕府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北条政子等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1203年8月，北条政子对自己的亲儿子下手了。她和北条时政合谋，

废黜了源赖家（1202年，源赖家被天皇封为“平安征夷大将军”），并剥夺了源赖家的封地。源赖家和企氏企图反抗，但是被北条政子给打败了。同时，源赖家在关东的28个领国，也归了他的弟弟源实朝。源实朝继源赖家之后，成了幕府第三代将军。源赖家则被流放到自己姥姥家的地盘伊豆去，出家做和尚了。北条家对待自己的外孙也相当狠心，第二年就派刺客去暗杀了源赖家。

而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日子也非常不好过。北条时政和北条义时掌握实际的幕府权力不说，在1209年，又对源实朝下手了，不过没有成功。随后北条时政退居二线，北条义时当上了幕府的主宰者。北条义时像源赖朝一样，清除了自己所有可能的对手，并唆使源赖家的儿子公晓杀死了源实朝，随后又派人杀害了公晓。到这里，源家直系三代血统都被消灭了，北条氏掌握了幕府的最高权力，北条政子成为幕府的实际最高统治者。这个出身伊豆地方小豪族的北条氏一家，从搭上源家开始摇身一变，以执政名义几乎在整个镰仓时代掌握着幕府的实权。而源氏的统治，加起来不过27年。之后，北条政子又带领北条家族，抵抗了鸟羽上皇的倒幕战争，将鸟羽、顺德和土御门三上皇分别流放到三个孤岛上，废年仅4岁的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幕府新设“六波罗探题”取代京都守护，赋予监视朝廷并行使幕府统治力量一直薄弱的爱知县以西各国的司法和行政权力，监督和指挥西国御家人，北条氏世袭其职。

在将上皇们流放之后，幕府得到了很多实际的利益：幕府不仅控制了政治权力，那些天皇和反对派的庄园也尽收囊中，幕府的经济基础迅速加强。北条氏又专心于国内经济的发展。1224年6月，北条义时去世，时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泰时（时政之幼子）继任幕府执权。为了稳固北条氏的地位，北条泰时将北条氏一族提升为“家督”，有别于其他的实力御家人。不久，“尼将军”北条政子等幕府元老也去世了，北条泰时集幕府所有的权力于一身。

北条泰时是个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少年时代，他深受父亲北条义时与姑母北条政子的关爱。在他们的影响下，北条泰时逐渐培养起稳健、宽容的个性，得到了众多御家人的拥戴。为了取得武士阶层的信任，北条泰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今天看来，很有“民主”的味道。他将“执权”一职由一人增到二人，另一人称“连署”。然后，他又废除了执权的独裁统治，设立由11人组成的“评定众”，与执权、连署一同议政。评定众的地位仅次于执权、连署，由北条氏及其他实力御家人世袭。不过这个“评定众”最后还是由北条氏自己控制了。

在平息天皇的倒幕战争之后，御家人之间对土地的争夺日益激烈，裁判稍有不公，即会招致御家人的反对。为了平息纷争，巩固幕府统治，1232年，北条泰时制定了一部武士的重要法典《御成败式目》，又称《贞永式目》，简称《式目》。这部法典是基于源赖朝以来的武士习惯法制定的，共51条，内容涉及社寺关系、守护和地头的权限、所领关系、诉讼手续等一系列问题，是武士司法裁判的重要准则。《式目》肯定了御家人的土地所有权，赋予他们守护职、地头职以法律依据，从而巩固了封建武士的胜利成果。

《式目》是镰仓幕府武家社会的根本法典，也是第一部武士阶级自己的法典。它标志着武士不再从属于公家，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式目》再次否定了将军的独裁制度，确立了幕府“法治”的政治方针。在这部武士的法典中，还规定了妇女的财产权利。比如，妇女具有一定的遗产继承权利，离异的女性如果改嫁，她们原来结婚时所带的嫁妆能够带到改嫁的夫家去。《式目》施行的范围最初仅限于幕府管辖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到全国。《式目》作为武家的基本法典，对后来的武家法制影响很大。

1249年，北条泰时又设“引付众”，由评定众的长官兼任，管理御家人的诉讼。这

一举措使得武士阶层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也能对将军独裁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北条泰时的这一系列举措，为他赢得了很多御家人的欢心，北条氏的威望也理所当然地提高了。

镰仓时代的经济，依旧是庄园经济，庄园的统治者是庄园领主（国司）和由御家人担当庄官（在厅官人）的地头。地头拥有“下地”（产生收益的土地）的管理、征税、警察和裁判等职权。在庄园上耕作的农民也分为好几个阶层：大名主、小名主（“百姓名主”）、作人（“小百姓”）、“下人”和“所从”。简而言之，就是大地主把自己的地包给小地主，土地上的农人都是佣工。一般的“大名主”基本上也是御家人，小名主和作人、下人、所从是庄园里的基本劳动者。一般来说，土地30%~40%的成果都要交给领主。幕府除了海外贸易收入，其经济来源就是靠这些土地的收入。

因此，镰仓时代，政府鼓励开荒。日本犄角旮旯的土地都在政府的倡导之下，变成了良田。关东和九州的边缘地带，成为盛产稻米的地方。而在那些已经无可开垦的土地上，农民们用他们的智慧，努力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产量。从镰仓中期起，水稻和小麦可以在一年之内，在一块土地上收获——这在当时和后世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北条泰时也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幕府统治者，他在公元1264年，为了鼓励农人们耕作，一年两熟的土地，只收一次税。这时候的农民已经学会将农家肥应用在土地上，田间的灌溉设施也有很大的发展。

随着农业的进步，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日益繁多。田间需要的各色农具、餐桌使用的餐具、与衣食住行有关的商品越来越丰富，专门的技术工匠不再从事农业劳作，因此专业水准大大提高。因为武士需要刀，随着武士制度的确立，锻造技术突飞猛进。

在农闲之余，农民们可以每月三次到集市上购买自己需要的各种东西，并且可以用自己庄园的特产换取必备的生活用品。越来越多的人从事专门的商人职业，包括货物买卖、运输等行业。这些行业随着规模的扩大，会雇用很多工人。新的公共空间——公会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从此时开始，在商业交易中，钱币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因为和宋朝的贸易频繁，没有专门货币的日本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宋朝的铜钱。不久之后，地租等也通过钱币来支付，高利贷也盛行起来——这一切都在显示，北条政府通过自己的努力，造就了一个相当好的社会条件。

第二节 强大而凶悍的邻居

直到成吉思汗崛起之时，日本尚与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正常的贸易往来。

在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在平安时代的末期，中国和日本又恢复了邦交正常化，镰仓幕府持续了这一传统。

当时宋朝的皇帝是宋宁宗赵扩，尽管北方的军事强国们虎视眈眈，但宋朝在宁宗的统治之下也保持着经济的飞速发展。1216年，源实朝甚至准备了一个60人的队伍，准备到他们仰慕已久的宋朝去看看，不过彼时日本的港口建设和造船技术没有支持这次大规模的访宋。

说白了呢，日本之所以喜欢宋朝，还是因为钱。日本自己不造货币，就希望通过贸易，多从宋朝弄些铜钱过来。所以，日本的商人就喜欢开着满载货物的船到宋朝去，将其变成铜钱载回日本。到镰仓幕府的时候，光是大船，每年到中国的就是50艘左右，再加上那些小的，比起镰仓时代每月三次的集市，那是频繁多了。日本的工艺品以精美细致著称，那些刀剑、扇子以及美术工艺品在宋朝有很大的市场，除了从宋朝换回铜钱，宋朝的陶瓷、茶叶、香料、丝绸等在日本的上流社会也很是流

行。

当然，宋朝的铜钱那是有去无回了。长此以往，宋朝自己的钱币不够流通了，于是就开始限制对外贸易了。幕府也觉得老是把人家的钱弄过来，也不好意思，就同意了宋朝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幕府直接定期派出一定数量的船只到中国去进行贸易。两国的人民也友好往来，有不少宋朝人甚至移民到日本定居。一直到元朝和宋朝打了四十多年的仗，固执的日本人依旧和南宋保持着联系。

在镰仓时代，还有大量的僧人到中国访问，其中在宋朝时就有一百多位。他们云游四方，体会中国的风土人情、与中国僧人进行佛学交流。不少日本僧人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非常出色，主要集中于儒学、汉诗文学、书法、绘画、建筑、印刷等各种学艺。僧人们也很喜欢宋朝的建筑、医学，回国的时候，僧人的行李都是很重的，里面带了大量的宋朝书籍。

在这种和平的状态下，日本做梦也不曾想到元朝这个彪悍的家伙会来进攻自己。

在北条泰时和他的大臣们商量着怎么处理武士间的诉讼时，在突厥人统治了伊斯兰世界时，遥远的蒙古部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彪悍人物——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们，通过征服，造就了地球上最大的帝国——大元帝国。

成吉思汗是个苦孩子，他生于1167年，彼时的日本还是平清盛的天下。成吉思汗的父亲是部落首领，在一次争斗之中被杀。成吉思汗开始了流浪和打斗的生活，他勇猛、无情、狡猾。1206年，成吉思汗通过部落间的厮杀，成功地将蒙古部落统一在一起，获得“成吉思汗”的称号，这个称号的意思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在他生命接下来的时间里，他都在为这个称号努力着。他曾经说，“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

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而在实际的征战中，他屠杀、抢掠，他所认为的敌人，流的不是泪，是血。

而对于日本来说，很幸运的就是，他们待在大海中的四个大岛上，他们的领土没有连上欧亚大陆。成吉思汗的目标是中亚、欧洲和东亚的南宋。



忽必烈像

1205年到1209年，成吉思汗多次攻打了西夏，然后一步一步向南蚕食。1215年，他占领了今天的北京，1218年，朝鲜半岛也未能幸免地称臣了。如果不是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没准，进攻日本的就是爷爷本人而不是孙子忽必烈了。

忽必烈是他祖父事业的优秀继承者。

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和孙子蒙哥继续扩张。1234年，蒙古灭了大金国，随后全力进攻南宋。南宋在进行了四十多年的顽强抵抗之后，终于力不能支，崖山海战中，南宋的最后一批大臣和9岁的小皇帝，或战死或殉国，结局之惨烈，使风云变

色。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一支15万人的军队在欧洲进行征服事业。他们越过伏尔加河，占领了基辅和当时还不太重要的莫斯科。到1238年，大元帝国的攻俄军队，甚至到达了波罗的海沿岸。这场战争给欧洲人的印象是极端可怕的，在一位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僧人的记述中，基辅附近的俄罗斯人已经到了“羡慕死者”的地步了。大量的屠杀和抢劫将当地人活生生地赶入了一片真实的地狱之中。最后，拔都的军队打败了德意志的3万军队，穿过多瑙河，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要不是窝阔台此时去世，没准下一个目标就是大不列颠了。

窝阔台、蒙哥先后去世之后，蒙哥之弟忽必烈继承汗位，继续攻打南宋。时间就到了1266年。

1266年，镰仓幕府的实际掌权者是北条时宗。北条时宗是北条氏正宗嫡系出来的，是镰仓幕府的第八位执权。这个北条时宗，很有北条政子、北条时政等人的风范：强硬、自信，而又喜欢独断专行。1251年，北条时宗出生于世袭镰仓幕府执权一职的北条氏嫡流得宗家。在北条时宗之上有一位异母兄北条时辅，是北条时赖的侧室所生。比起这个哥哥，北条时宗的待遇不是一般的好。1257年，北条时宗的元服礼仪在将军御所进行，征夷大将军宗尊亲王亲自为他举办。北条氏的宗亲和当时比较重要的家族、公卿全部都来参加，这等于是向天下昭告了北条时宗的地位。宗尊亲王很喜欢这个聪明倔犟的小家伙，让他担任将军供奉等小侍所的别当。而在此之前，这个职位从未出现过两个人的情况。1261年4月，北条时宗与安达义景之女堀内殿结婚，当时也只有10岁。1264年，镰仓幕府六代执权北条长时出家，北条政村就任七代执权。8月年仅14岁的北条时宗就任相当于执权助理的连署一职。在这个职位上，北条时宗惊人的能力显现出来。他在1266年，和执权北条政村以及北条氏的重臣们联手，废除了企图颠覆幕府的宗尊亲王的征夷大将军之位，并将其送回京都，拥立惟康亲王为征夷大将军。

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是不大注意日本的。1265年，日本才开始进入忽必烈的视野。有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对忽必烈说，日本是可以臣服的，只要派个好使点的使节就好了。此时，忽必烈并没有对日本的不臣服表示什么不满，真正引起忽必烈注意的是高丽国国王的哭诉。当时在日本和高丽的公海上，那些来自日本的海盗非常猖獗，打砸抢烧，什么坏事都干。搞得朝鲜半岛一带沿海的居民，一直生活得战战兢兢。高丽国国王一琢磨，咱不是有新的保护国了吗，干脆，告状去。于是就给忽必烈上书，顺带添油加醋，说了一通日本的不是。

忽必烈一听，果然勃然大怒：你小小的日本，不主动来臣服也就罢了，居然敢在元帝国的地盘上撒野，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不过这时候他忙着攻打南宋，又想起赵彝的建议，决定派个使者去日本，招安算了。

于是，1266年，元朝的使者兵部侍郎黑的到达了日本，给日本一封国书。国书上这么写着：

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不宣至元三年八月

这封诏书呢，完全是以一个强国国君蔑视小国的态度写的，连哄带威胁，一副你日

本势必要答应样子。忽必烈还命令高丽元宗护送使者去日本，于是高丽的枢密院副使，就打算陪着元朝的兵部侍郎东渡，到日本去递国书去了。

这国书一递、使者一往来就是好几年，北条时宗也没打算像样地回复一下，其中的纠结程度，那是一言难尽了。

话说第一次打算递国书的时候，元朝的兵部侍郎千里迢迢地先是到达了朝鲜半岛，在高丽人的陪同下，又到了济州岛。高丽人也是很精明的，虽然去告了日本的状，但是一想到要是日本和元帝国真的打起来，那自己一定是夹心饼干，两头受气。所以，高丽的枢密院副使，就和元朝的兵部侍郎绕着圈圈到了海边，结果到海边的时候，恰好风高浪急，估计元朝的兵部侍郎也不是很想去日本，于是这次递国书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忽必烈那个气啊，他南征北战好多年了，啥样的苦没有吃过啊，区区一点风浪，怎么就能够阻挡递国书这么重要的事情呢？忽必烈斥责了高丽元宗一番，坚决认为其在这件事情上一点心也没有用，并命令他一定要办成这件事情。

高丽国国王于是郁闷了。1267年6月，忽必烈第二次命令黑的等作为国使持书去日本，并警告高丽国国王“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领为期”。高丽国国王看着这次是躲不过去了，但是决心不让黑的和日本直接接触。他再次借口“海道险阻，不可辱天使”，而让自己的起居舍人潘阜等代替元朝使节持元朝的国书赴日，这次总算将上次没送到日本的国书送到日本。随同送到日本的，还有高丽国国王的一封解释和劝说的信件。高丽国国王在信中说，元朝的皇帝之所以叫你们臣服，不是为了钱财和进贡之物，而是为了他那个帝国的名声。高丽国国王的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快点从了吧，写个服从的信，派个使者，很简单就完事了，不要找不必要的麻烦。

日本的边防小官在看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重视，一边好吃好喝地招待潘阜等人，一边立即将这封信连夜送到镰仓幕府去了。

这封信在幕府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幕府反复研究了一番，最后觉得这事很棘手，毕竟是国家之间的事情，于是将这个烫手山芋甩给天皇去处置了。天皇也很重视这件事，召集将军公卿们开会来讨论。讨论来讨论去，觉得决定还是比较难作的。于是，当时的天皇朝廷参议藤原长成，草草拟了一个回信，又交给幕府去处置了。这一来一回的，好长时间过去了，潘阜等人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啊。

北条时宗当时也还不到20岁，年轻气盛好面子。元朝的国书写得非常傲慢，但是人家有傲慢的资本啊，人家的马匹当时还在欧洲肆虐呢。但北条时宗不管这些，他认为，不回复就是最好的回复。于是，可怜的潘阜等人，在苦等了5个月之后，一路泪奔，两手空空地回国了。当然，兵部侍郎黑的又无功而返了。

忽必烈当然再次大怒，要是依着他的脾气，早就派出大军踏平日本了。不过这次，日本是彻底引起忽必烈的兴趣来了。这位领土横跨欧亚大陆的皇帝忍耐着，决定再派黑的等人去一趟日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并且下了个死命令：不准空着手回来。于是，可怜的黑的，又开始了日本的旅途，这次还是高丽国的潘阜陪着。

1268年2月，春寒料峭，在朝鲜陪同使节潘阜等陪同下，黑的、殷弘踏上了去日本的征途。这次，他们总算到了日本的对马岛。可悲惨的是，日本人不让他们上岛。要是再空着手回去，他们可不好向大汗交代啊。于是，黑的等人只好在海边磨蹭了好几天，伺机抓了两个岛民——一个叫塔二郎，一个叫弥二郎——回来，算是交差。忽必烈一看，抓了俩日本人回来，还以为是日本派来的使者呢，心里很高兴。他还专门安排人员带他们去看本朝的景色和风物，最后送他们回去，顺便带着元朝的国书。这次的国书，照旧到了天皇的手中。天皇也不含糊，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意

见：以前和现在，都没有听说过元朝这种称号，两国也没有什么往来，也不便作什么评价。意思是，你哪里来回哪里去好了。尽管天皇的信已经写得很冷漠了，可北条时宗还是觉得对元朝太客气了，扣住这封信不发。

忽必烈在日本身上碰了不少钉子了，决定发飙了。他一边组织兵力，一边再派遣老臣女真人赵良弼出使日本，下最后一次国书。这赵良弼是忽必烈的老部下了，也是元朝一个比较善于外交的老臣。他看忽必烈为日本的事情焦心，主动要求出使日本。忽必烈觉得赵良弼太老了，经不起长途跋涉，不让他去。赵良弼坚持要去，忽必烈打算派3000兵马送他。赵良弼不愿意，仅仅带了一些文官出发了。赵良弼一行，第一次到达日本是1271年9月，他们到了日本肥前金津（松浦郡），结果当地的地方官不当回事，要他们交出国书，但是不准他们见天皇，赵良弼等人无功而返。1272年3月，赵良弼一行又赴金津，又为太宰府所拒。这次，忽必烈的国书是递到天皇手中去了。但是天皇一看国书还是老一套，表面上说是要和睦相处，实际还是威胁日本一定要来臣服纳贡才行，否则就等着挨揍吧。

按照天皇这一边的想法就是，这种事情，答应了也就算了，反正也就是些财务的损失，而且说不定忽必烈一高兴，你所纳的那些贡，就好几倍地返还了。但是天皇说了不算啊，是战是和，那是要看北条时宗的。北条时宗真和忽必烈较上劲了。他们都是武家出身，所谓武家，所守的无非是忠诚和尊严。向元朝纳贡，就物质讲，那是小事，但是面子的事情是大。所以北条时宗看到这些诏书，一方面也担心，于是投入了不少精力在沿海防御上，另一方面呢，依旧不为所动，拒绝向元帝国朝贡或派遣使节。赵良弼带领的大元使团在日本太宰府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到第二年才返回高丽。这次，日本也派出了一些随行人员送他们回去。不过这些日本人到了北京后，忽必烈因为他们没有国书，拒绝接见。同时，忽必烈还想让尚在朝鲜的赵良弼继续出使日本。这次出使的细节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1273年春，赵良弼回到大

都的时候，依旧没有带回日本的任何国书。不过赵良弼在日本还是得到了这个国家的不少信息，他留下了很多文字记录，包括关于日本群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很多方面的内容，这些都可作为了解中日关系的参考。以至于当忽必烈决心征伐日本的时候，赵良弼劝道：这个地方四面环水，土地也不肥沃，得到那里的人民也没办法役使，得到了那里的土地也不能使元朝更加富裕；另外，驱船渡海，风高浪急，前途叵测，一旦发动战争，等于是进了无底洞了。正在气头上的忽必烈很难将赵良弼的话听进去，为这场战争，他已经投入很多：在派遣使者赴日本的时候，他命令高丽人给他造船一千艘，能够渡海载重，还派遣了不少监工到高丽去监管造船的进度；同时他还下令在高丽屯田，以准备进攻日本的补给。高丽的工匠、民工好几万人，日日夜夜都被迫为忽必烈的征日计划辛苦忙碌着。

1274年10月，元军大小战舰900艘、25 000左右的士兵和10 000多名水手，在都元帅蒙古人忻都、左副元帅高丽人洪茶丘、右副元帅山东人刘复亨等的率领下，从今天朝鲜的马山出发，进攻日本。高丽国国王也派金方庆率领大军随同出征。日本的武士集团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考验：如何击退30 000元军。

第三节 三万元军：武士集团的第一次大考验

北条幕府虽然对元朝的态度非常强硬，抱定了反抗的决心，但是似乎对忽必烈的种种战争准备都没有什么觉察。高丽不愿意在中间当夹心饼干，在忽必烈调集战舰的时候，高丽派使者到日本作出最后的外交努力，劝说他们干脆捡个省事的办法，服从算了，并且告诉了他们元军已经要打过来了。

日本的皇族和公卿们，早就知道了元军迟早有一天是要打过来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不断地前往神社，为国家祈福。甚至天皇本人也出动了。彼时的日本，没

有国家军队这一说，究竟谁来对付也是个犯难的事情。这个责任，北条氏理所当然地揽在身上了。除了幕府能够控制全国的大部分武家以及下属的武士组成的军队，别人都没有这个实力了。但即使是幕府的武士们，也是很分散的。因此，三万多元军十月初五到达日本对马岛西岸后，此时对马岛的守卫者是代引一族，这一族能够投入战斗的人马也只有不过百骑，很惨烈地战死了。接着，元军四百余人登陆壹岐岛，守护代宗助国父子率领八十骑拦阻，也全数牺牲。守军左卫门尉平经高率百余骑与元军激战，元军人多，加上还带着一些火炮，左卫门等人守了一天左右，被元军破城，平经高自杀。随后，元军转到博多湾登陆，在逼近肥前沿海岛屿时，遭到肥前守护松浦一族的英勇抗击，双方有一番激战，松浦一族死伤惨重。不久，元军到达了博多湾外。

九州各地的御家人，此时已经知道了对马的战况，在镇西奉行少二经资和大友赖泰的统率下向登陆地附近集结布防，并向六波罗急报。短短时间内，各地御家人集合了大概十万大军。11月26日，元军分两路在博多湾登陆。西路军在百道原登陆，遇到了500武士前来迎战，东路军在博多湾东部的博多箱崎成功登陆，击败守军，从背后突袭在百道原同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的武士们死伤惨重，退向太宰府水城。

在这场战斗中，武士们是相当讲究礼仪的。元军仓促登陆的时候，武士们并没有乘机而上，而是等元军排好队列之后，才礼貌地放箭表示宣战。但是，天真的武士没有想到，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惯于劫掠、不讲什么战争礼仪的战争机器。蒙古人远征欧亚就使用的长弓，射程长，杀伤力很强。而那些新式炮火则是武士们所没有的。面对这一切，武士们慌了手脚，再加上腹背受敌，不得不暂行撤退，再做打算。

元军这边呢，副帅刘复亨不幸中箭受伤，于是元军停止进攻。为了防止日本人偷

袭，元军全部回到自己的船上去了。而此时的元军，有蒙古人也有高丽人，两方对于战争的意见不统一，一个想打一个不想打，内讧起来。打了这么多天仗，元军也见识到了日本人宁死不屈的精神，而他们的对手居然只是一些地方武士，要是大部队真的来了，能不能应付也是一个问题。而且孤军奋战，补给也是个问题。凑巧的是，就在这一天晚上，海上忽然起了风暴。高丽的水手建议把船开到海上去，以免船只在大风之下触礁，否则，军队就别想撤离了。不太懂大海的蒙古人同意了。一些没有睡觉的日本武士见蒙古军队撤离，还进行了一番追击。不过，元军和高丽军队最大的伤亡，来自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将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变成了碎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元军的这些战舰都属于追求速度之下的不合格产品。大概有13000个元兵命丧大海，余下的人又经过高丽辗转回国，向忽必烈报告了这一战况。

再说日本一方，因为接连的战斗失利，皇族和公卿们去往神社祈福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恨不得住在神社不回来。落败的武士们也打算重整旗鼓，第二天从头再来。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武士们到战场一看，元军的船都不见了。至于是怎么不见的，日本人谁也说不出口所以然。武士们的第一场卫国战争就这样“被胜利”了。这次战役因为发生在日本后宇多天皇（1274—1287年在位）“文永”十一年，日本人称为“文永之役”。

元军第一次出征日本，到底谁胜谁负，说不清了。重要的是，两国都相信自己是胜利的，不过如何应对将来，两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忽必烈相信自己一方是胜利的，当然，也许是忻都等人回国后作了一番扭曲的描述，忽必烈也可能觉得这些人，远涉重洋作战，着实不大容易，不但没有责怪，还奖赏了一番。忽必烈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的军队一定是不会失败的，一定是主动撤退的。不过当时的忽必烈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南宋的围剿当中，立刻向日本人

复仇是不可能的事情。到1275年，忽必烈不知道哪根筋抽搐了，在完全没有关于日方情报的状况下，又派了一个使团，到日本去了。这支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还有何文著率领，又千里迢迢到日本劝降去了。

这个使团是非常悲剧性的。因为日本一方在战后，虽然觉得元军会卷土重来，却也认为是自己的信念感动了上苍，最终降下“神风”庇佑了日本。因此，此时的日本，上到天皇下到普通百姓，正积极地进行祈祷。天皇甚至亲自写了不少祈福的符书，全国各地到处去贴。就连年轻气盛的北条时宗居然也沉得住气，像模像样地抄了些佛经，四处分发。普通百姓也参与到这场礼拜神明的“运动”中来。

所以，当北条时宗再次看到忽必烈的使者的时候，一边冷笑一边大怒，不但不接受国书，还把这一行使者全部杀掉了。碍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忽必烈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使者已经有去无回了。久等不归，忽必烈又派了一个叫周福的人在1279年左右出使日本，和杜世忠一样，周福也被北条幕府杀死了。直到1280年，忽必烈才知道自己的使者全部被日本人杀掉了。于是，忽必烈勃然大怒，决定再次出兵日本。

1280年，忽必烈陆陆续续作好了出征日本的各种准备。

为了征服日本，忽必烈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日本行省”，算是建立了一个非常正规完善的行动小组，策划征服日本的事宜。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阿剌罕、范文虎、李庭、高丽忠烈王。其中高丽的责任主要是后勤，包括运输粮草和辎重。这个小组每天的会议不断，作出了不少方案，以便行动。

1280年8月，各路士兵几乎都齐了：江南的水军一共10万人，阿塔海、范文虎等率领，出发地点是浙江宁波；右丞忻都、洪茶丘及都元帅金方庆等统领蒙古、汉军及高丽军共3万人，分两路出发，其中东路军900艘战船25 000人从高丽出发。江南军

由阿剌罕指挥，洪茶丘和东路军会合后任东路军副统领，计划1281年6月15日在日本壹岐岛会合，欲一举歼灭日本王朝。虽然忽必烈不大能应付水战，但这次也作了完善的准备，很多战船都装有农具，以备占领日本后开垦之用。

在出师之前，忽必烈还作了个总动员，他说：“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园，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表示了对日本的“慷慨”和“宽容”。

一行大军就这样出发了。

刚出发的元军，首先陷入的麻烦是自己的内讧。因为将帅意见的不统一，以及指挥步调的不一致，那两路原本要在壹岐岛汇合的元军在时间上出现了很大的差错。而他们需要征服的对象，这几年来则是在积极地作准备。在二次斩杀元使的同时，北条幕府就知道元军在某一天会卷土重来，他们能做的就是敌人来的时候有备无患。全国上下除了不停地祈福，手头上也没有闲着，幕府动员各方力量加强防范措施。长门、国防、安艺、备后等临海的要塞，都修建了更加坚固的防御措施并设置了警戒力量，到了只要有敌人来，就能随时准备打仗的地步。

全国的御家人，甚至寺庙里的僧兵，都被动员起来，应对随时可能的战争。博多一带，因为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幕府动员广大军民修建了一个长十余公里、高三米的石墙，并且从周边的九州、土佐、山阳、山阴调来不少武士驻守。

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幕府还加紧修造战舰，训练水军。训练的目标是朝灵活的方向发展，以更好地应对笨重的元军。日本人也不容易，自从杀了元朝的使节之后，几乎是处在全民备战的状态。武士们恨不得穿着盔甲睡觉，工匠们连夜赶制武器备用。宫廷也非常节俭，以便省出点钱用于军备。甚至那些海盗也不打砸抢了，居然和政府的水军一起演习去了。日本人是真的抱成团儿了。

大战就这么开始了。1281年5月，忻都等人率领大军从高丽的合浦出发，乘着900艘船只，到了日本对马、壹岐两岛后，兵锋直指九州。不到一个月，元军就抵达了博多。遇到了那面专门为其修建的高墙和高墙里射出的连绵的箭——元军傻眼了。博多是不能登陆了，于是转而攻打志贺岛、能古岛。不过一样遭遇了严密的防守，没有攻下。

日军的灵活战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乘坐小型的船只去袭击元军的大型战舰，日军非常勇猛，一旦登上战舰，就挺身肉搏，再者放火烧船。这种突然的袭击搞得元军疲于应付，连夜里的觉也睡不好了，迫不得已，只好把所有的战船都连接起来，互相守卫。

继续说元军这边，因为指挥不当，范文虎率领的南路军，直到7月才到达日本海岸与先前的元军会合，两路元军拟攻打太宰府。

在此种情况下，日本各路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武士们充分发挥了武士道精神，为了荣誉，都想做最先的那一个。不断地有武士死在战场，死去的武士会附着天皇和上皇的亲笔文书送到陵墓，神社还会给这些人举行追悼仪式，一边悼念死者，一边继续祈福。

这场战争，一共持续了大概两个月。元军虽有局部的胜利，但由于日军顽强抗击，始终未能由九州海岸长驱直入。

到8月份，元军又遭遇了上一次的命运。在元军准备全面进攻的前夜，台风居然又刮起来了，风高浪急，那些拴在一起的战舰在相互碰撞之中，支离破碎，不少士兵溺水而死，大量士兵的尸体被冲到港湾，居然整个海湾都被堵住了。范文虎等人一看势头不好，乘船跑了。此时九龙山的海滩上尚留有近十万元军，这些人失去了补给

和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只好悲催地等死。三天后，日本的武士们开始反攻，剩余的元军被迫退到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大部分元军都阵亡了，两万多人做了俘虏。这些俘虏的命运可想而知，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不过这四等的命运和在中国内地的四等人的命运是截然相反的。前三等，包括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在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

1281年，是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这场战役在日本史上被记录为“弘安之役”。有准备的人才能打胜仗，这句话在这场战役里得到了验证。在应付元军漫长的准备中，“弘安之役”中日本人投入的军队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因为不擅长海战以及刀具等远不如日军，元军在战术上没有丝毫优势。以至于很多日本人认为，蒙古人在别的土地上制造的战争，可能是神话而已，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而真正强大的是日本武士，武士们的装备和战斗技术远远胜过蒙古人和高丽人以及汉人的杂牌军。

因为武士制度的逐渐确立，武士刀的锻造技术也突飞猛进，随之改善的还有武士的盔甲。日本的武士刀，其锋利程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足可以步入三甲。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

而这些武士，都是非常职业性的，他们从小在各种道场里接受职业培训，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战技胜过蒙古人毫不奇怪。这场战争即使没有“台风”的帮助，忽必烈能不能取胜，也很难说。

第四节 战争打赢了也是白打

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役。

范文虎等人逃回大都后，说自己打了败仗，不说自己抛弃全军逃走，忽必烈很大度地没有怪罪他们。

但在这次惨败中，原来从江浙一带出发的大军，只有三名士兵侥幸保住性命，他们拼凑了一艘小船，在海上漂流了数日，一路辛苦回到了大都。忽必烈通过这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真相，立刻把范文虎拉出去斩了，其他官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纵横四海的忽必烈，在小小的日本面前碰了钉子，非常不甘心。“弘安之役”失败后，忽必烈发了疯地想再次攻打日本，一圆自己的东亚梦。

过了两年，1283年，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元世祖再次打起精神部署远征日本。他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准备带领五卫军20 000人征日本。同样，这次也是由高丽督修战船，从南方各省征调军粮，责令江南行省打造海船。

在准备军用物资的过程中，官吏们虚报造船的数目，从中获取朝廷的经费。大批的工匠被征伐，离乡背井，工作强度又大，吃不好睡不好，死亡率非常高。沿海的渔民被强征作为水手，这些暴政，引发了元帝国剧烈的震荡。江南人民纷起反抗，许多人铤而走险做了强盗。一时间民不聊生，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因此，不少官员请求忽必烈不要再远征日本，以稳定国内的局势。曾出使日本的赵良弼也劝诫元世祖说，元军无法预测台风，如果一味地强征日本，无疑是拿有限的资源去填一个无底洞。许多官员同意赵良弼的意见，朝臣刘宣也上书劝谏罢征日本。

恰好忽必烈在这个时候，远征东南亚的事业进行得也不是很顺利，看到国内种种不和谐的景象，也只好作罢。1286年，忽必烈宣布不再东征日本，江浙一带的居民听说了这个消息，激动得都哭了。

于是，元朝的钱物和人力省下来不少。放弃一场准备已久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胜利。

反观日本呢，那是不争馒头争口气了，打赢了，幕府的地位“嗖”地一下，“刷刷”地升了好几个档次。

因为两次都狗屎运似的遇到了台风，因而战势急剧逆转，日本国内刮起来一股“神风”崇拜潮。此后的日本人和日本的历史书中，都极力大肆渲染，把两次飓风描述为保佑日本的“神风”。甚至在几百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还在太平洋战场上组织了一个“神风”特工队，加上日本独有的武士道精神，这些队员驾驶着飞机，撞了美国的军舰那次的“神风”计划，不仅没有挽救日本，反而把日本彻底打入了地狱。

这两次击退元军，都是北条氏幕府努力的结果。

但胜利的结果换来的还是继续的胆战心惊，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北条氏时时刻刻都担心元军再一次卷土重来。

因此，北条氏处在时时刻刻的备战状态下，其结果就是，全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投到军备和防御设施的修筑上了。在应付元军的二次入侵中，幕府已经在这上面花了很多钱了。他们在取得很大成果的同时，也掏空了自己的根基。日本为战争及以后的长期战略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这种对资源、财力的长期消耗成了镰仓幕府灭亡的一大致命伤。

与之一同变化的，还有御家人制度。

所谓的御家人，和将军之间由建立在封建道德基础上的权利和义务相维系着，御家人要对将军“忠”，无条件地服从将军的领导，要负担将军指派的军役和公役。将军要对御家人“信”，要保证誓死效忠的御家人始终拥有世袭领地，而且要根据战功大小，分给新的土地和财富。很简单的描述就是，你替将军打仗，将军保障你的生存以及各种福利。

但是在国内打仗和跟外国人打仗是不一样的。在国内打仗，幕府可以获取新的庄园和土地，这些土地一般会分给战场上英勇的武士和领主们。换言之就是，在国内打仗，一个武士如果英勇的话，是会有很多财富的。昔日，北条氏执权们在号召武士卖命的时候，会强调这种利益，并将被击败者的土地及其他战利品分赐给忠心的领主、武士作为酬劳。

但是和外国打仗的时候，幕府却无法兑现这种承诺，外敌入侵，不但要保卫家园，还要承担保卫家园的巨大财力支出。但是，赶走大元帝国的军队，没有带给幕府任何土地和其他收入。更悲催的是，当时日本没有全国性的赋税制度，光靠幕府本身是无法支付军费的。

大多数武士上战场的时候，除了赶走侵略者，也希望自己有所收获，尤其是名誉之外的收获。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是，这些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的武士，大都空手而归了。北条幕府将军又不愿拿出自己的财物，当然，北条幕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

所以，参战的众多御家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反而蒙受了沉重的经济损失。为了弥补这些亏空，不少御家人只好加紧侵占公有领地并拒绝交纳赋税。

这么一来，社会矛盾就越来越激化了。

北条氏也是树大招风，本来，在抗元战争前，镰仓幕府第八任执权北条时宗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幕府权力，因为抗元的胜利，北条幕府已经是声誉大大提高了。但他们还不满足，在武士们英勇打仗的时候，北条时宗还继续将北条氏的权力一步一步地扩张到地方，派自己的嫡系出任全国的守护，到镰仓幕府末期，几乎控制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守护职位。因为权势的扩张，北条氏与其他有权势家族的矛盾也日渐突出，不少御家人在这种权势的斗争中被株连。因此，越来越多的御家人开始不满北条氏的统治。

还有那些没有打仗，但在大后方花了不少精力祈福的庙宇和神社，他们甚至认为，幕府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他们日夜祈福，才换来“神风”的缘故。没有“神风”的守护，北条幕府是不会胜利的。这么一来，北条幕府的声誉反而大受影响了。

随之而来的，是北条氏幕府的灭亡。

1318 年，后醍醐天皇即位，就是这位天皇，积极开展了倒幕的活动。

1324年（正中元年），在经过长时间的筹划之后，后醍醐天皇准备与幕府开战。他命人分赴各地，策动地方豪族起来讨幕。不少地方倒幕势力聚集到京城，准备行动。但也有人不信任天皇，反而向六波罗告密。幕府得知后大惊，立即派使者到京，逮捕了倒幕的主谋，并押送至镰仓。后醍醐天皇一看事情败露，也没有办法，暂时采取了妥协态度，派人到镰仓解释自己并没有倒幕的意思，这件事情就这么了结了。此事史称“正中之变”。

这次政变之后，幕府和后醍醐天皇互相提高了警惕。1326年3月，因为东宫邦良亲王

逝去，在册立皇太子的问题上，幕府与后醍醐天皇发生了分歧。幕府坚决主张以持明院系统的量仁亲王为皇太子，使后醍醐天皇企图立嫡子的希望破灭。后醍醐天皇对幕府无限怨恨，更坚定了推翻幕府的决心，再次将倒幕计划付诸行动。另一次倒幕的行动发生在1331年，因为计划的疏漏和实力的悬殊，后醍醐天皇又失败了。

两次活动虽然都失败了，但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轻视皇室的思想。这不但给了皇族、贵族希望，而且促进了地方守护大名及各地倒幕势力的兴起。

1333年3月，后醍醐天皇再次发诏，讨伐幕府。

此时的北条幕府，在反对的呼声和行动中越来越控制不住局势，最后连自己的家臣也控制不住了。后醍醐天皇讨伐幕府诏书一发表，播磨、伯耆以及四国和九州等地的豪族与武士立即响应，倒幕勤王之师从四面八方兴起，幕府顿时四面楚歌。

最后，北条幕府的家臣足利高氏（后改名尊氏）和新田义贞相继背叛幕府，给幕府以致命的打击。1333年5月，镰仓被攻陷。至此，存续了149年之久的镰仓幕府灭亡了。

不过，这场争斗的最后赢家，还是武士和武士道精神。

这场争斗，使得日本整个民族和国家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将所有重心放在抵御外侮上。平安时代的文雅精神，几乎彻底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不计代价的牺牲精神和荣誉精神。突然袭来的民族自豪与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广泛传播开来，武士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而日元战争的胜利，不仅激发了日本民族空前的自信心，也激发了武士成为国家骨干的觉悟。

而武士，需要刀，更需要战场。它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以后不久的日

本，开始了漫长的“战国时代”。长期分裂割据的日本孕育催生了以菊花与刀为象征的武士文化，剽悍的武士从此在日本历史上起着暴烈的作用，直到将日本拖入世界大战的泥潭，甚至将整个东亚变成战场。

而这一切，如果北条幕府接受高丽的建议，形式上服从忽必烈，结局会如何，已经无法猜测，只能感叹了。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四章 1600年：一个基督徒贵妇的遭遇

第一节 大美女细川玉子的一生

足利尊氏在灭了镰仓幕府之后，他顺势又把后醍醐天皇赶到了京都以南的吉野，日本形成了两个南北对立的朝廷。为了巩固武士政权，足利幕府仿镰仓幕府《贞永式目》制定了《建武式目》，共17条。至第3代将军足利义满时，幕府达到全盛，1378年在京都室町建成幕府新址，1392年合并南北朝，实现对全国的统治，朝廷名存实亡。

室町幕府的机构是比较完善的：将军下设管领，总辖幕政，辅佐将军，由守护大名斯波、细川、畠山3家轮流担任，称“三管领”。其下设侍所司警卫、政所司财政、

问注司文书、评定众和引付方司诉讼。

不过足利幕府比起镰仓幕府来说，那明显的是个花架子。

因为与元军战争之后，镰仓幕府已经不能再赏赐土地给武士，而日本现有的土地是极为有限的。到了室町幕府，连将军自己直辖的领地都非常狭小，直属军事力量就更小了。

瘦弱的中央集团，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因此，那些统治各国的大名，从中央既不能得到财富也不能得到权威，因此不再服从中央的统治。到16世纪中叶，一些地方领主与武士已经发展成为控制一方的战国大名，著名的有甲斐的武田信玄、三河的德川家康、尾张的织田信长等。

其中织田信长所处的尾张国，在本州地区很有战略意义的位置。织田信长以此为基础，开始了自己的霸业。过程不必详述，总之在织田信长死的时候，他已经控制了三分之二的日本。

织田信长死在自己的家臣明智光秀手中，我们将要说的细川玉子，就是明智光秀的女儿。

明智玉子是日本古代三大美女之一，当然究竟有多美，我们是看不到了。

她的婚姻，毫无疑问是政治联姻。明智光秀将她嫁与和朝廷与各路大名都关系良好的细川家大公子细川忠兴，因此，明智玉子又称细川玉子。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个门当户对的婚姻，但遗憾的是，在政治风云诡谲多变的战国时代，细川玉子的婆家和娘家都是要站队的，一旦站错了，面临的的就是灭顶之灾。

细川家就是个会站队的。

因为传说中遭受了织田信长的不公正待遇，玉子的父亲明智光秀发动了“本能寺之变”，迫使织田信长自杀。明智光秀本来指望自己的亲家能够帮自己的忙，但细川家却很看好丰臣秀吉，于是就把明智家甩到一边去了。

明智光秀的举动，就是叛乱，在本能寺之战后的一场战役中，他也兵败身亡。

按照当时的规则，作为叛贼女儿的细川玉子，也是要被杀的。但是，她还是有个好老公的。她老公舍不得杀她，于是就把她藏到深山里去了。

细川玉子就这么孤独地住在深山里了。家族的失败、父亲的死亡让她深夜难以入眠，无法从悲伤中解脱出来，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哪里。她对人生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这个时候，一缕阳光在她头顶出现了，这就是基督教。

当年的细节已经无法考证了。1584年，丰臣秀吉对细川玉子下了赦令。细川忠兴激动万分地跑去把老婆接回来了。

不过他没有想到自己接回来的，是受了“主”洗礼的老婆，彼时的细川玉子，还有一个教名，叫做“ガラシャ”，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恩宠”。

但战国的“大名”们，对宗教一向是从不手下留情的。他们一方面打击世俗的敌人，一方面对僧人和基督徒也非常不客气。织田信长活着的时候，僧侣们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在攻占了京都之后，比睿的和尚们就成了他的眼中钉。在日本历史上，僧兵的力量一直是不可小觑的。他们甚至比武士们还要最先喜欢使用武力。织田信长为了消除寺庙中尚武的气息，下令烧了不少寺庙，寺庙里的僧人，遭到了大规模

的屠杀，甚至那些住在寺庙附近的无辜平民，尤其是平时喜欢烧香拜佛的人，也被一块儿拉过来杀了。最多的一次，他直接杀掉平民和尚一共1 600人。为了摧毁佛教，他甚至向当时更为异类的基督教表示了容忍和一定的好感。

但这并不能改变基督教的命运。因为丰臣秀吉是非常讨厌基督教的。丰臣秀吉对基督教宣称的“人人平等”相当反感并且正在严加控制，因此细川忠兴在得知妻子信奉基督教后勃然大怒，一度拿着刀逼她放弃信仰，夫妻的关系也一度恶化到了最低点。

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东西方对于世界的想法的不同。

丰臣秀吉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在织田信长死后，接替了他的政权——这也说明细川家独特而精准的政治眼光了。

丰臣秀吉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几乎是征服了德川家康之外所有的地方大名，但是他的血统实在是太低贱了，不能担任“关白”的职位。直到1585年，他万般无奈地封自己为藤原氏的养子，这才获得了“关白”的职位。

在之前两百余年，隔海的中国，也是一个农民的朱元璋，发动了起义，将蒙古人赶出了中国，从蒙古铁蹄下解放的欧洲，开始了向亚洲进行宗教输出和开拓贸易的过程。

而丰臣秀吉脑海中想的，却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想的事情——征服世界。



丰臣秀吉像（图片来自：新华网）

他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的同时，逐渐压制了沿海的海盗势力。他修建了两座城市，其中一座就是今天的大阪，大阪从那时起就成为日本贸易的中心。

但丰臣秀吉发展海外贸易的目的，还是为了他环球扩张的梦想。而在同一时期前后，欧洲的旅行家和航海家以及传教士们，正在通过航海了解世界，正在用宗教征服世界。这个结果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今天所穿的衣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建筑、文化都移植了西方太多的东西。

在马可波罗之后，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有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南亚和东亚地区，他们的记述弥补了马可波罗的很多不足。他们活动的地区在亚洲的东南亚、朝

鲜和日本。他们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去了解亚洲，并将亚洲的信息传向世界，比如中国人爱喝茶、妇女们居然缠足等。

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在社会动荡的同时，仍然沉浸在自我的中心观之中。中国在把蒙古人赶出中国之后，又开始了一个与以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突破的封建王朝明朝。而丰臣秀吉的脑海中，则在规划一幅日本的地图。这幅地图包括菲律宾、朝鲜、中国、印度。在16世纪90年代，他居然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下令”，让菲律宾向日本臣服，不过人家没有理睬他。他还制订了一个征服中国的计划，他梦想征服中国之后，也像在日本那样，将占领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家臣和部下。征服中国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征服印度。可怜的丰臣秀吉当时知道的世界可能就是亚洲的概念，如果他知道世界上还有美洲和非洲，估计也将美洲和非洲列入自己的征服计划中去了。

丰臣秀吉的思想是简单的，因此他不会去管基督教的这些传教士会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他也来不及思索这件事情了。

第二节 耶稣会与基督教在日本的最初成功

细川玉子的坎坷经历，部分符合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坎坷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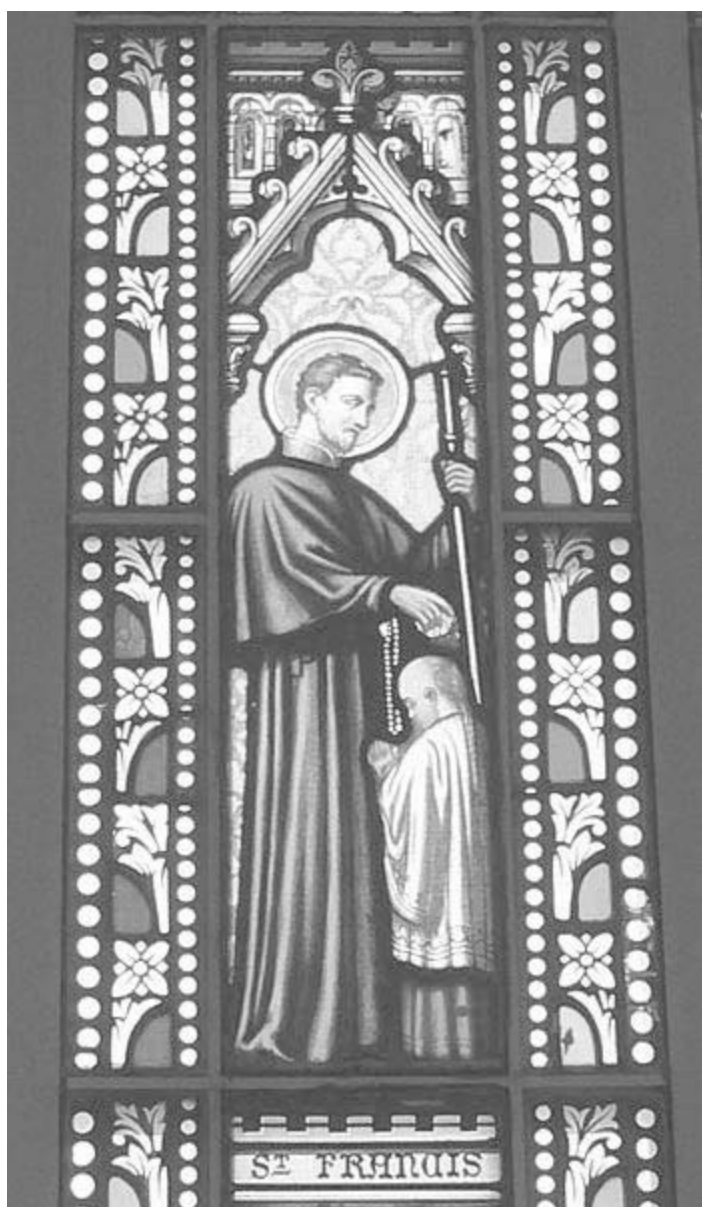
最早登上日本土地的欧洲人，是1543年在日本海附近船只失事的西班牙人。在1549年，一位名为圣弗朗西斯·沙维尔（一般称为方济各·沙勿略，后文统一为沙勿略）的耶稣会传教士，登上了日本的九州岛。这是到达日本土地的第一个传教士。也有人说，最早登上日本土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是耶稣会的创始人。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又称“耶稣连队”，1534年8月15日由西班牙伊

纳爵·罗耀拉为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成立，获得罗马教廷教宗的许可。耶稣会最主要的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它在欧洲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兴办了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是耶稣会人才外，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分子阶级，著名的如笛卡儿。

耶稣会在亚洲的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

那些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包括：耶稣会的创始人方济各·沙勿略，随后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到雍正时期的郎世宁、蒋友仁以及到晚清蜂拥而来的各路传教士。他们一边传教一边传播西方文化，并且对中国的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幅圣方济各·沙勿略为华人施洗的彩玻璃窗摄于香港伯大尼修院（作者：Isaac Wong）

沙勿略到日本的时候，也是很受欢迎的。彼时的天主教神父，基本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温文尔雅，有良好的教养和礼貌，同样受到了讲礼貌的日本人的欢迎。

方济各·沙勿略出生于西班牙北部纳瓦拉王国的一个中等贵族家庭。1524年纳瓦拉王国卷入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法国战败，支持法国的纳瓦拉王国也因此不复存在。1534年，沙勿略与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一起创立了耶稣会。因为他们属于被征服者，所以这个教会最初没有受到西班牙的重视，他们从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那里接受了到印度传教的任务。在印度的工作结束之后，沙勿略从马六甲到香料群岛传教。在1547年回到马六甲时，遇到了因犯杀人罪逃到马六甲的萨摩武士弥次郎。就是这个萨摩武士，使得沙勿略产生了想去日本传教的想法，于是，他将弥次郎送到印度的果阿接受宗教教育。弥次郎后来受洗，教名为保罗，是日本最早的基督徒。

1549年，沙勿略与两名同事，经马六甲海峡，辗转来到弥次郎的家乡——日本南部九州的鹿儿岛。鹿儿岛在镰仓幕府的时候被划给岛津氏管辖，一直持续到近代。这个时候日本的统治者还是织田信长。

在鹿儿岛，沙勿略一行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友好对待。鹿儿岛自古就是日本的南大门，在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岛津氏为了维护贸易的顺畅，对待外国人都非常友好，因此，准许沙勿略在鹿儿岛传教。沙勿略的传教工作做得还是非常成功的，到年底就发展了二百多人入教。沙勿略也很喜欢日本人，他曾在发回欧洲的报告里写，在他遇到的各国人当中，日本人是最好的。传教士们非常有感于日本民族各种优秀的地方：谦恭、自尊、忍耐、节俭、沉稳、勤劳、睿智，有良好的修养，讲礼貌；他们也批评日本生活中看起来很不可理解的地方：行为有时候会让人觉得

做作，仆人对主人不忠、模棱两可，做事情缺乏公开性、好斗、虐待俘虏等；更有甚者，日本人爱洗澡的行为让这些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觉得不解的同时又深感自卑，即使在欧洲大陆，僧侣们也不是那么讲究卫生，提到僧侣就会想到虱子。

不过耶稣会士们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喜人的，到1551年，已经有不少大名开始信仰天主教，尽管他们信教的目的可能有些复杂。

如同佛教最初传入时的波折一样，基督教传入的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日本人一开始还以为基督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呢，于是纷纷前来听传教士们的宣讲，回过味来之后，佛教徒们开始表示不满，岛津氏也觉得不妥，于是就不让沙勿略再传教了。

1550年，沙勿略试图到达京都，但因为应仁之乱，他明白天皇只不过是个空架子，于次年辗转来到山口。山口是大内义隆的领地，人口有4万，非常繁荣，并且这里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主要地方。沙勿略在拜见大内义隆的时候，递交了果阿的印度总督和主教的信，并给他送了很多西洋玩意，比如钟表、铁炮、绸缎、眼镜、玻璃器皿等。在16世纪的时候，日本还是相当闭塞的，人们对西方有着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在看到沙勿略是如此谦卑友好之后，大内义隆准许他进行传教事业。沙勿略在2个月内就发展了500多名信徒，最后连大内义隆也成为信徒。很快，山口和府内一带便成为日本天主教传播的一大中心。

1551年，沙勿略乘船离开日本，1552年，他病死在广东上川岛。

沙勿略之后的传教士们，也开始专攻日本的权力阶层。因为一旦这些贵族阶层接受了天主教，他们会向其下属和臣民们强制推行天主教。这种方法，显然是一本万利的。

大名们加入天主教的动机，那是五花八门了：一是为了促进贸易，因为当时传教士

们是日本和西方贸易的中介；二是为了获得武器；三是为了获得上帝的保佑，保佑庄稼丰收以及战斗的胜利；同时，如果领主入会的话，领地的农民也入会，这个领地的一致性就很容易保持。在战国时代的日本，地方大名和中央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有些大名会通过信仰基督教来表示自己和中央的不一致，显示自己的独立自主。

肥前的大名大村纯忠，为了吸引葡萄牙人到他的领地做生意，成为第一个受洗的天主教大名。之后他还将长崎干脆就封给耶稣会士做领地了，不过附带的条件是所有入港的船只都要给他交税。鹿儿岛的大名岛津贵久，因为最初比较恐惧天主教，在接纳沙勿略后又出尔反尔地禁止他传教，并因此丢掉了与葡萄牙人的贸易。其后不得不向葡萄牙总督表示忏悔，保证不再为难天主教，以让葡萄牙的船只重新回到自己的领地。

到16世纪后期，基督徒在日本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但是有关贸易方面与日本的权力斗争太过息息相关了，以致后来耶稣会士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日本的争斗之中，并且付出了血的代价。

1551年，山口领主大内义隆和丰后领主大友义镇都宣布天主教传教自由。此后几十年间，日本皈依天主教的人数直线上升，九州和京都与东京一带奉教的人最多，总共达30万。

同时，传教士们的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

沙勿略在登上日本土地两个多月的时候，就想设立一座商馆。到年底，他甚至有了一个详细的规划。在给同行的信里，他甚至罗列出了一些估计会畅销的货物清单。

传教士们想做生意，一个很直白的原因，就是传教的经费。传教无疑需要大量经

费，这由耶稣会通过各种途径来筹集。当时耶稣会士的经费，“由葡萄牙、西班牙国王支付的年度经费，罗马教皇支付的年度经费，在印度、马六甲、澳门、日本拥有的不动产的收入，以及耶稣会成员主要在澳门和日本之间进行贸易的收入等几部分构成”。

看似来源挺多，不过官方能给的经费实在是非常有限，因此，勤奋的传教士们还得自给自足，通过做买卖来弥补几乎三分之二的不足。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钱，在陌生的土地上，传教士们是很难维持下去的。而且，他们把赚钱和传教看得同样重要，认为其都是对葡萄牙国王的忠诚。

随着耶稣会士在日本发展的教徒越来越多，所需要的费用也越来越庞大。在1566年，一个耶稣会士在日本，即使过的生活相当简单，也要花掉不少葡萄牙货币，这个数字在十年之后，几乎翻了十倍。

因此，通过贸易来赚钱非常重要。1571年，传教士们开始正式介入到与日本的贸易中来。他们和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们一起，从中国购买货物，运到日本进行贩卖，其利润相当可观。在见识到利润之后，耶稣会士们更加热衷贸易了。日本人将他们称为“南蛮”。

“葡萄牙商人以澳门为据点，把中国产的生丝运到日本的长崎，与日本银行进行交易，牟取暴利。因为葡萄牙人掌握了生丝的分配和定价权，所以在南蛮贸易中，葡萄牙人获得的暴利往往是投资额的5~10倍。这种利益分配中的垄断地位直到17世纪初荷兰人到日本后才逐渐被削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耶稣会只经营生丝。后来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生丝，还经营各种绢织品、锦织品、金、铅、水银、陶器、麝香、琥珀等。”

这种贸易，符合了日本、葡萄牙、西班牙以及罗马教皇的利益，因此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和罗马教皇都希望通过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以葡萄牙船只的入港地为中心营造一个基督徒的小社会，借助这股力量顺利地推进贸易活动。因此葡、西两国和罗马教皇都默许了日本耶稣会的所作所为，并给予强有力的保护。而且，对日本耶稣会来说，保住葡、西两国强大的经济圈，并不断地强化它，无疑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也有利。”

织田信长利用这种贸易获得利润和武器，丰臣秀吉同样也利用这种贸易获利，因而对待传教士和加入传教士的大名与平民们，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织田信长时代，耶稣会士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

织田信长，是个无神论者。即使他是有神论者的话，他也认为日本唯一的神就是他自己。但是，早在1659年，织田信长就给耶稣会的神父们颁发了传教许可证，神父们可以居住在京都，并且不交任何税收。1573年的时候，他还招传教士到京都，给他们一块土地兴建“南蛮寺”。

织田信长对基督教表现出来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平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方面，九州不是他的辖地，因此他对基督教的高潮并不在意，另一方面，他需要贸易带来的军需物资。葡萄牙人来到日本以后，带来了先进的火器，比如说毛瑟枪之类的玩意。织田信长对这东西很感兴趣，于是派人买了不少装备自己的军队，他算得上是比较早在军队中配置西洋火器的人了。织田信长花了不少力气培训武士们使用毛瑟枪，因此在1575年的长筱之战中，他取得了胜利。

但织田信长表示对基督教的彻底包容，还是在耶稣会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范礼安来

拜见的时候转变的。

1579年耶稣会派遣巡察师范礼安来日本领导传教事业，并在1581年拜见了织田信长。织田信长很快成为耶稣会士的朋友，他很乐意听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讲述海外的奇闻，也对耶稣会士的与众不同感兴趣。

范礼安是沙勿略之后耶稣会士的又一个顶梁柱。他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他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

为了见织田信长，范礼安精心准备了他的京都之行。1581年3月19日，范礼安与他的40名同伴，外加35头驮着各色礼品的骡子、40匹驮着行李的马，浩浩荡荡地奔往京城了。

可想而知，这样的队伍会在沿途引起什么样的轰动：日本民众放下田间地头的活，纷纷跑来围观，东西方人外在以及行为的差异，让日本人觉得很好奇，高大的传教士，里边间或穿插一些黑皮肤的仆人，有秩序地走在街头。而那些基督徒则更为兴奋地表示欢迎。范礼安访问了他所经过的地方，并在3月26日到达了京都。3月27日，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范礼安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织田信长的府邸请求安排会面。3月29日，在南蛮寺附近的本能寺，范礼安与织田信长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面。这次会面效果很好，范礼安把他带来的各种油画、祭祀图像、乐器、书籍一一送给织田信长。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范礼安的礼物毫无疑问打动了织田信长。礼物中包括不少在西班牙贵族中流行的东西：镀金的烛台、天鹅绒织物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一把镶着金

边的天鹅绒椅子。这把椅子做工精致，让坐上去的人显得无比的尊贵有权威。在不久之后的一个庆典上，织田信长特意展示了这把椅子，四名壮汉抬着这把椅子，走过庆典。

获得外来的尊重，在传统的中国和传统的日本，几乎是一样的。这把椅子显然带给织田信长不少自信，这种来自外邦的礼物，不会仅仅是礼物，它与织田信长的地位是匹配的。凡是能够加强自身以及自己国家权威的东西，几乎是没有人会放弃的。

范礼安显然懂得如何与日本的上层打交道。除了拜访织田信长以外，他还拜访了跟织田信长关系密切的人，如织田信长的儿子，以及各位高级官员。每次拜访，范礼安都会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带上各种各样的礼物。这些礼物，在日本人看来都是奇异精巧的。很快，范礼安就赢得了这些达官贵族的好感。

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注意避免拜访那些织田信长所不喜欢的人，这些人就包括天皇本人。

范礼安的努力取得了非常积极的结果。织田信长向教会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友好：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他的王国各处传播福音。织田信长的三个儿子，都成了范礼安的好朋友。耶稣会的神父们获得了建立教堂的地方，甚至还得到了资助。京都的贵族们还经常去修道院拜访神父。贵族们对传教士和教会表现出了空前的关注——这种结果所带来的价值对于传教士们来说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范礼安可以说是赢得了织田信长的绝对信任。在范礼安离去的时候，织田信长送给他一个自己非常珍爱、异常贵重的礼物——描画日本京都生活场景的屏风。据说这块屏风是天皇想得都得不到的。这块屏风几乎成了范礼安的“尚方宝剑”，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喜欢在公共场合展示它一下，以满足那些专程前来观赏的人。

当然，织田信长从传教士那里得到的回报也很多。前面提到的毛瑟枪，它的存在无疑加速了日本统一的进程。织田信长还利用传教士去打不流血的仗，尤其是对付那些佛教军事力量。佛教团体一向宗在各地与织田信长的武装对抗了10年之久，搞得织田信长很是头疼。搞定这些力量，也是他与天主教结盟的重要原因之一。1578年，为了胁迫一个基督教的大名臣服，织田信长派出传教士去劝降，表示如果该大名拒绝投降，那么，他就把所有的天主教徒处以极刑，于是这个大名就乖乖投降了。

可以说，织田信长把天主教徒们利用得淋漓尽致了。不过，耶稣会士们也获得了很多好处。

在获取了织田信长友好的态度之后，范礼安的工作就非常好做了。他制定了规范的传教的制度——《日本布教规定》，把日本分为京都、丰后、长崎三个教区，包括京都、东山、东海、山阴、山阳、北陆、南海几个道。他非常重视欧洲传教士的语言学习，并在当地设立教育机构，培养日本本土传教士。到1583年，日本各地有教堂近200所，分驻所20多个，信徒也逐年增加，1570年为两三万人，1582年15万人。1590年20万至24万人，1600年达30万人。信徒包括大名、武士、商人、农民、渔民等广大阶层，耶稣会士在日本几乎是迎来了黄金时代。

丰臣秀吉和织田信长的态度就不大一样了。他一方面需要和传教士们保持起码的和平，另一方面又看不惯传教士们宣传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因此，一旦不需要传教士，他马上翻脸不认人。

传教士们所做的一切，都朝着一个指向：尽最大可能的，在日本站住脚。

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传教士这边，那些来自欧洲的水手、水兵和传教士之间的意见

不合、目的不同，又加上16世纪末日本德川幕府诸将军极欲统一日本，对不服从中央的诸侯大加讨伐，那些倾向或选择天主教的诸侯和他们的臣民更是幕府将军征讨的对象，何况天主教在日本的发展已经引起佛教和神道教的不满与反对。就这样，日本天主教的教难成了预料中的事。然而，耶稣会士们还是非常渴望来自日本上层的支持的。

丰臣秀吉本人也不太喜欢佛教的清规戒律，他希望发展海外贸易，对外来事物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好奇心。他喜欢穿葡萄牙人的衣服，也喜欢拿一本基督教的经典来装饰自己的案头，他还非常欣赏基督教推行的一夫一妻制。但是对这种外来宗教，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戒心。

当耶稣会士们觉得基督教似乎已经在日本站稳脚跟的时候，丰臣秀吉却忽然打朝鲜去了，他压根就没有重视过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相反，朝鲜失败归来的丰臣秀吉，和基督徒们翻了脸，疯狂迫害和屠杀教徒们，这个我们后文将会叙述。

第三节 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

丰臣秀吉的世界规划中，唯一付诸实际行动的就是侵略朝鲜。这一行动，引发了中国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这在东亚国际关系上，也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丰臣秀吉的胃口很大，他想吞下的不是朝鲜这种弹丸之地，而是想借着朝鲜这块地方，去攻打中国，以圆自己的环球征服野心。

至于他为啥选择在这个时候攻打朝鲜，也是有很多理由的。

首先，之所以选在1592年进行，有个传闻就是，他最心爱的小儿子在1591年不幸夭折了，他伤心欲绝，无法排解，想借助战争的忙碌去忘掉丧子之痛。

其次，丰臣秀吉为着征服世界这种事情，已经策划了很多年，也已经准备了很多年。在最初他之所以容忍传教士们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要建造能够渡海的船，或者直接从葡萄牙人手中买船。准备了这么多年，搞得尽人皆知，不打的话，一方面不能树立自己的威名，另一方面半途而废有点说不过去。

此外，在丰臣秀吉的内战中，不少武士和大名失去了土地，变得超级没有安全感，纷纷对政权不满。有些大名干脆就觊觎起中国的土地来了。有个叫龟井兹矩的大名，梦想得到中国浙江的台州，于是跑到丰臣秀吉那里表达自己的愿望，丰臣秀吉居然答应了。于是，龟井兹矩就以“台州守”自居起来了。这里得佩服日本人超强的意淫能力，当时像龟井兹矩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在没有踏上对方土地之前，居然在私下里就把中国给瓜分掉了，这是一种何等了得的自娱自乐精神啊！至于那些好利的商人就更不用说了。博多和长崎等地的大商人们很早就积极参加侵朝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真打起来的时候也跟着军队一起行动，发战争财。有些商人没打仗之前甚至借着经商的名头跑去朝鲜兴致勃勃地当起间谍来了，简直是精神可嘉。

有这样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臣民，丰臣秀吉决定出兵了。

1591年6月，他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他有意于1592年春天假道朝鲜进攻中国，并请多多包涵与协助。这封信写得冠冕堂皇。在信中，丰臣秀吉对朝鲜国王说：我想借贵地用一下，越过大海，翻过山岭，一路攻向中国，以便我们的风俗和文化传播到中国，这样才能使一种“王政”屹立千年而不倒——这是一种何等的自信啊。不过朝鲜国王当然不是傻子，一看是拿自己当炮灰的，于是就拒绝了。当时的朝鲜，是个比较重文轻武的国家，况且一贯处在中国的保护之下，所以自己的防范和军备都做得不怎么样，全国三百多个郡县几乎都是无防备状态。

但丰臣秀吉来了，朝鲜被迫应战了。

1592年3月，丰臣秀吉调集了15万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往朝鲜去了。

他本人当然是不用去的，去的都是他的家臣和部下，以及地方的大名们。这些部队在宇喜多秀家的指挥下，渡海作战。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政宗等，则将他们旗下的军队集结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共十万五千人。

在战略上，丰臣秀吉采用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

这种策略还是比较有效的，日军登陆朝鲜之后，虽然遭遇了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朝鲜的王都汉城，不久又攻陷了平壤。

陆军算是比较顺利，海军那边则遇到了强敌——李舜臣。李是朝鲜一个优秀的海军将领，在日军来袭之前，他作了很多准备：整顿水军、改良舰船。在改良舰船这方面，效果非常显著。他改造的“龟船”，以全副武装、形似龟甲而著称。这种船长10余丈，宽1丈多，船身及上面的“龟壳”用硬木制作，包上铁板，非常结实。船的两侧各有10面船桨，战斗时一齐划动，航行飞快，进退自如。

在与日军交手后，日本水军简直拿这个龟船没有办法。所以，在接下来两个月的战斗中，日军始终无法取得制海权。而这个时候，作为朝鲜保护国的中国也出动了军队。战争进行到1593年，日本人就打不下去了。这场战争就这样不了了之。

时间到了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组织了一支14万人的军队攻打朝鲜，这一次，又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对于朝鲜来说，幸运的是，丰臣秀吉在第二年死去了，于是日本远征朝鲜和中国的计划就此搁浅，正在打仗的日军在得到消息之后就迅速撤离了。

明王朝在参加了这场战争之后迅速衰落，朝鲜作为主要的战场，所遭受的蹂躏更是巨大：日本人在这里烧杀抢掠，中国的士兵表现也不怎么样。在第二次入侵朝鲜的战争中，日军对那些遇到自己不退回民宅的朝鲜民众几乎是格杀勿论，也不放过带着老弱妇孺的朝鲜官员。日军尽可能地搜刮战利品，运回丰臣秀吉的府邸。这些战利品中有非常残忍的东西：装满朝鲜士兵鼻子的大木桶。日军为了争取战功，将战死的朝鲜军人的鼻子、耳朵割下，用盐醋防腐寄回日本给丰臣秀吉，很多无辜的老弱妇孺都受到残害。这些鼻子与耳朵埋葬在京都方广寺大佛的西侧，今日则称为“鼻冢”。军官们获得敌人鼻子的数量则成为日后升迁的一个标准。

丰臣秀吉的军队除了杀害朝鲜军民之外，还强迫数万朝鲜俘虏到日本耕作。大量的陶艺、印刷、刺绣等师匠到日本来，使得日本的陶艺水准大举提高。陶活字的传来，更带动了日后江户时代的出版风潮。

对于日本来说，除了丰臣秀吉，一般人都会觉得这场战争莫名其妙。为了进行战争，丰臣秀吉所编军队达到30万之多。每个部队都包括战斗的武士和为其服务的随从。这些随从，大都是临时征集的青壮年劳力，多数是农民和渔民。在短短几年内，有二十多万农民青壮年被送往侵略战场，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外面打得热闹，国内也一点不消停。因为严厉的税收制度和过重的赋税，不少地方都发生了农民起义，有人祸的时候，天灾也来凑热闹，地方时不时地发生水灾或者旱灾。

最受影响的还是丰臣家的地位了。丰臣秀吉临死的时候，让自己的下属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丰臣秀赖。不过树倒猢猻散，他死后，各个大名又燃起了对权力追求的熊熊热火。德川家康成为最后的赢家，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战胜了各方诸侯，在获取了一个源氏的身份之后，他于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

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幕。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德川秀忠，宣布家天下，自称大御所并隐居骏府城，但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德川家康灭掉丰臣秀赖，随后一年改元元和，从此日本再无大战事。

第四节 日本与欧洲第一次失之交臂

如果织田信长活着，日本的现在或许会有更大的改变。

他的继任者丰臣秀吉，对基督教是非常不客气的。他不喜欢自己的部属信仰基督教，所以细川玉子的老公拿着刀去逼迫自己的妻子不要再信仰基督教。

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统治者，在即位之初，他延续了织田信长的政策，对待基督传教士们和信徒都还说过得去。因为他这个时候要紧的事情还是统一日本，所以在16世纪90年代之前，他没有对基督徒们采取任何措施，耶稣会士的活动还得以照常进行。甚至在一部分基督徒参观大阪的时候，他还亲自带他们去。

丰臣秀吉对天主教态度的转变是非常突然的，1587年7月24日，丰臣秀吉突然连夜两次派人到日本天主教区区长科埃里那里，送去措辞严厉的“诘问状”，内容如下：传教士为何强制他人信教？破坏神社、佛寺，迫害僧侣的理由何在？为何食用有用的牛马？葡萄牙人将许多日本人贩做奴隶的理由何在？

科埃里对这件事情非常惊恐，只好陈述自己的理由。在他还没有缓过神的时候，丰臣秀吉便于第二天发布了《伴天连追放令》，其内容包括：日本是一个神国，天主教本身是邪恶的，这种邪法不能够在日本传播；令诸国人民归顺，捣毁神社和佛寺，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神父们认为可用其知识自由地获得信奉者，所以才如此

有恃无恐，这是日本坚决不能容忍的。因此，天主教的神父们不能留在日本的土地上，必须在20天内打点行装回国。不过在此期间，如果有人危害神父，也是不允许的；葡萄牙的船只是为贸易而来，可以另当别论，今后也可以保持长年的贸易；凡是不反对佛法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人，都可于天主教国中自由往来。

不过后来因海运问题，传教士20天内无法离开日本，丰臣秀吉便命其全部集中到平户地区等待离开。传教士为避免与丰臣秀吉正面冲突，始由公开转入地下，进行隐匿的传教活动。

至此，天主教在日本自由传教的日子结束了，天主教在日传教活动完全被丰臣秀吉所控制。

真正的令人发指的血案发生在1597年2月。这件事情的诱因是1596年的“圣·费利浦号事件”。圣·费利浦号是一艘西班牙商船，因遇风浪漂流到日本。当时的船长在与丰臣秀吉的部下增田长盛交谈时，于地图上指示出西班牙拥有的广大领土。当问及如何得到这些领土时，船长答曰：先派传教士使其国民成为教徒，然后派遣军队与信徒里应外合，征服该国。这些西班牙人没想到他们的一次炫耀，导致了一场血案。在听说这种事情后，原先对天主教异常防备的丰臣秀吉大怒，逮捕了8名圣方济会的传教士和26名信徒，残忍地将他们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也是后来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家康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前兆。

关于丰臣秀吉反对基督教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是这样向西班牙总督解释的：他不能允许国外的传教士们在日本的土地上传播外国的信条，这就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不会也不可能允许神道教或者佛教僧人在他们的土地上四处传教一样。

随后，日本的基督教传教转入低潮。在拒绝了西方的文化之后，德川的江户幕府，

甚至拒绝了同西方的贸易。

在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误解和恐惧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引发事件是必然的。

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明显是非常世俗的：他们需要葡萄牙人带来的各种器物以及先进的武器，却不愿意看到基督教对日本社会的改变。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德川家康需要一个更加巩固的方式来将他的政权世代传承下去。为此，德川家康作了很多努力。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继任者顺利地进行权力交接，德川家康甚至在自己担任幕府将军的第二年，就把将军的职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德川秀忠了。自己退居幕后，一直到死前都确保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幕府的权力。

所有的大名都是将军的附属，大名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和效忠将军。德川家康要求他们用庄严的誓词来宣布自己效忠将军。一旦大名的人选有所改变，那么这个大名得写血书来表示自己的忠心。德川家康根据效忠的程度将大名们分了好几类，那些自己特别信任的，特别是一直追随自己的家臣们，称做“内藩”，那些自己的直系亲属，称做“亲藩”。最不受信任的大名，则是以前丰臣秀吉的家臣和部属们，他们被称做“外藩”。



德川家康像（图片来自：互动百科）

德川家康将内藩大名（也称“谱代”）都分封在战略要地，他们控制了关东、日本中部以及东京和大阪一带的重要地区，外藩大名们则被分封到比较偏远的地区。为了防止地方大名势力扩张到自己难以容忍的程度，德川家康规定这些大名只能拥有一座城堡，这座城堡有任何变比，比如说要修缮的话，都得通报将军。这些大名的武装数量也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不允许建造船只。所有大名的婚嫁状况也要通报幕府，由幕府来定夺。

17世纪的时候，德川家康对大名们的折腾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许多大名被任意调动和迁徙。在调动的过程中，德川家康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某些大名力量削弱了，某些大名力量加强了。大名们被要求轮流住在自己的领地和江户，一旦在自己的领地居住，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必须留在江户作为人质。幕府没收了不少认为不合格的大名的领地，直接控制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多，那些没有后代的大名的土地，幕府也直接没收。这样德川幕府的直接领地很快就较之以前扩大了三倍。

反观基督教的信仰，和德川家康心中所恐惧的东西，在一个方向上。

基督教信仰与日本的封建伦理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机。

按基督教的要求，一个人要敬奉上帝，这种敬奉要超越所有世俗的东西：你的父母、你的君主甚至你的上司。这对儒学流行的日本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臣下必须要忠于主君，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这种忠诚是必须的、无条件的。但信奉天主教的武士们却不这么干，他们把上帝放在了主上的前面——这对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来说，都是很大的威胁。

九州地区的大名高山右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信仰极为坚定。高山右近本来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在“本能寺之变”后，成为丰臣秀吉家臣。他在击败明智光秀的山崎合战以及后来的几次合战中，都出了很多力。丰臣秀吉也很重视这名家臣，给了他很多的封赏。但高山右近所居住的九州，是基督教非常兴盛的地方，他也很快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本人也很富有人格魅力，他要好的朋友和下属，在他的影响下也纷纷改信了基督教。其中著名的包括小西行长、牧村正春、蒲生氏乡、黑田孝高等，以及明智光秀的女儿——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描述到的细川忠兴的妻子细川玉子。虽然玉子的丈夫没有改信，但是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不再反对了。

丰臣秀吉在征服九州地区之后，就要求高山右近不再信教。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要在征服之后显示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要确定这些大名绝对地服从自己。丰臣秀吉认为高山右近会理所当然地答应自己的要求。但事实恰好相反，他回答丰臣秀吉说，你就是把全世界都送给我来换取我的灵魂，那也是不可能的。丰臣秀吉大怒，自此对基督教另眼相看了，不久就对传教士发布了驱逐令。

高山右近是非常执著的，他甚至将自己从丰臣秀吉那里得到的封地，如数送还。丰臣秀吉最后放逐了高山右近。在德川家康时代，高山右近还自己出钱在金泽建造教堂，而且宣教不懈，包括前田家近臣30人在内的170人受洗。1614年，德川家康全面禁止基督教。高山右近被流放到国外，1615年，他客死于马尼拉。

除了威胁到日本传统的权力秩序之外，基督教也对日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不少影响。当时的日本妇女，地位是非常低下的。在大河剧当中，经常可以看到贵族家的女子也不得不给别人做侍妾。基督教所倡导的一夫一妻制，也在动摇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以及男性的权威。妇女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父权和夫权的挑战，也造成了统治者们对基督教的反感。

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为了贸易利益的缘故，暂时容忍了一段传教士和基督徒们。传教士们利用这个空隙，努力发展教徒。到1606年，基督徒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德川家康不能容忍的地步。同年，德川家康正式宣布基督教是一种非法宗教。一场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开始了。

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次历时长久、非常残酷的严冬。

1614年，德川家康再次命令所有的传教士离开日本，并发布命令，宣称基督教的信条是有害的，只会教唆自己的子民怀疑神道教，反对正统，进而道德品质败坏。

在德川家康发布这道命令之后，传教士们最初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只是把传教活动从地上转入地下。面对这种情况，德川家康暴怒异常，于是对基督徒们发起了一场空前的迫害。

这场迫害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为了让基督徒们放弃信仰，幕府用尽了各种残酷的手段。最令人不堪的就是将一个基督徒倒着吊起来，将他的头部浸入地上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这个坑中填满的是肮脏的粪便。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耸人听闻的酷刑被滥用：面部烙印、吊打熏烤、切断手指、裸身游街等。到这场迫害平息的日子，有三千多人被梵蒂冈追认为殉教者，更有不计其数的平民基督徒们失去了生命。

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幕府为了证明其不合法也进行了诸多的质疑：上帝创造世界，看起来是非常荒诞不经的事情；上帝是全能的话或者上帝是善良的，那么为什么要派一条蛇去诱惑亚当和夏娃呢？又如何解释那些不是基督徒，但品德高尚却仍然受苦的人呢？如果按照基督教的标准，任何不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要下地狱的，难道那些古代的圣君现在也在地狱里吗？

不可否认，幕府的质疑也不无道理。而究竟哪种宗教会在某个社会形态中站住脚，依靠的仍然几乎是世俗的权力。德川家康是打定主意不再给基督教提供土壤了。

这场残酷的镇压，最终导致了1637年岛原基督徒们的暴力反抗。

岛原地区原来的大名为有马晴信和小西行长，其中后者与虔诚的九州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关系很好。因此，岛原成为幕府打击基督教的重点地区。幕府先是调任了一位新的大名到此地。不幸的是岛原此时的年景和收成都不大好，而新来的大名并没有要减税的意思，税反而比原来更多了。于是，岛原的民众被迫揭竿而起。这些义

军大都是基督徒，他们脖子上挂着上帝的圣像，旗帜上绘有十字架，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支起义军迅速扩大，幕府不得不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这次起义终究被幕府镇压下去了。在德川幕府的高压政策下，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以后也持续着：那些以前是基督徒，现在表示不再信仰基督教的时候，也要发一个反对基督教的誓言。为了节省审问的时间，幕府采取了一项粗暴又直接的手段：将十字架扔在地上，让居民们一个一个踩过去，很小的孩子也要在母亲的帮助下踩过，以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直到17世纪末期，幕府才对禁教的成果比较满意。

这些措施基本上消灭了日本所有的基督教组织，以家庭为单位，日本每个人几乎都要寄名于佛教寺庙，户主们每年都要宣誓，保证自己的家庭成员中没有基督徒。基督徒近乎绝迹，直到明治维新之后，基督徒们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对德川幕府来说，具有威胁和挑战的，不仅仅是基督教，所有具有外来影响的东西，都是具有颠覆性的，这其中也毫无疑问地包括对外贸易。

在基督教繁荣的年份，长崎曾经取代了当时的澳门和马尼拉，成为东方的“罗马”。不过，幕府的认知是，对外贸易不是坏事，但是对幕府不是好事，它的最终受益者是长崎和九州地区，一旦这些地方大名强大，那么对中央来说绝对不是件好的事情。因此，幕府就开始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最先受不了的是英国人，他们在1624年就主动撤退了。西班牙人也被幕府赶回老家去了。

在岛原之乱后，幕府怀疑这些事情与西方的传教士有关，于是对对外贸易的禁令越来越严格。幕府将军的继任者，将对基督徒的驱逐和迫害扩大到全体欧洲人。

整个17世纪，幕府一共发布了五道禁令，禁止日本与西方的贸易，特别是那些基督教国家。1639年，幕府明确规定：葡萄牙人的商船不准到日本来，如果来的话，就

砸坏他们的船只，杀掉他们的船员。

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对于本国的限制更是严格：日本的港口不接受任何船只，造船的人不得造出能够出海航行的船只，否则将被处死！任何试图从其他国家返回日本的日本国民都将被处死，以防止他们将任何外国思想带入日本；任何试图离开日本的国民也将被处死。

在这些禁令之后，欧洲国家除了荷兰，几乎不再踏上日本的土地。而荷兰之所以能够留下，是因为当时的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即使日本不接受基督教作为信仰，贸易也是可以进行的。而彼时德川家康的英国顾问是个新教教徒，因此，荷兰在日本受到了优待。

但即使是荷兰人，也不能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进行贸易，贸易的范围被限制到小得不能再小：荷兰人一年也只能派一艘船来到日本，并且只能在一个指定的岛上，不能登上日本的其他岛屿和土地。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日本人隔绝了西方的思想和基督教传教士，也隔绝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而此时的西方则是蒸蒸日上的，在工业革命之后，都摇身一变，经济飞速发展起来，其膨胀的野心终于在19世纪狂风暴雨般地袭击了亚洲。

而德川幕府仍然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就像当时的中国一样：没有外来的刺激，努力完善自己相对来说已经完善的封建体系。他们扩大了幕府的权威，与周边国家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它的内在有许多惊人的变化：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城市化进一步加强，民众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中有序地生活着。但这一切，挡不住西方工业化和殖民时代的脚步——变革仍然是最终的出路。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第五章 明治维新：走向近现代的世界

第一节 不速之客：美国准将佩里和他的外交使团

在著名的“黑船”到达日本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国家试图打开日本的大门了。

最先活动的是俄国。在18世纪，俄国完成了西伯利亚的扩张之后向千岛群岛扩进，无数的俄国商人到北美的大陆去寻求皮毛，同时也在想象同日本人通商能够带来的巨额利润。

在1792年，俄国皇帝派了一支使节性的队伍到日本，要求建立贸易关系。

日本的反应是缓慢的，差不多隔了一年，才给了个现在看来非常愚蠢的答复。

幕府很傲慢地回复说，日本对来自没有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的船只，一向的政策都是摧毁或者扣押，看在你们不懂法律的分上，这次的事情就算了。日本格外开恩地允许了一艘俄国船只在以后的某日可以驶到长崎来。

无奈的俄国人郁闷而愤怒地回国了。在1804年，一艘俄国船只按照当初的约定驶到长崎港，请求和日本通商。这只悲催的俄国船只在长崎等待了六个月之后才得到一个答复，幕府告诉他们说，只有中国和荷兰的船只才被允许进出日本，你们尽快回国吧。

俄国人几乎被气炸了，在回国之后屡次小规模地袭击了日本边境的一些村庄，并警

告日本人再如此傲慢无理拒绝通商的话，日本的北部就等着被俄国夷为平地吧。

这个时期前后在日本同样碰了钉子的还有英国人。1808年，一艘英国军舰闯到长崎，搜寻他们的敌人——与拿破仑结盟的荷兰人。幕府因为这件事情非常苦恼，自此之后，就非常防范英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小心翼翼。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日本人的极度反感——他们更加惧怕基督教和贸易了，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防范外国的侵略上了，于是幕府进行了一个征服虾夷的行动，以便在北方的土地上建立要塞抵御俄国的入侵。

对待英国方面，日本更加极端。但英国人也是非常执著的，接二连三地来骚扰日本。1825年，一些英国船员骚扰了萨摩藩的一个小村庄。幕府的反应是，以后若有英国船只，见一个打一个，地方大名们驱赶英国船只不需要得到幕府的许可。

1846年，一支英国和美国联合起来的船队，再次到日本希望打开外交关系，照旧无功而返。

和日本友好的荷兰也曾警告日本说，如今的工业时代和过去不同了，现在的欧洲非常繁荣强大，日本应该考虑和西方进行贸易。如果日本有这方面的考虑，荷兰愿意帮助日本适应这些变化。可是幕府的大佬们依旧是桀骜不驯的，回复中一直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荷兰国王在接到这样的答复之后，除了叹气，也没啥好说的了。

不过幸亏当时的日本是个小国家，人口没有中国多，地方没有中国大，物产没有中国多，西方列强盯着中国，没有过多地纠结日本到底开不开放的问题。

当然面对这些不断外来的因素，幕府也是有所改变的。

隔壁中国的失败给了日本很多的反思。日本的荷兰学者和荷兰商人尽管力量有限，

也在继续传播着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对于中国的文化，日本更是积极地学习，特别是魏源的《海国图志》被翻译成日文的时候，居然成了一本畅销书。日本人已经表现了对西方的强烈兴趣，纷纷买这本书来阅读。不少地方大名已经运用西方的技术来制造大炮。

而此前的日本知识界，已经开始反思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了，其中著名的是佐久间象山。他的观点类似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要多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在1839年的时候，佐久间象山在江户神田开设了一家象山书院，培育了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小林虎三郎、桥本左内及明治以后作为明六社的同人活跃的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树等门生。其中，吉田松阴的诸多学生，最终促成了明治维新的发生。

日本一直都是需要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需要一个适当的契机和一个适当的人，于是，在1853年，美国人佩里来了。佩里的到来，成为一个转折点，刺激了日本的改变。

大河剧《新选组》在第一集中，描述了这样一个镜头：佐久间象山和日后之新选组的主要成员，当年还是懵懂少年的近藤勇和土方岁三，去海边参观几艘冒着白烟的蒸汽船——“黑船”。在去的路上，两个少年甚是兴奋，看到黑船以及黑船射出的炮弹后，两位少年颤抖了——设想一下，如果若干年前，幕府没有大规模锁国的话，那么与日本贸易的帆船过后，蒸汽船在日本应该是常见的事物了，至少，近藤和土方见到黑船，不会颤抖了。

为什么先来的是美国人呢？一个解释是，日本被迫卷入了19世纪的全球化大潮，这

还是它的地理位置惹的“祸”。

在19世纪初，美国因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门罗主义”为精神支撑，走在全球称霸的路上。同时，美国的捕鲸船开始在日本海域活动，短短十年之内，已经有二百多艘捕鲸船在北太平洋地区作业。这些船一出海就是一年，中途的歇息地一般在夏威夷。这些船只更想在更接近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的日本港口来补充水和食物。幕府的锁国政策令美国人很绝望，不但美国的船只不能靠近，就是那些失事的船只上的船员在日本往往也会受到虐待。鉴于此，美国人最初比较友好地到日本，请求通商和贸易。

公元1837年，美国的一艘船，名字叫莫里逊号，借着送还日本漂流民的名义，开进浦贺要求通商。日本人毫不客气地朝它开了几炮，莫里逊号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公元1846年，美国使节彼得尔又领着一队船只来浦贺要求建交，仍被幕府拒绝。

美国更加迫切地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是在墨西哥战争结束后。

1848年，美国获得了太平洋岸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随后当地金矿被发现，美国西部开发进程提速。而此时，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非常顺畅，美国人也想来插一脚。

当时的英国有东南亚作为基地，而美国与中国之间唯一可能的中间地带，就是更接近中国的日本了。日本之于美国的战略意义，让美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打开日本的大门。

1852年11月，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到日本进行交涉。

随后，佩里率舰4艘，从美东部海岸出发，于1853年6月3日驶进江户湾浦贺，要求幕府接受美总统国书。在这封国书中，美国总统非常谦逊并且天真地表达了美国的

愿望，希望日美两国友谊共存，彼此通商。美国的请求不外乎三个：希望日本能够改变古老的法律，允许自由贸易；希望日本对待美国失事船只上的船员能够友善一些；希望美国贸易和捕鲸的船只经过日本的时候能够得到煤炭、淡水和食物。



佩里

面对这种友好的、正常的要求，幕府的反应依旧是迟缓的，浦贺的奉行派员告诉佩里，必须先到长崎才能谈判。佩里断然拒绝了，并且表示：“你们如果不受理，我们的船队就要开进江户与将军直接谈判，一旦打起来，你们一定会输的，而且等待你们的将是大得多的舰队。”

幕府被迫收下了美国的国书，表示一年后答复。

佩里不干了。佩里是非常强硬的，他出身于美国一个素来以强硬著称的海军世家，他手里还有来自美国政府的另一个命令：如果日本政府依旧不合作，不吃敬酒的话只能上罚酒。他在率领他的舰队于江户湾耀武扬威一番之后扬长而去。

第二年，佩里再次率领舰队到达江户湾。

幕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德川幕府深知自己在军事上无法与美国的新式军舰抗衡，但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的办法，于是采取了一项大胆的举动：在6月15日，幕府老中首座阿部正弘，不得不打破二百多年来将军专断国政的惯例，把美国叩关情况报告天皇。随后，在7月1日，幕府将美国国书译本分送各藩大名和幕僚征询对策，就连那些不被信任的外藩大名也包括在内。

这是一场空前的危机，幕藩领主和武士、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都参与这场讨论之中。每个人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日本已经处在了一个转折点上。

幕府的这种举动是徒劳的，大名们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没有人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且，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地使得幕府的脆弱形象展现在地方大名那里，幕府的权威和名誉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1854年，佩里再次来到日本，所带的舰队是上次的2倍，而且是最具有杀伤力的军舰。结果就是，幕府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美国的要求。

1854年3月，两国在横滨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条约同意美国船只在下田、箱馆两个港口停靠；在日本附近，一旦有美国船只失事，那些流浪人员会受到日本公正的对待；那些途经开放口岸的美国船舰，可以在开放口岸得到煤炭、淡水、粮食及其他所需物资；日本同意美国外交官在18个月内进驻下田，设置领事等，同时规定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

几个月后，两国又在下田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的附件，规定了下田开港的细则，其中包括在下田划出方圆7日里、在箱馆划出方圆5日里的驻日使馆人员的散步区。

1856年，美国第一位驻日使节托森德·哈里斯到达日本，又开始与日本签订通商贸易方面的规则。

1857年6月1日，又签订了《下田条约》，规定日美两国货币的同类同量交换以及领事裁判权、领事旅行权等。这些条约后来被1858年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也称《江户条约》，所吸收。至此，日本的大门彻底地向美国打开了。

美国在日本的成功，也吸引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到来。1858年7月29日，日本与美国两国的全权代表签订了《江户条约》，又接着与英、俄、法、荷四国以日美条约为蓝本分别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主持签订条约的是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因为当年是日本的安政五年，所以将这五个条约合起来称为《安政五国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除已开放的下田、箱馆两港外，增开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庫（今神户）4港及江户、大阪2市（神奈川开港6个月后，关闭下田港）；相互在首都派驻外交代表，在开放港口派驻领事；外国人可以和日本人在上述地区不受限制地自由贸易；内外货币同类等量交换；外国人有在开放港口城市设租界一类居留地的特权；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缔约的外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实行议定关税税率。

这些条约签订的结果，就是使得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中国清政府有得一拼：在逐步开放港口之后，外国人深入到并没有开放的江户和大阪居住。这些条约最让日本人不能容忍的，就是外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如果外国人在日本犯了法，将由本国领事按照他们自己国家的法律来进行裁判。随后，日本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西方国家迫使日本降低关税，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因此都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而片面最惠国的待遇，又使得每一个西方国家如果在日本获取了新的权力，其他国家都可以来分享。

日本开国，在日本社会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节 没落的武士和脆弱的幕府

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日本社会对待西方的态度是很复杂的。

一个好的方向就是，不管是爱西方还是痛恨西方，日本人打算去好好了解自己的对手了。

从1857年开始，幕府不断地派出使节到国外，去了解这些国家的现状。素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就是其中的一位。

1859年，德川幕府依据日美通商条约的规定，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



福泽谕吉

当时的福泽谕吉，正在大阪一家著名的兰学私塾学习。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他获得咸临号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作为一个随员，到了旧金山和夏威夷等地。由于随员的职务繁忙，福泽谕吉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了解美国，但他还是被眼前的一切深深震撼了。

回国之后，福泽谕吉接受木村摄津守的推荐，受雇于幕府“外国方”（即外交部），充任译员，翻译与外国往来的公文。

1861年，福泽谕吉又获得了一次出洋的机会，随同日本的欧洲考察团访问欧洲。这次，他走访了欧洲国家的工厂、公园、市政厅、矿山、博物馆、银行、监狱，购入了大批关于欧洲历史、政治、海陆军、地理、风俗等方面的书籍。

回国之后，他将自己的见闻汇编成《西洋事情》一书，这本书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完成了，并在1866年10月出版。在书中，福泽谕吉介绍了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内容。

这本书的销量，对比今天的畅销书销量来说，也是非常可观的。首次出版就迅速卖掉了15万册。此外，还有10万册左右是以盗版书的形式卖出去的。此书这么畅销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的语言非常通俗易懂，就是那些简单识字的妇女理解起来也毫不费力。这本书里介绍了西方的制度和生活，包括西方的医院和学校、税收制度、博物馆以及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福泽谕吉后来连续写了大概7本书，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而在这前后，日本的政治已经开始走向“尊王攘夷”了。

如果时代让一个国家变化，除了外在的力量，一定还有更多的内在力量。

在西方国家没来之前的日本，已经存在很多问题了，而这些问题都是幕府没有能力解决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幕府的财政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没钱就等于任何问题都处理不了。

德川幕府在统一日本之后，因为战乱的平息，日本社会逐渐趋于稳定。在18世纪初，日本步入了一个非常繁盛的商品经济时代。

京都、大阪、江户仿佛一夜之间，成了商品聚散地，人口和商铺都大大增加，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遗憾的是，幕府干看着商人们发财，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大名们甚至因此逐渐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

一直以来，幕府以及幕府体制内的各个等级大名，在其封地内，获得收入的流程是这样的：由所属领地的农民们交上实物的地租，大名们自己将其卖掉，来换取钱物。

在农村也逐渐卷入商品化的时候，商品经济发展的成果，幕府是干看着没有办法去收税——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幕府可以从商品部分获取利润。

而随着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各种新奇的东西被制造出来，人们之间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也促成了更加完善以及追赶潮流的城市生活。因此，幕藩财政支出一项，就把德川初期的积蓄都消耗掉了。在积蓄消耗掉之后，幕府就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幕府一年收入不到50万两，支出却近150万两，财政赤字越来越大。而幕府和大名们那些烦琐的礼仪、服饰及娱乐享受，却没有因此打住。同时，物价也不断上涨，幕藩财政越来越困难。

藩国的状况更为糟糕，根据德川幕府的规定，大名们要在江户和各自的领地轮番居住，这等于是每个大名都要安两个像模像样的家。

即便如此，大名们也没有节约的意识，多数大名在这两处住宅中都过着相对奢侈的生活，每年都要花费很多钱去幕府觐见。此外，幕府的各种徭役也会不定期落到地方藩国的头上。比起幕府来，各个藩国穷得更早。佐贺藩从元禄年间开始，就入不敷出、外债累累了，萨摩藩在1719年也面临同样的境况，濒于破产。

没有钱，加剧了藩国对幕府的不满。

幕府和藩国的财政状况尚且如此，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窘迫了。

在以前，武士们是人们敬仰和尊敬的对象，而到了18世纪，武士们为了生活，渐渐地，不得不和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了。

藩国和大名们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差，所能采取的手段就是降低武士们的俸禄。而之前的俸禄，也是以实物形式——稻米发放的。武士们要将其中的一部分米卖掉，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们的“工资”就从来没有涨过，而物价却是越来越高了。詹姆斯·L·麦克莱恩在一本书中曾描述过武士们的没落生活：在加贺藩，很多武士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砍掉了自己花园中的灌木，种上能在市场上出售的水果树。居住在城市里的武士，开始创业，制造草鞋、雨伞、装饰的发带、灯油，以及节庆用品比如泥娃娃、纸老虎、自动玩具等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而这种情况不是加贺藩独有的，其他地区的武士也纷纷放下面子开始从事营利性的活动，那些没有条件创业的武士则从事一些兼职工作，在商人、手工业者的店铺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换取工资。

这些场景在日本的历史剧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新选组》中，武士永仓新八为了养活一名落难女子，在道场的工作之外，还要去帮助别人建造房屋来获取酬劳。这种行为对武士来说是一种放下身段的行为，因此，他的武士朋友们看到了，也会装作不知道。

整个武士阶层，几乎都陷入了一种财政的困境。由于物价上涨，旗本（俸禄不满一万石）中有许多人值夜勤，甚至都没有被子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各藩大名由于财政困难，以所谓“借知”名义，削减家臣俸禄，使武士生活更加困难。到了19世纪，武士的俸禄普遍削减了约百分之十。许多贫困的武士只好当掉自己的刀剑和盔甲，把女儿送出去做佣人，更悲惨的甚至不得不杀死刚出生的婴儿来免于陷入更加贫苦的境地。

因为没钱，许多幸运的武士靠娶商人的女儿作为妻子，来解决财务困境。大河剧《新选组》中，近藤勇就有幸娶到一位富有而贤惠的商人的女儿，这位妻子多次在他贫困的时候伸出援手，解救他于窘境之中——当然这也挡不住他在外面继续养个小妾，这是题外话了。

相对于贫困，最难忍受的还是心理的落差。

商人因为有钱，逐渐从社会的最末端崛起了。他们开始穿武士们穿不起的衣服，住武士们住不起的房子，他们也能够买到因为商品的繁荣而产生的各种时髦的用品，而这些是没落的武士们所不能担负得起的。武士们渐渐感觉到，自己从社会的中坚，变成了“最不值钱”的那一部分。武士们通过咒骂商人和富农来发泄自己的愤懑。然而在最需要钱的时候，各级武士，包括一些原来很有身份地位的大名，都要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钱，江户、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富商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些

借款的利息还是相当高的，以至于大名们收到的赋税，很大一部分要用来去还这些商人的利息。

即便如此，武士们还是维持着自己可怜的尊严。一个实际上并没有吃饱饭的武士，在用餐结束时也要在自己的嘴巴上塞一根牙签来表示自己已经酒足饭饱。那些烦琐的婚丧嫁娶的礼仪，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一些。

幕府为了缓解武士生活的窘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给武士们发放贷款，用于改善生活，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难以解决根本的问题。沉重的税赋也激起了下层武士的反抗，随之而来的，是武士阶层精神的垮掉。长州藩的一位官员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多年以来，武士忍受贫困，一心只想着谋生。‘买这个，卖那个’，‘拆东墙，补西墙’，已经成为他们全部的生活。甚至那些恪尽职守的人也降低身份做些不光彩的事情。他们一天天苟活，早晚都吃稀饭。他们的生命在虚耗，他们的精神和举止日渐卑劣可耻。他们已经成为满嘴谎言和善于行骗的人。”

与此相应，农民和下层市民的状况也变得很糟糕。19世纪早期，日本发生过连续的饥荒，曾导致人吃人的事件。下层武士和下层农民、市民们一起，组织起来抗议幕府的暴政以及无效的管理，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1830年到1834年，因为地震、洪水和农业歉收，导致米价逐步攀升，下层的市民几乎连粥也喝不上了。幕府的救济也没有及时到位，一时间大阪等地的街头，到处都是饥民。因为没有钱买米，不少人家的妻女在街边公开卖淫以换钱买米。

大盐平八郎是幕末时期的一名学者，以好心肠闻名四方，经常出钱救济穷人。看到此种悲惨的状况，他变卖了自己的全部藏书，得到六百多两黄金，分给了一万户穷人。

但当时大阪的奉行所，认为大盐平八郎的举动不合法，要对他进行惩罚，这激起了穷人们的愤怒，造成了局势的紧张，还好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骚动。1837年，大盐平八郎看到穷人饿死的越来越多，而当局却束手无策，虽然自己倾家救济，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铤而走险，推翻无能的市政府。因为与幕府力量的悬殊，这场反抗很快被幕府镇压下去了。大盐平八郎最后自杀身亡。

虽然在这场起义中，因为大火大阪很多房屋都被烧毁，但人们不但没有怨恨大盐平八郎，反而愈发地尊敬他。幕末的维新志士也非常崇拜他，后来他被推崇为“民权的开宗”，成为自由民权论者攻击专制政府的一大精神支柱。

这样的骚乱在19世纪30年代左右，有好几百起，整个社会的最底层已经变成了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但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是精英们的决定。在一系列的骚乱之后，幕府的老中水野忠邦曾颁布了一些法令试图改革，也无济于事。幕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其形象在日本开国之后变得更加不堪。

整个德川幕府时代，幕府和藩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比较紧张的。

到了1858年，在日本的国际关系比较微妙的时代，德川家的情况也很不妙。幕府的第13代大将军德川家定，因为生来就身体孱弱，以至于到34岁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生下儿子。于是，在究竟由谁来继承征夷大将军位子的问题上，矛盾来了。

这件事情几乎是与《五国安政条约》的签订同时发生的。

在这件事情上，幕府分为两派——以德川齐昭、松平庆永、岛津齐彬为盟主的地方改革派强藩诸侯武士和以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为首的专制保守派诸侯武士（德川家臣、大名），这两派围绕将军继承问题，几乎就要打起来了。

改革派推选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之子德川庆喜为继承人，保守派则拥立纪伊藩主德川家茂。如果要论起血缘关系来，德川家茂的血缘与德川家定比较近。保守派们在这件事情上非常坚决，因为他们觉得，一旦水户藩之子继承了将军的位子，那么将会是地方大名们的胜利，幕府最后的一点尊严似乎也维持不住了。

4月，保守派为了维护幕府独裁，由井伊直弼出任大老，不顾皇室和各藩主的意志，推举德川家茂为将军。6月，幕府断然批准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于是，支持德川庆喜的一派，指斥井伊直弼不待天皇允诺擅自签约是违赦。井伊直弼回答说：如果与英、法开战，必蹈清帝国覆辙。朝廷了解这种详情后，自会体谅允许签订，否认有违犯之罪。7月井伊直弼乘将军德川家定病危，逼他下令对齐昭、庆胜、庆永及庆喜，作了严厉处分。10月25日德川家茂正式为将军。

在大名和幕府的争斗中，受益的是天皇。

幕藩对立两派都派人到朝廷争取支持本派。各藩武士、浪人也聚集京都，要求朝廷抑制幕府的独断专行。皇室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倾向于地方藩国，但井伊直弼一派在这件事情上决心孤注一掷，坚决抗拒皇室利于藩国的措施，诬告齐昭为私利拥立庆喜，密通外夷，阴谋内乱。于是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内，幕府对改革派公卿、家臣及在京都的武士、浪人实行大镇压，捕四十余人，押送江户。

幕府在这件事情上，无疑捅了一个马蜂窝：1859年8月，幕府处决了改革派最有名望的人物吉田松阴。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一连串的倒幕行动。

在一连串的政治危机背后，是更加深重的经济危机。

在日本终于对外开放之后，由于西方的冲击，日本的经济状况更加糟糕。

日本的本土商品：生丝、茶、蚕种和棉花大量出口，因此在内需方面的价格也随之攀升。因生丝不足和价格上涨，以京都西阵为首的各地丝织业已难维继。随之而来的又是新一轮的米价上涨，以及居民必备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加困难。

因此，反对幕府统治的斗争逐渐发展到全民性质，而且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并朝着愈益暴力、直接的方向发展。

在日本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能让人忍受的是经济的危机，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权力的丧失。幕府在没有天皇的支持下擅自签订了《安政五国条约》，激起了地方志士的强烈反对，一些藩国因此期望日本能够进行改革，从内部加强自身的力量，然后将西方人从日本赶出去。

这之中的藩国代表是水户藩以及萨摩藩和长州藩，中心人物则是来自长州藩的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是一名热血青年，他的一位老师就是佐久间象山。通过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他开始进行游历，先是日本国内，后来他还试图登上佩里的战舰去美国进行游历，因为被发现而失败并被逮捕入狱。

出狱后，他办了一所学校，收了不少弟子。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治维新时期的“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还有日本后来的政治领袖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也包括和他一样的热血青年高杉晋助、久坂玄瑞等。

吉田松阴教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只有幕府灭亡、归政于天皇，日本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强大起来。他对幕府的外交无能进行了强烈的指责，他谴责幕府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他批评由幕府制定的一切不合理的等级制度。

他认为，日本想改变现有的局面，只有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特别是用那些思想纯正、大公无私的官员来取代那些依靠血统的平庸官员。

为此，他还策划了一起暗杀幕府皇室特派员的事件，这次事件导致了他被捕以及被处死。

尽管此时也有不少人希望幕府自身能够有所改变，但在安政大狱之后，吉田松阴的主张终于成了主流。

针对这些声音，幕府决定了一次重大的权力让步：公武合体。即德川家茂将迎娶天皇的妹妹和宫公主，同时幕府将承认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以后的外交事务中，将首先得到天皇的首肯。不过，保皇派、攘夷派和反对幕府的武士们很不认可这些政策，他们在内心已经决定效忠天皇了。

1860年3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被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年轻武士们谋杀了。而这一时期，日本人与西方人的矛盾逐渐爆发：一些外国人被街头的武士砍死，英国驻日本公使馆也受到了好几次骚扰。1862年，萨摩的武士砍死了一名英国商人，导致英军炮轰鹿儿岛，并且要求一大笔赔偿——这笔赔偿当然是由萨摩藩出。

长州藩也不甘落后，1863年，长州藩向停泊在下关的外国军舰开了火，此举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合伙报复，次年，长州藩的军事基地就被摧毁了。萨摩比起长州来要圆滑一些，他们在英国的帮助下，买了不少先进的武器。

尽管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的对立不断，但他们却在1866年达成了秘密协议，取得和解，共同对付幕府——这个协议通常被认为是由坂本龙马主持，在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和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之间达成的。在幕府针对长州藩的战斗中，萨摩藩和其他一

些强藩毫不客气地袖手旁观了。幕府被区区长州藩打败了，威信荡然无存。

1867年年底，倒幕派诸侯向幕府发起进攻。在1868年1月3日，萨摩藩等藩占领了皇宫宣布“王政复古”，幕府将军被降为一名普通大名，其领地也被没收了。经过拉锯战，装备新式武器的倒幕军节节胜利。到1869年5月，幕府宣布投降，德川时代终于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来临。

第三节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1868年4月6日，尚为少年的明治天皇，把近500名官吏召至皇宫，宣读了《五条御誓文》的国策，内容如下。

- 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 2．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 3．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
- 4．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
- 5．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誓文是由福井藩的由利公正起草宗旨大意，土佐藩的福冈孝悌进行初次修订，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三条实美继续加以完善，最后由明治天皇过目定夺。在定稿之后，木户孝允提议由天皇亲率百官在神前宣誓，最后，到场官员都分别签名。

天皇的宣读，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序幕。

不过到此时为止，虽然幕府不复存在了，不代表明治政府就是一个好的政府，相反它还是千疮百孔的。德川幕府留下的烂摊子——财政危机依旧没有解决；部分藩国仍有效忠幕府的，代表天皇的军队还在与这些藩国对峙着；虽然攘夷派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要他们把西方赶出日本，还是过于自不量力了。因此，如何对待西方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后来的解决办法是：要想真的打败西方，唯有彻底学习他们的技术和制度。

不过这五条誓文也基本规划了一个日本未来政体的走向——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1868年，在稳定了政权之后，这些革命者开始详细策划日本的中央权力架构。他们参考了《美国宪法》等文献，发布了《政体书》，本着类似“三权分立”的精神，为日本列举了十条政体纲领，然后分两部分详细规定官职和官级，并将所有的权力归于太政官。

在今天看来，太政官很像一个议会组织。《政体书》规定，太政官作为总括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最高官府，下设议政等七官。随后的年头中，日本的官制不断在改革中进步：1869年7月，改革官制，太政官与神祇官并列，管辖民部、大藏、兵部、刑部、宫内、外务等六省，左、右大臣，大纳言，参议等参与大政；1871年7月，改为正院、左院、右院三院制，管辖外务等八省；1873年修改官制，扩大正院权限；1875年取消左、右两院，设置元老院、大审院；1877年取消正院；1885年，将太政官取消，正式确立内阁制。

太政官体系把权力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中心，制定国家行动的方针，然后将其送达天皇处，天皇批阅后再向下

颁布政令。这个组织的有效性在废藩置县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

废藩置县是太政官体系下完成得非常漂亮的一件事。

为了完成这件事情，木户孝允等人采取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

一方面，他们保证，在废除藩国、建立府县之后，藩主们的地位不会改变，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他们会从一个藩的藩主变为一个县的县长。另一方面，他们则组织了一支将近一万人的军队，由西乡隆盛率领，对各藩主们进行武力上的威慑。

1869年7月，天皇在东京（由江户改名而来）宣布了“版籍奉还”的政策，要求各藩交回土地资源以及人口资料，以便加强中央集权。



木户孝允

那些忠于天皇和新政府的藩主，比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的藩主，早在1869年就在新政府派遣的官员的劝说下，将领地授予文书归还给了天皇。1871年夏天，天皇召集了剩下的一些藩主到东京，宣布了废藩置县的政策，在全国设置了几十个县，每个县都由新的县令管辖。

虽然这是一项大的变革，但是引起的震动却比想象的小多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日本分裂得太久了，幕府和天皇的二元体制让很多藩主感到疲倦，他们不再留恋藩主的世袭职位了。而武士阶层的没落以及商人的崛起，让很多藩主失去了守护传统的兴趣。许多藩主也认识到，在外来的压力下，日本想要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话，必须先打造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行。当然，也有很多藩主是被强悍的西乡隆盛和他的军队吓倒的。

总之，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日本神奇又迅速地完成了废藩置县，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个成绩让英国人惊奇得不得了。以至于岩仓使节团的副使伊藤博文访美时，曾在旧金山扬扬得意地发表演说时讲到，欧洲废除封建制度需要进行长时期的战争，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废除了封建制度。

除去废藩置县，明治维新还包括很多内容：经济上大力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工业企业。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社会上，采取“改历”、“易服”、“剪发”等措施，打破原有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严格限制，允许相互通婚。军事上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对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一支崇尚“武士道”精神、效忠天皇的军队。文化上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努力改造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

在种种开放的政策下，日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岩仓使节团。

明治维新，开启了一个日本努力与西方国家交流的时代，日本正在努力跟上西方的

步伐。

这种交流在佩里到来之后就逐渐开始了。在幕府没有倒台的情况下，也向欧美国家派遣了七八个使节团，一共有三百多人得以有机会考察西方。当时的幕府对与西方的交流还有一定的防范和限制，不过仍旧在有限的条件下，增进了人们对西方的了解。

在1868年之后，限制西方知识输入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日本人的好学精神又一次派上了用场。从1873年开始，明治政府陆续派出代表进驻欧美国家，还举行过博览会展示西方先进的机械以及建筑。

在了解西方的过程中，最大胆的行动就是岩仓使节团的成行。这也是年轻的、尚未在国内事务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改革派们的无比大胆的举动之一。



岩仓使节团主要成员

1871年，特权大使岩仓具视带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以及其他50名使节团成员和50多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里面还包括5名女士，她们也一样要在外国留学多年。这些改革家的年龄最大的47岁，最小的伊藤博文只有30岁。他们从横滨出发，前往欧美，目的有二：一是学习西方，二是看看有没有可能使得西方修改那些不平等的条约。

这也是一个庞大的调查团，他们最想知道的还是西方究竟是怎么发达起来的。使节团的成员们都分工明细，有的负责考察商贸，有的负责考察工业，有的负责考察银行和税收、金融等——他们的计划是相当完善的。

这是一个年轻的使节团，也是个非常天真的使节团。所以他们在和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谈条约相关事宜的时候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帮人顿时明白，如果自己不够强大，没有强劲的实力，是不能和欧美国家谈条件的。只有改革日本现有的体制，建立起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日本强大起来，现状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于是，他们更加卖力地考察西方的各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了。

使节团的成员们被西方的文明彻底震住了：那些在工厂轰鸣的机器的声音听起来都很悦耳、那遍地的灰尘和漫天的黑烟都不觉得肮脏，以至于他们把原定的期限延长了一年多。他们去了英、美、法，然后又去了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国家。

在近两年的时间中，他们马不停蹄、勤奋地接触各国政治首脑和各阶层人物，考察了议会、法院、公司、交易所、工厂、矿山、港口、兵营、要塞、学校、报社、福利机构、博览会等，简直是如痴如醉，相见恨晚。在知道西方发展成这样只不过花了几十年之后，木户孝允等人更是大为惊讶，进而遗憾自己的国家居然错过这样一场变为强者的盛宴。

他们纷纷写信回国内，表达自己对西方认识的不足，并且认为日本现在的开放并不是真的开放，要想追上西方的脚步，必须彻底放下身段，与西方平等地贸易，即使暂时吃点亏也是无妨的。

使节团还花了不少心思来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制度，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有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才有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的竞争力。在对比了各国的情况之后，他们对德国的制度赞赏有加。因此在1882年，又专门派出伊藤博文去普鲁士，回国之后仿照普鲁士的制度制定了日本的宪法。

比起日本来，中国的考察就变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早在1868年，中国就派出考察团去欧美，跟团去的郭嵩焘的命运是非常令人感叹的，他亲身经历了东西方之间对比的震撼，写成了《使西纪程》一书，不但不被人重视，反而因为赞颂西方被无数的国人唾骂为崇洋媚外。

同样三十几年过去，中国依旧在艰难地探索，依旧纠结于国内的权力斗争，而日本已经快要追上欧洲各国了。

第四节 不允许带刀的武士和穿西服的天皇

明治维新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往往一个社会的潮流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变化。日本的全面开放，让西方的事物纷纷涌进，不仅包括那些先进的技术和器物，还包括西方的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到思维方式，日本人展现了令人惊讶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对新事物热情的接受能力。

日本政府在积极变革的同时，也热衷于推动民众接受西方的食物、建筑和服饰，推

行西服就是其中的一项。那些在新的征兵制度下进入军队的年轻人穿上了帅气的西式军服；在公开的典礼和仪式上，天皇和官员们也开始着西装出席；出使西方的岩仓使节团，其成员也大都穿着西装。西装的简便挺拔很快征服了日本人，不久城市中的普通人也开始穿着西装。有的人一时接受不了，也愿意穿出一种“混搭”风格，将西服套在传统的日本服装之外。一时之间，人们以穿西装、打着雨伞走在街上为时尚。

西方的食物也流行起来，以前不受日本人待见的牛肉和牛奶也逐渐成为普通人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大久保利通是一位比较狂热的西方文化爱好者，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他也愿意规规矩矩地穿着西装，他喜欢早餐喝茶吃面包。年轻人也喜欢去街上喝啤酒和咖啡来显示自己的时髦。

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的巨大变化。

大阪和东京等地的新式建筑、西式的洋房、大型的百货公司纷纷拔地而起，最著名的是东京的银座。围绕这座商业中心，延伸了近1000座类似的建筑，这些建筑带动了东京的繁华。日本著名的护肤品公司资生堂，便源于此时银座的一家药店。

与银座齐名的建筑是“鹿鸣馆”。现在看来，它就是一座两层楼的娱乐中心。人们可以在这里的餐厅就餐、在书店里阅读，这里还有宽敞的舞厅、台球室、音乐厅。东京的精英阶层很喜欢来这里一边放松一边讨论时局。这里的生活和社交是典型的西方风格，“鹿鸣馆”成了“西化”的代名词。

不过在这种欣欣向荣之间也有很多的不和谐因素：很多人在这种新旧交替之中无所适从，乡村依旧破败不堪，新政权的巩固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繁荣的种子已经埋下，人们正在期待国家变得更好，期待个人的命运也变得更好。

在考察了诸国的教育之后，使节团认为，日本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不到位，日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新式的学校，为日本的社会培养人才。办起学校来，日本的速度非常快，到1877年，日本第一所综合型大学东京大学就出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全国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叹息说，日本学堂，其密度甚至要高于中国的鸦片馆。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甚至也要到日本的学堂里学习军事和法律知识了——日本迅速变为中国学习的对象。

1871年，日本正式设立了文部省，开始了一个庞大的设立学校的计划。第一个目标，就是继续大量地派出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去学习，教育经费的很大部分都被投入了这个项目。1873年，一共有250名留学生前往欧美各国进行学习。这个时候日本的学校，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外教很多——明治政府此举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快速地解决国内教育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自己能够培养出教师之后，外教的数量逐渐减少。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02年日俄战争前夕，日本建了2所大学，222所中学，53 760所小学——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但是也没有达到原定的目标。

1872年9月5日，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新学制的基本原则为义务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各府县按学区设初高等小学，完成四年制初小教育被规定为国民的义务。授课时数一半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为了鼓励家长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小学去，明治政府在1900年规定了四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这样那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家庭，也能让自己的孩子去上学了。

像飞速的废藩置县一样，日本的教育近代化也快速地实现了。

与教育一样发达的，是日本的经济。

在1873年左右，一个在日本相当流行的口号就是“殖产兴业”。

开放后的日本，经历了一番经济上的阵痛后，优良的商品如潮水般涌了进来，人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便宜又好用的西方制品。因此，本国的传统手工业逐渐萎缩，贸易处在极度的逆差当中。如果不进行国家干预的话，日本很难走出经济的泥潭。

日本政府决定动用行政干预来建立一些有关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其一，是通信。1869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条电报线，到了世纪之交，已经有五十多个城市拥有了电话局，现代的邮政系统也逐渐建立起来。其二，是铁路的修建。1872年10月，东京到横滨的铁路修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天皇本人也出席了这个典礼。其三，是金融。日本很快造出了自己的货币，批准成立国立银行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其四，日本官办了不少企业，以作为企业的榜样。这些企业包括长崎造船所、横须贺造船所，大久保利通本人也大力投资纺织企业。在上下的齐心努力下，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日本一家缫丝厂的蚕丝获得了二等奖，迅速在米兰和里昂打开了销路。

私人企业因为获得了适宜的土壤也迅速发展起来，在明治时期，日本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都开始形成。

到19世纪80年代，随处可见的冒着烟的烟囱以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穿行的列车，都在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个之前与世隔绝、自娱自乐的日本，已经为一个正在逐步机械化、迈向现代经济的日本所取代了。

在谋求变革和发展的同时，日本年轻的改革家们，不再急功近利，在外交危机上，也显得稍微成熟了一些。

朝鲜半岛在明治维新之后，又落到了日本的眼中。幕末那位著名的改革启蒙家吉田松阴，就是个狂热的朝鲜征服爱好者。在日本和美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后，吉田松阴心里很是郁闷，幻想日本失去的东西，应该由朝鲜和中国的土地来补偿。

那个在日本的卡通片和电影中一向以睿智、宽厚、坚定的形象出现的木户孝允，心中也潜藏着一个征服朝鲜的强烈意念。在1868年的时候，他就认为朝鲜是一块肥肉，是将来日本进攻的对象。现在应该派出使节到朝鲜去，如果朝鲜不礼遇日本，那么日本就应该教训朝鲜。不过木户孝允在跟随岩仓使节团出使欧美的时候，渐渐改变了这个想法。

在日本国内，积极想出兵朝鲜的是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强硬派。西乡隆盛和他的部下们在明治维新中扮演了一根“大棒”的角色，这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西乡是一个武士道精神的坚守者，随着武士阶层的没落，他深深感觉到，自己有责任去维持这种精神，有责任去让武士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因此，朝鲜成了他的理想的实现之地。攻打朝鲜，可以让众多失业的武士们暂时找到一个归属之地，而一旦攻占朝鲜成功，那么他个人也会在新的政府中获得更多的权威。

因此，在1873年，日本政府制订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制订这个计划的时候，恰巧新政府的其他要员都跟随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了。

日本出兵朝鲜，也不仅限于西乡隆盛的个人原因，武士们的生活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彼时的国际关系也让日本深感威胁：在北方，崛起的俄罗斯，蠢蠢欲动踏上朝鲜的领土；英国人表露出对琉球的极大兴趣，日本的周边在西方觊觎下，已经暗流四涌——这让日本很没有安全感，先下手为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旦侵略朝鲜成功，那么将来到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一个跳板。在侵略朝鲜的同时，日本又开始计划侵略中国了。不过限于自身的实力，日本和中国签订了一个相当和平的条约：

《中日修好条约》。

条约规定：中日两国互不侵犯领土，永远友好；如果有人试图侵略中国或者日本，一方有义务进行支援；互派使节、互不干涉内政；友好地在两国的通商港口进行贸易。

中日两国看起来暂时是和平了，不过鉴于日本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条约，要实现这个所谓的《中日友好条约》，是不太现实的事情。而且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很快就借口琉球事件，入侵了中国台湾。中日的关系，以此作为一个转折，逐步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而当时的朝鲜，处在中国的保护之下。日本与朝鲜之间不能相互派出使节，仅限于一定地区的相互贸易。朝鲜对日本人也一直是很冷淡的，对于来到朝鲜的日本官员，朝鲜基本不怎么理睬。日本人很无奈，只好派出军舰去釜山，朝鲜人更不吃这一套，在驻釜山的倭馆前贴出告示，严禁日本人走私。

朝鲜让日本丢尽了面子，这让颇有自尊心的日本武士们感觉受到了严重的侮辱。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岩仓使节团结束了对欧美的访问，匆忙回国。

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人坚决地认为，当下日本最重要的是改革与发展，取得与西方抗衡的力量，而不是去不自量力地攻打朝鲜。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很多支持，天皇也站在了他们一边。最后，在1873年10月，日本放弃了侵略朝鲜的计划。西乡隆盛和坂垣退助等人异常失望。他们愤而辞职，回到萨摩藩，并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反对政府的军事行动，明治政府花了半年时间平息这场内乱。西乡隆盛捍卫了武士道精神，他切腹自杀了。

1875年日本军舰入侵朝鲜，次年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此揭开了侵朝的序幕。1874年，日本曾出兵台湾，并从软弱的清政府那里得到了50万两白银的赔偿。这刺激了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打算。1879年，日本将琉球变为自己的领土，改名冲绳。

可以猜想的是，在西方那里受尽委屈并感觉到巨大差异的日本，在奋力进行了改革之后，必将会在亚洲掀起一番滔天巨浪，以便实现明治维新之初所主张的“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勃勃雄心。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六章 “成为餐桌客人”：现代日本的出现

第一节 1890年，日本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

1889年2月11日，对日本来说，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早晨，48岁的伊藤博文身穿剪裁合体的西服，在满朝的贵族、大臣、武官以及外交使节的注视下，将一部日本宪法呈给了明治天皇。随后，在一首尚未正式成为日本国歌的“国歌”《君之代》中，这部宪法正式生效了。



西式装束的明治天皇

宪法是伊藤博文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经过数次西方游历编写而成的。伊藤博文1841年生于长州藩的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成为武士家的养子。17岁左右，他投身长州藩藩士吉田松阴门下，吉田松阴很是喜欢这个活泼的少年。1858年10月，伊藤博文去长崎，入幕府办的炮术传习所，学习军事。1859年6月回长州，认识了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二人又一同去了江户，因为幕府与西方各国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遂开始了尊王攘夷的大计。

伊藤博文是个勤奋好学、有志向、精力充沛的爱国者兼野心家，也是个热衷学习西方一切优点的改革家。早在1863年，他就在长州藩的派遣下去英国留学，在这次留学中，他身上那种攘夷的热情减弱了许多。他在亲眼见到西方国家的物质文明后，认识到仅仅凭着一股保卫民族独立的热情去盲目攘夷，根本不是什么正确的道路，

相反，只有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才能成就倒幕大业，并使得日本强大起来。

幕府被倒掉之后，伊藤博文进入了日本的政治中心。1871年，他随着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特别关注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为设立议会和国会作准备。德国的制度得到了使节团的青睐，因此1882年，伊藤博文又踏上德国的土地，准备以德国宪法为蓝本来制定日本的宪法。

当时日本的改革派们非常热衷于宪法的制定，木户孝允就认为，日本的政治只有改掉独断专行的毛病，才能免于外国干涉的危险。因此，日本一定要有一部宪法，来实现内部的统一。大久保利通则觉得如果有既定的律力约束，君主立宪政体能够实现统治者和人民的和谐。岩仓具视则非常狂热地喜欢上了德国的那一套制度。在效仿德国这个问题上，对国内问题持不同意见的改革者们取得了一个难得的一致。因此，伊藤博文来到了德国。

他向宪法权威学者格奈斯特学习宪法，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周三次为他讲解宪法。在维也纳大学，斯坦因教授为他讲解了英、法、德政体的沿革。德国的威廉一世对这位年轻的改革家也非常欣赏，并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德国对于日本的影响从这里也可见一斑。

次年，伊藤博文回国，开始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制定宪法的过程。

这部在1889年2月颁布的宪法，被认为是天皇对人民的恩赐。

在尊王的潮流中，天皇的地位被史无前例地放在了首位，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合法性——天皇是万世一系、永恒的精神的代表，而穿着西服的天皇，则体现了日本的现代精神。这是在苏我氏时代、藤原氏时代、平清盛时代以及各种幕府时代从未有过的。

在这部使用到1945年的宪法中，天皇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宪法规定，天皇拥有至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他是国家主权的核心与源泉。

在这部宪法中，“天皇”二字就是宪法17个条款中第一个条款的标题。宪法宣布，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来统治。

天皇具有象征性的神的权力，也具有实用的世俗的权力。他拥有宣战的权力、缔结条约的权力、统率军队的权力，他拥有召集帝国议会的权力，也拥有休会的权力，更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他有否决议会决议的权力，天皇还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他的敕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中央各部的部长不是向立法机关负责而是向天皇负责。

这些权力天皇以前也可能在个别时候拥有过，不过从来不具有如此的合法性。

不过，日本毕竟是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天皇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如果要发布敕令的话，必须在下次议会开会之前发布，否则无效。同时，为了防止天皇专权，宪法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那就是天皇的敕令不能改变现行的任何法律。

在规定了天皇的权力之后，宪法接下来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两项特别被强调的基本义务是纳税和参军。而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就比较直接和具体了：公民有自由居住的权利，公民的住宅不能被非法入侵或者搜查，保护私有财产。公民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有出版、著作、集会、结社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又带着不少东方的色彩，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受制约的。一旦这些权利被认为超出了法律的范围或者违背了臣民对天皇的义务，那么都是可以取消的。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规定一旦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必须首先服从国家。伊藤博文对此也表示，当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去牺牲臣民和法律的权利是不能犹豫的——这种

悲情的基调或许也是日本从1894年开始，一步一步陷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

宪法还确定了日本实行两院议会制，描述了国务大臣和枢密院的职责所在。大臣和参议们都要尽职尽责地为天皇提供建议，监督天皇的权力。只有经过主管大臣的同意，法律、法令、命令才能生效。

在财政方面这部宪法非常重视军费问题，害怕民选的议会会削减军费，这样在将来某个时候说不定会危害到国家。所以，宪法在第71条规定，如果本年度的预算没有通过，那么将继续使用上个年度的预算额。

作为日本第一部宪法，它还带着许多旧时代的痕迹，有着不成熟的探索的意味。但是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这是日本被纳入先进国家阵营的重要一步。宪法帮助日本赢得了它拼了性命追求的国际社会的尊敬，增加了日本的软实力。伊藤博文在晚年回忆起这部宪法的时候颇为自豪地说：“回首宪法实施的16年，我在一定程度上满意地觉得，尽管有许多缺点，但实验总体上可说是成功的。”

在宪法规定的政体下，日本社会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表现在经济、公民的思想等方面——日本正式迈上了现代国家的道路。

宪法促进了时代的进步，明治时期的政治以不可想象的速度飞速进步。

在1890年，宪法颁布的一年后，日本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选。

这次大选，归功于宪法，也归功于日本政党的形成和议会的建立。

日本的政党，是在改革派之间围绕日本该如何前进的冲突之中产生的。在西乡隆盛因为叛乱自杀之后，大久保利通也被西乡的一些同情者刺杀——他重蹈了幕府大佬

井伊直弼的道路。这些争斗，不仅仅是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也是对那些来自萨摩藩和长州藩的一小撮人控制政府政治的不满。而在1868年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中第一条，就是要选举一个由立法产生的政治机关。1874年，曾和西乡隆盛一同辞职的板垣退助也提出了这种要求。

到1878年的时候，随着木户孝允的去世，“明治三杰”不复存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隈重信等人掌控了日本的政治。

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之间颇有矛盾，前者喜欢英国的制度，后者则是德国制度爱好者。1881年，大隈重信向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主张日本效仿英国的制度，建议由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来组织政府，并在1883年举行大选。不过明治天皇最终倾向了伊藤博文等人，宣布将颁布一部钦定的宪法，并在1890年生效。

作为对此的回应，板垣退助是最早的行动者，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自由党，大隈重信则组织了立宪改进党。

板垣退助被认为是日本政党的先驱者。在是否侵略朝鲜问题上，板垣退助等人的意见遭到否决后，愤然辞职的他与副岛种臣、后藤象次郎、江藤新平等人，一起组织了一个“爱国公党”，并于1874年1月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这个爱国公党就是日本最初的政治结社，而民选议院设立建白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导火线。虽然爱国公党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但正是由此开始，日本的政界官僚派和民权派壁垒分明，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政治斗争中，日本的现代政党出现了。

在板垣退助等人的努力下，1881年10月12日，明治天皇发布了国会开设的大诏，定于1890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1881年10月30日，自由党成立，并公推板垣退助为

总理。自由党的盟约主要有四条：主张努力扩展日本人民的自由，保护日本人民的权利；促进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日本国民应当人人平等；主张确立日本的立宪政治。自由党的支持力量来自土佐藩和农村地区。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则受到了商人和资本家们的支持。理所当然地，这两个党都充满了激烈的内部斗争。不过这不妨碍日本的政党走向近代化。

1871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份报纸，自此报纸就扮演了日本政治的舆论监督角色。

日本还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建立起地方上的议会组织。各种法律如民法、刑法等也在制定的过程中。

这一切，都是在伊藤博文去德国考察宪法之前，日本政府和社会所作的尽可能的努力。

随后，宪法被颁布了，大选的事情终于提上日程。



伊藤博文

选民的资格并不是无条件的。

伊藤博文，这位操控了明治政府宪法制定的人，归国之后，对本国人民进行了一番梳理和归类。在1884年，他建立了一种新的贵族制度，颁布了《华族令》，仿效德国的做法，授予508人华族的身份，并且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归类。列入华族的有旧贵族，也有明治维新的干将。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获得了伯爵的地位，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则是侯爵，板垣退助和大隈重信照旧是平民。在1885年，日本建立了一个欧式内阁，伊藤博文任首相，1888年建立了枢密院，作为政府的最高咨询和顾问机构。

日本的议会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众议院是由选民选出的。宪法规定只有缴纳物产税的物主们才有资格成为选民，这样，选民就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数目了——有选民资格的人数是45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都不到。

不过这是个好的开始，至少有45万人有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1890年大选如期举行，板垣退助重组的自由党获得了130个席位。此后，议会一直在和政府作着持续的斗争，被解散了好几次，也被重组了好几次。在议会的争执和不停的讨论中，日本政治在走向进步。

在政治体制相对的良好运作下，明治政权巩固后的二三十年间，日本为自己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奠定了基础。许多大的财阀也涌现出来，他们大多是由武士发迹的，其商业精神的支柱不单单是在本领域有所贡献和赢利，还集中在要为国家作出贡献上。这些财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日本后来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

第二节 军队改革：当兵有鞋子穿

西方的入侵带来的先进的武器，与日本的赤裸裸的对比，令日本的改革派们认为，富国的根本就是强兵，因此，建立一支强大的、能和西方媲美的军队是明治维新的

首要任务。

山县有朋出生于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他从小就喜爱习武，擅长柔道和剑术，曾把“我是一介武夫”作为座右铭。他从16岁起，就在长州藩工作，担任过长州藩役卒、监察员随从等职。

他也曾就读于吉田松阴的学塾，与师兄弟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保持着融洽的关系。

他是战场上的一名干将，他参加“尊王攘夷”活动，是奇兵队的军监，数次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伤痕累累。

1854年 8月，年仅17岁的山县有朋，在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的下关战争中表现英勇，右腕和腹部中弹负伤；1865年，他率奇兵队清除了长州藩中对幕府表示恭顺屈从的“俗论党”，夺回藩政权；1866年，他又指挥奇兵队打败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保卫了长州讨幕根据地；1868年，在关系到讨幕维新运动成败的戊辰战争中，他任北道镇抚总督兼讨伐会津越后口总督的参谋，率军先后攻占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为倒幕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869年，山县有朋因为在戊辰战争中的贡献，获得世代享禄600石的待遇。在19世纪80年代，获封伯爵。

不过山县有朋不是一个战场上的死硬派，在明治维新后，基于改革军队的目的，他参加了岩仓使节团，到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

回国后，山县有朋继续在军部工作，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大辅，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他是日本军界的领头人。

在他的主持下，日本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改革，为日本近代军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山县有朋有“日本近代陆军之父”之称。他既是军国主义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也是日本海外侵略的狂热推行者，他主张侵略朝鲜和中国，是20世纪日本进入战争癫狂状态的始作俑者。

在山县有朋之前，最初主张建立常备军的是曾经指导长州改革的兰学军事家大村益次郎。

大村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建议日本靠征兵来建立一支中央武力。

在以前的日本，武士是士兵的唯一来源，能够上战场的人，都出自武士家庭。一般的农民和城市的平民、商人家庭的孩子，是没有这种资格的。而武士们则因为能够尽这种当兵的职责而非常荣耀。

大村的建议，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害怕平民当兵会造成反抗政府的危险，对此表示反对，进而主张应该把各个藩国的武力利用起来。木户孝允也很支持这种观点。

强烈的反对者是西乡隆盛，西乡是一位坚定的武士道精神的捍卫者，他也坚决维护武士们的利益。武士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世袭的，一旦实行广泛的征兵制，那么，这就意味着武士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将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了。

在多数改革派的反对下，大村的主张没有实现。不过他依旧是日本军制改革的先驱者。他为创建日本近代军制做了很多铺垫工作。如果他的设想能够实现，日本将会从各藩中挑出精壮的兵力，编成不分藩籍的中央政府军队，这是个一箭双雕的改革方案。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实现，各藩的兵力就能被大大削弱，相对来说政府的压力就小很多，自然，中央的权力就会加大。另外对日本军制发展来说，更具有重要意

义，这可使日本废除封建军制而走上近代军制的道路。

遗憾的是，财政问题是个大问题，明治维新的时候，幕府已经很穷了，天皇的财政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拿钱去养这么多兵，只能是天方夜谭。

大村的军事改革，不但没有遇到好的变成现实的机会，反而导致连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保证不了了。

1869年9月他遭到反对派武士的袭击，在兵部大辅任内死去。

不过，他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继者。1870年8月，山县有朋从欧洲研究兵制回国，继承大村遗志进行兵制改革，首先投入建立“亲兵”的工作。

从1871年开始，山县有朋先后设置了六个镇台，拥有士兵两万多人，并且从旧的藩国精选了一些常备军改编为中央的军队。1871年9月，政府改组兵部省，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中又设掌管军令的陆军参谋局（后来的参谋本部）。

山县有朋几乎是照搬了德国的军制，1872年，山县有朋提交了《军备意见书》，主张效仿欧洲实行征兵制，并且进一步扩充海军。1872年2月，兵部省分为陆、海军两省，山县有朋任陆军大辅，胜海舟任海军大辅。

在山县有朋的主张下，同年颁布《征兵令》，在全国平民中征兵——士兵终于不再像原来那样只能由武士来当了。很快征兵制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实行起来，与征兵制同时进行的是日本的扩军。1873年刚实行征兵制时，官兵平时定为31 680人，战时定为46 350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远远低于世界水平。随着扩军政策的实施，陆军很快拥有7个师团53 000人。

征兵制改变了入伍年轻人的生活和观念，对于很多出身穷苦家庭的士兵来说，当上

兵使得他们第一次穿上了鞋子。那些来自落后地区的士兵，在很多新事物面前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每天向着营房的火炉鞠躬。参军使得他们获得了识字和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甚至很快学会了抽烟和喝白酒。

海军的进步也是惊人的，海军刚建立时拥有军舰17艘，排水量1.3万余吨。但随着扩军政策的实施，到189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有了28艘现代化的战舰和24艘鱼雷艇，其中24艘战舰的总排水量已经达到了57 000吨。

山县有朋在扩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士兵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他颁布了《军人“读法”七条》、《军人训诫》、《军人敕谕》之类的东西，规定士兵们最最重要的就是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是最大的荣誉，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幸福，反对民主和自由主义倾向。

政府对于山县有朋的扩军也是非常支持的，给予大量的拨款。随着军备的扩充，随之而来的是拉动相关行业的内需。许多军官学校被建立起来：海军兵学校、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等，这些学校多从德国聘请教习。

山县有朋在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了一个参谋本部，并且为这个部门获取了绝对的权力。在1878年，这个部门只对天皇负责，政府无权过问，且这个部门反而可以通过陆军省来干涉政府。

第三节 甲午战争胜利：加入帝国主义阵营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来加强自身的硬件和软件，成果非常显著。这期间，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入亚洲，在东亚的土地上你争我抢，混乱不堪，受苦的是那些羸弱而改革步伐慢的国家，即朝鲜和中国。

朝鲜，一直是日本的“梦想所在”，而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因此卷入了东亚的战争当中去。在是否侵略朝鲜的问题上，明治政府曾经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最后这场战争被制止了。不过，停止侵略朝鲜，并不是日本不想打这个仗了，而是打仗的时机不对。

在日本翅膀逐渐变硬的时候，它开始毫不客气地啃朝鲜了，而啃朝鲜，无疑要从中国下手。

早在1871年的时候，因为琉球与台湾发生龃龉，琉球王国请求日本帮忙。1873年，日本派人到中国交涉，清朝总理衙门回答说：“这事是我们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日本人好容易瞄了这样一个机会，怎肯罢休？于是日本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并于1874年4月设立“台湾番地事务局”，派兵侵略台湾。不过此时日本的军队并不强悍，登陆台湾的行动做得很糟糕，部队里也没有像样的医生，很多士兵不适应台湾的炎热，染上疾病死去了。清政府大张旗鼓地保卫台湾，派了福建水师、湘军和淮军，不过在听说日本军备也不是那么强之后，决定大事化小了。日本于是见好就收，收了清政府一笔赔款撤兵了事。

在看到以前不太敢惹的中国如此好对付之后，日本更加惦记上台湾了。

朝鲜的李氏王朝晚期是很不争气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对外关系上，朝鲜是丝毫没有判断力的，中国怎么做，它就怎么做。它不好处理的事情，就交给中国处理，实在不行，则由中国出面处理，它自己乐得清闲。

因此在19世纪晚期，朝鲜和中国的状况几乎是一样的：政治腐败、灾荒不断、叛乱不停、改革不力。最关键的相似之处，就是闭关锁国，不对外开放。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少外国的船只到朝鲜海岸，要求开放，朝鲜一概置之不

理，并将这些要求朝鲜开放的问题推诿给中国来处理。这些对于不觉得朝鲜有多重要的国家来说，一般中国出面就能解决了。但对于一直执著于朝鲜的日本来说，这一招很不管用。

1873年，朝鲜内政不大太平，当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排挤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兴宣大院君执政的十年间厉行锁国政策，而闵妃外戚集团则倾向于开放国门。日本看准这个机会，全副武装、兴致勃勃地奔向朝鲜了。在经过一番威逼利诱之后，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通过这个条约，日本获得在朝鲜的很多权利：自由贸易、免征关税、居留地和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对远东和世界局势而言，《江华条约》的签订使朝鲜半岛开始登上全球大国角逐的舞台。不久，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丹麦、比利时等国纷至沓来，朝鲜被迫向世界开放，并且进一步陷入了中国、日本、俄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中。

《江华条约》的签订，令日本人心里担忧的就是，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一旦朝鲜人求助于中国，那么日本还是有很多惹上麻烦的机会。于是在这个条约中，日本擅自规定，从现在开始朝鲜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否真的独立，还是要看中国的态度。

朝鲜在开放之后，所受的冲击过大，社会极不稳定，叛乱时有发生，还是照旧寻求中国的帮助。不过，中国此时也内忧外患不断，一时顾不上朝鲜。日本逮着空子就要和中国商量一下朝鲜的问题。终于在1885年4月，伊藤博文借着与李鸿章会谈后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将朝鲜问题明确了。在该条约中，两国就朝鲜问题达成了一个协定，议定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行文互相通知。

这个条约迫使清政府承认了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中日共同的保护国；这个条约也为1894年的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天津条约》签订前后，李鸿章派自己的弟子袁世凯驻扎到朝鲜。

袁世凯在朝鲜，度过了几年很是如鱼得水的日子。他做的让日本人不可原谅的事情就是，牢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让日本没有什么特别的存在感了。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朝鲜建立了电报服务，并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开辟了一条商业贸易路线。在朝鲜的关税受到进一步威胁的时候，袁世凯甚至筹了不少钱借给朝鲜。

日本就很惨淡了，日本人也作了不少努力，但日本素来在朝鲜就不受欢迎，朝鲜政府只喜欢袁世凯。日本羡慕、嫉妒、恨，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恨不得马上打一仗，将中国赶出朝鲜，于是非常积极地寻找机会。

机会在1894年来了。

这一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了。甲午战争之前的朝鲜，也是千疮百孔：财政恶化、政治腐败、盗匪猖獗、民不聊生，变乱随时可能发生。东学党就是一支一直被压制的力量。东学党是一个半宗教组织，它把中国的儒学、佛教与朝鲜的本土思想杂糅在一起，弄了一个不甚完善的信仰体系。它反对政治的腐败、反对外国的侵略，推崇东方的文化。在1893年，朝鲜政府把它给取缔了，于是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次年，朝鲜又发生了饥荒，这场暴乱规模迅速扩大。朝鲜按照惯例向清朝求援，李鸿章派出士兵前往，在前往之前，按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了日本。而迫不及待的日本军队，此时已经在赶去朝鲜的路上了。

叛乱很快就平息了。随后日本直接攻占了汉城，把朝鲜的国王和王后给劫持了。在朝鲜的清军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攻击，李鸿章决定增派军队到台湾。甲午战争就此

爆发。

中国军队令人大跌眼镜地失败了，日本军队则让人大跌眼镜地赢了，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就此签订了。近百年来，关于甲午战争的是是非非，已经有太多的专著来论述。对中国人来说，不管原因如何，这已经是永远的痛楚了。而日本则震惊了世界。它从中国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还获得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在俄国等国的干涉下没有成功），它还获得了片面最惠国的待遇，获得了通商口岸。在这些非常实惠的利益之外，还有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日本开始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

而远东的国家关系更受影响，朝鲜继续卑微地存在，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的重心，俄国和日本关系开始恶化，而中国则进一步沦为西方各国争夺和蚕食的对象。

第四节 第一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

在明治维新前后，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通过不断地扩张，越过了乌拉尔山脉，穿越西伯利亚，从中国获取了不少土地，迅速膨胀，成为一个地跨欧亚大陆、资源和物产丰富的国家，并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觊觎朝鲜半岛与中国。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和俄国的矛盾在远东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日本政府通过《天津条约》把其在朝鲜的地位合法化。同期的俄国，则加速向远东地区移民，在海参崴设立了移民局。对于朝鲜，俄罗斯非常在意，朝鲜的闵妃也和俄国人交上了朋友。

日本非常紧张地关注俄国的动向。1891年，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修筑，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铁路战略意义非常。山县有朋觉得，这条铁路一旦建成，那么朝鲜

必定迎来多事之秋。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因为俄国参与了干涉还辽，清政府就把辽东半岛租借给了俄国，俄国因此获得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温水港口。这让日本更加愤怒：自己刚刚夺取的辽东半岛，俄国居然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得到了。辽东半岛是通向中国内陆的门户，日本也想取得这个地方。1896年，清政府允许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满蒙直达海参崴。俄罗斯还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建筑铁路的权利。

1898年，俄罗斯继续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

在1900年，中国陷入了一场悲催的动乱：义和团运动。这引发了八国联军进京，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各列强在钱包鼓鼓之后却迟迟不肯退出中国。尤其是俄罗斯，它主张各国军队要尽快撤出中国，但是自己的军队却赖在中国迟迟不肯退出。日本同样不肯甘心：你不退，我也不退。日本一方面在亚洲寻找盟友，与英国结成日英同盟，一边积极备战，寻找机会，准备和俄罗斯打一架。

在1903年，横贯北满的东清铁路和纵贯整个满洲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全部完工，铁路枢纽哈尔滨成为旅顺之外俄国在满洲的第二个重要据点。这样对比之下，俄罗斯在中国的权利远远超出了日本。日本更是心理极度不平衡了。

由于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日本于1904年2月6日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并宣布断绝日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开始行动。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旅顺港俄国军舰，不宣而战。10日，日俄两国政府相互宣战，日俄战争正式开始。

对于自尊心极强的日本来说，在亚洲的积极侵略意味着三件事情：国土和资源的增加、国家的安全、平等的国际地位。

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了一个“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所谓前者，就是日本的本土，所谓后者就是日本附近的区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致维护了自己的“主权线”，要使其更巩固的话，无疑要给日本本土疆域加上几层防护壳：北边是朝鲜半岛、西边是中国大陆、南边是台湾岛，如果不是太平洋很大的话，估计美国和加拿大也要被计算在内了。

一位美国学者曾指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日本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要么是加入西方的阵营，成为“餐桌上的客人”，要么便是同朝鲜和中国一样，成为餐桌上的大餐。显然，日本选择的道路是前者，他们不但要维护住自己的“利益线”，还希望像英国那样，在海外拥有更多的殖民地——这才是西方国家的象征，这样才显得更有面子。

1904年，一场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打响了。

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将日本放在眼里，毕竟日本发展起来不过三四十年。俄国的防御显得非常草率，不久就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旅顺的争夺战中，俄国的军舰被日本军舰包围，几乎没有出港就被击沉了。接下来在海参崴附近的海域，日本海军又一次击败了俄国的海军。1905年9月5日，俄国被迫同日本在朴次茅斯签订了《日本和俄国和平条约》，即《朴次茅斯和约》。

这个条约正文15条，附约2条。通过这些条款，日本逼迫俄罗斯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利益，获得了俄国在旅顺和大连的租借地以及一切附属的权利。俄国政府将从长春至旅顺段的中东铁路支线及其所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均移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可在各自霸占的铁路沿线每公里驻护路兵15名。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此均等，俄国还将库页岛以南的鄂霍次克海域以及海域上岛屿的权利让给了日本。

日本大获全胜，所有愿望均已达成。不过日本国内的那些狂热分子，因为没有彻底得到库页岛而感到失望万分。这种失望感延续为对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的痛恨，并且引发了为期三天的骚乱。日本国内对于战争的狂热以及对于入侵海外的强烈兴趣可见一斑。

这确实是一场让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的战争，没有列强想到日俄战争日本会赢。不少亚洲国家对日本打赢俄国都有些许的兴奋，毕竟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败给亚洲国家。

这场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日本成了亚洲的霸主，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出现从一国独占变为两国分据南北的局面。同时，日本又加强了对朝鲜的侵略，至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

日本在满洲的经济利益也大大增加。为管理南满铁路，日本于1906年11月26日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设在东京。这个半官方性质的会社，随后又在中国取得了不少铁路的修筑权，日本将铁路一直修到朝鲜去了。在东北，日本还取得了从事船运、开采矿山、修筑公共设施等的权利，日本的私人公司也开始到南满进行投资。日方在中国的投资，大部分都在这个地区。

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都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日本的造船工业和军火工业飞速发展，扩大了国内的就业。日本的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也前途似锦，纺织品成为日本重要的出口物资。同时，日本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大，财阀更加富有，并且热衷于支持寡头政治。很快，日本就陷入了深重的政治危机，这些都促成了日本在“一战”和“二战”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国在日俄战争中是最失败的国家，这场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无能的清政府无力阻止，只好保持“中立”，并发出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公告给两国，要求不得伤害中国人民，而实际上是任由日本和俄国践踏中国的土地。

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争相抢购军需物资，公然违背清政府“军需自带”的要求。在购买的过程中，如果中国的百姓不愿意，日军和俄军就硬抢，过往客商的货物也未能逃过一劫。除了抢夺军事物资，不少青壮年还被强行拉上战场充做苦力、运送弹药，许多人成了战场上的炮灰。大片土地成为战场，平民百姓的房屋被毫不留情地烧毁，牲畜被牵走，十几万中国人流离失所。其惨状，甚至连日本人办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百姓因为这场战争，死伤数万，血肉横飞，倾家荡产。

还有不少中国百姓被胁迫做间谍，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决了这些所谓的中国的俄罗斯间谍，中国文学家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悲哀地描述过这种处决的现场。

不仅中国的平民如此，官员也不能逃脱厄运。日本和俄国都强迫当地的官员为其服务，如提供车辆、警察以及军队，去保护各自需要的公共设施。在占领区，日本竟然公然取消地方的行政系统，建立起适合自己进行战争的行政体系。稍有不服从的官员，就被日军逮捕或者杀掉。

中国在经受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之后，立宪派开始复苏。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也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积极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行动。终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不过，接下来的政治局势依旧是令人沮丧的，一直持续到“二战”，中国依旧是个破烂不堪的摊子。

俄国在1904年的战争中，死者和伤者加起来有二十几万，既折了兵，又丢了面子。而在1904年前后，俄国国内的政治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沙皇政府的反对派们，如雨后的春笋般冒出来，各种党派几乎在一夜之间林立。1904年11月30日，自由派们促使莫斯科市政府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以及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而其他城市与地方自治会，也陆续通过类似的决议或呼吁案。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发布了一些具有安抚性质但没有实质效果的政策。

日俄战争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内反对派对沙皇政府的不信任。因为彼时的俄国，无论在技术还是军备上都不落后于日本，打败仗的原因无疑是沙皇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无能。别说上层知识分子，就连平民百姓也不再相信沙皇了。同时，俄国惨败宣告了沙俄远东政策的失败，俄国的实力遭到重大削弱，加速了俄国革命的到来。

1904年12月，以圣彼得堡附近一家工厂工人罢工为起点，俄国革命开始了。在经过一系列抗议以及残酷的流血冲突之后，1905年5月，约三百名来自各地地方自治会与市议会的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通过一个议案，要求成立国家级别的议会。12月，沙俄政府颁布了选举办法，第一届国家杜马定于1906年3月进行选举。这次革命的胜利，为1917年俄国成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日俄战争对中、日、俄三国来讲，已经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五节 近现代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二战”，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日本，还是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一段时间。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在亚洲的军国主义，让全世界不得安宁，并为之痛苦了很多年，直到现在。

在亚洲的日本，开始了对周边国家的无休止、无底线的侵略，攫取领土和资源、文化的强制性入侵、残酷而血腥的杀戮、残忍的生物战争，日本数千年来积累的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像潘多拉的魔盒一般打开了。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的：东亚和东南亚为了将日本驱逐回那四个大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无数人的生命、土地的沦陷、政府的溃败，更为沉重的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追回自信，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也是非常得不偿失的。明治维新之后，那枝在亚洲独树一帜的鲜花迅速地枯萎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经济的衰退。

长期的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青年人大量死于战争。美军那两颗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到“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多年以来积累起的国民财富，被消耗殆尽。

比经济落后更重要的，还是日本国际地位的变化。“二战”后，日本处在美国的独占之下，因为发动战争，遭到国际社会很多破坏性的惩罚。日本的三军装备或被销毁或被作为战争赔偿，日本也不允许再拥有常备军，只有为数不多的边防警察。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被减弱——“二战”的战胜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一度为亚洲最强国家的日本被排除在外，这对数十年后的日本打击颇大，成为常任理事国也变为日本的梦想之一。

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发动战争的目的，也背离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梦想，甚至最初的开国政策，也被盟国的贸易封锁所取代。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大国，反而在这条路上走得颇为曲折和艰辛。

大和民族是一个不会气馁并善于学习的民族，在经历了战争的巨大打击以及一段时

间的经济阴霾之后，日本的经济神奇地获得了恢复。

在日本经济的恢复中，美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战后的日本，因为不再操心本国的国防安全问题，于是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恢复经济上。这些帮助并非无缘无故，“二战”刚一结束，“冷战”开始，共产主义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通过“道奇计划”，开始帮助日本进行经济复苏，增加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在美国的资金、技术等的支持下，日本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在企业中推行严格的科学管理制度，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很快，日本就从通货膨胀的噩梦中走出来了。到1955年，日本的经济几乎全面恢复，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飞速发展。这一时期，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工业增长率则平均达13.6%，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成功实现了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二次远航”。

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再次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其中一个途径就是牢牢维护美日同盟。美军的占领期，是日本的一段痛苦的记忆，不过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始终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为了摆脱其战败国的地位，为了改变政治侏儒的形象，寄希望于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在“冷战”前，美国是日本的依靠。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让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而日本的崛起让它在亚洲成为一个强国，与日本友好对于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加强美日同盟，可以打压中国的崛起。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不断发起对中国的侵略。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末期，趁清政府败局已定，非法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随后，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并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

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不择手段的经济掠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战争结束后，日本右翼分子非但不肯反思在“二战”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还在全国各地组织召开各种各样的报告会、讲演会，否定日本侵华历史，并且组织右翼学者编著否认历史的书籍，混淆历史事实，迷惑日本青年一代。如果日本右翼分子还这样一意孤行，那么中日关系始终是平稳之中埋藏着隐患。

这些对于被日本侵略的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同样适用。日本与韩国，同样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亚洲国家，也有诸多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但历史问题总是时时给日韩关系蒙上阴影。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日韩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平稳外交。

不过，日本在经济上的地位，也为它在亚洲找到了不少盟友。印度和日本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当前在共同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日本和印度出奇地保持着一致。甚至在2004年，日本、德国、印度及巴西组成了一个“四国联盟”，借安理会改革的机会积极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不过这个梦想没有实现，那些曾被日本和德国侵略的国家激烈反对日本入常，另外一些国家本着“我没有，你也甭想有”的态度，阻止了四国联盟的计划。

不论如何，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因为曾经给周边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给予其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似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选择性忘记历史的国家，都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的。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日本历史年表

公元前660年，神武天皇

公元前581年，绥靖天皇

公元前548年，安宁天皇

公元前510年，懿德天皇

公元前475年，孝昭天皇

公元前392年，孝安天皇

公元前290年，孝灵天皇

公元前214年，孝元天皇

公元前157年，开化天皇

公元前97年，崇神天皇

公元前29年，垂仁天皇

公元71年，景行天皇

公元131年，成务天皇

公元192年，仲哀天皇

公元201年，神功皇后

公元270年，应神天皇

公元313年，仁德天皇

公元400年，履中天皇

公元406年，反正天皇

公元412年，允恭天皇

公元454年，安康天皇

公元457年，雄略天皇

公元480年，清宁天皇

公元485年，显宗天皇

公元488年，仁贤天皇

公元499年，武烈天皇

公元507年，继体天皇

公元534年，安闲天皇

公元536年，宣化天皇

公元540年，钦明天皇

公元572年，敏达天皇

公元586年，用明天皇

公元588年，崇峻天皇

公元593年，推古天皇（女）

公元629年，舒明天皇

公元642年，皇极天皇（女）

公元645年，孝德天皇

公元655年，齐明天皇（女）

公元662年，天智天皇

公元672年，弘文天皇

公元673年，天武天皇

公元687年，持统天皇（女）

公元697年，文武天皇

公元704年，元明天皇（女）

公元710年，元明天皇（女）

公元715年，元正天皇（女）

公元724年，圣武天皇

公元749年，孝谦天皇（女）

公元758年，淳仁天皇

公元765年，称德天皇（女）

公元770年，光仁天皇

公元782年，恒武天皇

公元801年，恒武天皇

公元806年，平城天皇

公元806年，嵯峨天皇

公元824年，淳和天皇

公元834年，仁明天皇

公元851年，文德天皇

公元859年，清和天皇

公元877年，阳成天皇

公元885年，光孝天皇

公元889年，宇多天皇

公元898年，醍醐天皇

公元931年，朱雀天皇

公元947年，村上天皇

公元968年，冷泉天皇

公元970年，圆融天皇

公元985年，花山天皇

公元987年，一条天皇

公元1012年，三条天皇

公元1017年，后一条天皇

公元1037年，后朱雀天皇

公元1046年，后冷泉天皇

公元1069年，后三条天皇

公元1074年，白河天皇

公元1087年，堀河天皇

公元1108年，鸟羽天皇

公元1124年，崇德天皇

公元1142年，近卫天皇

公元1156年，后白河天皇

公元1159年，二条天皇

公元1166年，六条天皇

公元1169年，高仓天皇

公元1181年，安德天皇

公元1184年，后鸟羽天皇

公元1192年，后鸟羽天皇

公元1199年，土御门天皇

公元1211年，顺德天皇

公元1221年，仲恭天皇

公元1222年，后堀河天皇

公元1233年，四条天皇

公元1243年，后嵯峨天皇

公元1247年，后深草天皇

公元1260年，龟山天皇

公元1275年，后宇多天皇

公元1288年，伏见天皇

公元1299年，后伏见天皇

公元1302年，后二条天皇

公元1308年，花园天皇

南朝

公元1334年，后醍醐天皇

公元1340年，后村上天皇

公元1368年，长庆天皇

公元1384年，后龟山天皇

北朝

公元1332年，光严院

公元1336年，光明院

公元1350年，崇光院

公元1352年，后光严院

公元1375年，后圆融院

公元1384年，后小松院

公元1393年，后小松天皇

公元1412年，称光天皇

公元1428年，后花园天皇

公元1466年，后土御门天皇

公元1477年，后土御门天皇

公元1477年，后柏原天皇

公元1528年，后奈良天皇

公元1558年，正亲町天皇

公元1576年，正亲町天皇

公元1586年，后阳成天皇

公元1615年，后水尾天皇

公元1629年，明正天皇（女）

公元1644年，后光明天皇

公元1655年，后西天皇

公元1673年，灵元天皇

公元1688年，东山天皇

公元1701年，中御门天皇

公元1736年，樱町天皇

公元1748年，桃园天皇

公元1764年，后樱町天皇

公元1772年，后桃园天皇（女）

公元1781年，光格天皇

公元1818年，仁孝天皇

公元1848年，孝明天皇

公元1867年，明治天皇

公元1912年，大正天皇

公元1926年，昭和天皇

公元1989年，明仁天皇